目次

附錄一

附錄二

（一）緒說

這次的語文論戰，最初的發動是汪懋祖先生在南京「時代公論」一一〇號上發表了一篇「禁習文言與强令讀經」。這篇文章的起因，汪先生在開端寫着：

「近聞湖南廣東等省當局，强令中小學讀經；而報載教育部通令糾正，並禁止小學誦習文言，各走一端，因思想上之衝突，造成教育上之棼亂。苟不研究其本源，以折衷至當，則一反一覆之間，兒童，社會，及民族前途，同受其敝。此不佞所深憂。謹不揣固陋，與當世司教育之柄者一衡之。」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不久，就有吳研因先生在南京，上海各報發表一篇長文，詳駁汪先生底主張。於是「復興文言」與「擁護白話」的論戰就開始了。六月中旬，這論戰就擴大到了上海；申報副刊「自由談」，中華日報副刊「動向」，大晚報副刊「火炬」，晨報副刊「晨曦」以及其他各刊物，都陸續發表了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除「晨曦」之外，其他幾個副刊上面的文章，大體都是站在反對「文言復興」的一面。

六月十八日，陳子展先生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文言——白話——大衆語」一文，首先提出「大衆語」問題。於是，這個論戰立刻又有了新的發展。——由「復興文言」與「擁護白話」的論戰一躍而到了「大衆語運動」論戰的階段。關於大衆語運動論戰底中心，大體不出三個問題，就是：——

(一)大衆語運動與文言復活的問題。

(二)大衆語運動與白話文的問題。

(三)大衆語本身底建設的問題。

本書底目的，並不是要把這次論戰中的諸問題作結論或下斷語，只是把諸問題底發展的線索，中心的內容，以及所到達的階段，作一個客觀的敍述罷了。不過爲着使問題更加明瞭，淸晰，所以不得不從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說起。

（二）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

我們要明瞭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底基本性質，必須先考察當時白話文運動底根本主張。當時文學革命的理論，主要的可以分做兩部分來考察：第一部分是消極的破壞的理論，這可以拿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裏所提出的「八事」來做代表。現在且把他底原文引在下面：

一曰須言之有物。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於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爲乎？吾所謂「物」，非

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吾所謂「物」，約有二事：(一)情感——……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而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二)思想——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

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穠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質救之。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倣古人。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

更觀今之「文學大家」，文則下規姚曾，上師韓歐；更上則取法秦漢魏晉，以爲六朝以下無文學可言。此皆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而已，而皆爲文學下乘。卽令神似古人，亦不過爲博物院中添幾許「逼眞贗鼎」而已，文學云乎哉！

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鍊生三人而已）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倣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摹倣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眞正文學。其他學這個，學那個之詩古文家，皆無文學之價値也。今之有志文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三曰須講文法。今之作文作詩者，每不講求文法之結構。其例至繁，不便舉之，尤以作駢文律詩者爲尤甚。夫不講文法，是謂「不通」。此理至明，

無待詳論。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觀，其取別號則曰「寒灰」，「無生」，「死灰」；其作爲詩文，則對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惟恐其速去，花發又惟懼其早謝：此亡國之哀音也。老年人爲之猶不可，況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養成一種暮氣，不思奮發有爲，服勞報國，但知發牢騷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將以促其壽年，讀者將亦短其志氣：此吾所謂無病之呻吟也。吾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願其爲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也。其不能爲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而徒爲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今之學者，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便稱詩人。其所爲詩文處處是陳言爛調，「蹉跎」，「身世」，「寥落」，「飄零」，「蟲沙」，「寒窗」，「斜陽」，「芳草」，「春閨」，「愁魂」，「歸

夢」，「鵑啼」，「孤影」，「雁字」，「玉樓」，「錦字」，「殘更」，……之類，纍纍不絕，最可憎厭。其流弊所至，遂令國中生出許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實非之詩文。

吾所謂務去爛調套語者，別無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實，但求能達其狀物寫意之目的，卽是工夫。其用爛調套語者皆懶惰不肯自己鑄詞狀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一）廣義之典非吾所謂典也。廣義之典約有五種：

（甲）古人所設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義，不以時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雖不讀書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謂爲用典也。蓋設譬取喻，貴能切當：若能切當，固無今古之別也。若「負弩先驅」，「退避三舍」，在今日已非通

行之事物，在文人相與之間，或可用之，然終以不用爲上。

（乙）成語。成語者，合字成辭，別爲意義。其習見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鑄「成語」，亦無不可也。……

（丙）引史事。引史事與今所論議之事相比較，不可謂爲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語。此亦非用典也。……

以上五種爲廣義之典，其實非吾所謂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狹義之典，吾所主張不用者也。……狹義之典亦有工拙之別，其工者偶一用之，未爲不可，其拙者則當痛絕之。

七曰不講對仗。排偶乃人類言語之一種特性，故雖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間有駢句。……然此皆近於語言之自然，而無牽強刻削之迹；尤

未有定其字之多寡，聲之平仄，詞之虛實者也。……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先乎其大者」，不當枉廢有用之精力於微細纖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廢駢廢律之說也。即不能廢此兩者，亦但當視為文學末技而已，非講求之急務也。

………

八曰不避俗語俗字。吾惟以施耐菴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參看上文第二條。）……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鎡國會，遵晦時休」之類）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節錄胡適文存第一卷，八—二二頁）

這八項「文學改良」的主張，後來修正為有名的「八不主義」。——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語爛調。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倣古人。八，不避俗語俗字。

這八項都是針對着封建的古文而發的，在當時文學領域內底「反對封建勢力」這一點上，當然是非常有意義的。不過，我們從這八點上來考察，却可以發見許多嚴重的缺陷。

第一，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是忽視了內容方面底鬪爭的。上面舉出的八項，除了一二兩項之外，都是關於形式方面的。一二兩項雖說是關於內容方面的，但是這內容的革命底意義，在當時的白話文運動者底頭腦裏却非常朦朧，非常含混，並沒有明確的認識。譬如關於第一項，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胡適解釋所謂「物」就是「情感」和「思想」，並沒有一字說明這「情感」和「思想」底時代的性質。其實，許多古文的作品，何嘗沒有「情感」和「思想」呢？不過那些作品裏面的「情感」和「思想」都是陳腐腐敗的封建遺物罷了！「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底中心的意義應當是肅清文字內容上底封建的遺物

——陳舊腐敗的情感和思想，灌輸富有時代意義的新的情感和思想。所以，「言之無物」的「物」應當不是空空洞洞的「情感」和「思想」，而是富有時代意義的新的「情感」和「思想」。第二項，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胡適解釋「無病呻吟」就是「痛哭流涕」的「牢騷之音，感喟之文」，可是對這「牢騷」，「感喟」底社會的根據却完全沒有提到。其實，文言文「無病呻吟」底癥結並不在「牢騷」，「感喟」，而在腐爛的封建意識，「無病呻吟」的空洞完全是充滿了封建意識的結果，所以，僅說不「無病呻吟」，不「牢騷」「感喟」，而不指明牠底社會的根據，結果是不能觸到問題底中心，也不能眞正地解除這種癥結的。

第二，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在形式方面的鬬爭是不澈底的。形式底改革原是當時的「文學革命」所着重的中心問題；但是，當時的白話文運動者，却沒有完全擺脫封建的文言文底影響，常常流露出游移，動搖和妥協的態度。譬如「不用

典」一項，原是反文言的最重要的一項，可是胡適的態度怎樣呢？首先就劃出五種說是「廣義之典，其實非吾所謂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既是可用可不用，那當然不在「不用」之列。接着，講到狹義的典，在說了「吾所主張不用者也」之後，立刻又轉了一個灣說：「狹義之典亦有工拙之別，其工者偶一用之，未爲不可，其拙者則當痛絕之。」這樣一來，眞是倒退了十萬八千里：「不用典」已經不是反對用典，而變成主張用典了——用典須「工」，拙者當痛絕之。其次，講到「不重對偶」，胡適說：「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先立乎其大者，不當枉費有用之精力於微細纖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廢駢廢律之說也。」你看，有廢駢廢律之說並不是因爲駢律根本要不得，只是因爲暫時管不到罷了！於是，「即不能廢此兩者，但亦當視爲文學末技而已，非講求之急務也」的讓步說法，自然不足奇怪了。

還有，胡適曾作過一篇「白話解」，解釋白話底意義說：「……白話但須

「明白如話」，不妨夾幾個文言字眼」。「……白話便是乾乾淨淨沒有堆砌塗飾的話，也不妨夾入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這樣說來，自然唐詩宋詞，宋儒語錄信札，元人戲曲，明清傳奇都是「模範的白話文學」了。更何况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這一些呢？

總之，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在消極的破壞方面，不單忽視了內容上的反對封建意識的鬬爭；同時，對於形式上的鬬爭也非常不徹底。白話文運動者反對文言文的態度，在各方面都流露出動搖，游移，妥協的傾向；結果，不單有意無意地給文言文留下許多地盤，同時使白話文本身也連「如話」的地步都做不到，反夾雜着許多文言文底毒素，而埋下了白話文言化的根源。

其次，我們再來考察第二部分，積極的建設的理論。這可以拿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來做代表。現在，先來節錄他底原文：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眞正國語。

……………………

有些人說：「若要用國語做文學，總須先有國語。如今沒有標準的國語，如何能有國語的文學呢？」我說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語言學的專門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就的。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這話初聽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細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誰肯從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裏面學習國語？所以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雖是很要緊，決不是造國語的利器。眞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

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試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學來的嗎？……………

所以我以為我們提倡新文學的人，儘可不必問今日中國有無標準國語。我們儘可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我們儘量採用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夠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這樣做去，決不愁語言文字不夠用，也決不用愁沒有標準白話。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製定標準國語的人。………

我們要創造新文學也須預備下創造新文學的「工具」。我們的工具就是白話。我們有志造國語文學的人，應該趕緊籌備這個萬不可少的工具。預備

的方法，約有兩種：

（甲）多讀模範的白話文學。例如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宋儒語錄，白話信札；元人戲曲；明淸傳奇的說白。唐宋的白話詩詞，也該選讀。

（乙）用白話作各種文學。我們有志造新文學的人，都該發誓不用文言作文：無論通信，做詩，譯書，做筆記，做報館文章，編學堂講義，替死人作墓誌，替活人上條陳，……都該用白話來做。（節錄胡適文存第一卷，七九—九十頁）

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者在積極的建設方面，表現出了怎樣的弱點。

第一，他們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同時認爲國語的文學就可規定「眞正的國語」。但是怎樣創造國語的文學呢？就是「從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學來」。不單是這一些書，就連唐宋的白話詩詞，宋儒語

錄，信札，元人戲曲，明清傳奇都是「模範的白話文學」。那末，他們底白話能「白」到怎樣程度，「如話」到怎樣程度，已經不用說了！所以，白話文不能接近口語，實在是必然的事。

第二，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者旣認定水滸西遊式的白話爲唯一的「模範」，自然就完全忽視了當前通行的「口語」；可是另一方面，對文言却還念念不忘。你看，胡適說了「儘量採用水滸西遊……的白話」之後，接着就說「有不夠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當前通行的口語（今日的白話）對於白話文，只與文言站在同等的「補助」的地位；那末白話文底脫離大多數人口裏的「話語」，而趨於文言化，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根據以上的考察，我們已可明瞭：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雖然有牠不可泯沒的功績——在形式方面底反封建的解放鬪爭上，前進了幾步；但另一方面，却表

現着非常嚴重的缺陷：不單忽視了內容方面的反封建鬪爭，即在形式方面，也流露出非常動搖，游移和妥協的態度；這結果，一方面是給文言文留下了許多地盤，而另一方面，卻在白話文內部也混進了文言文底成分。這就是以後的「文言復活」和「白話文言化」的根源，而這根源正是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者有意無意地種下的。

（三）「文言復興」與反對復古

前面我們已經說明：五四時代的不澈底的白話文運動，已經種下了「文言復活」的種子，所以在這復古潮流洶湧的現在，提起了所謂「文言復興」，原是必然的事情。這里，我們首先要來看看所謂「文言復興」運動底內容到底是怎樣的。根據汪懋祖，許夢因諸先生底文章，可以歸納出幾個主要點：

A. 文言的優點：——

1. 「白話僅爲人類交際之物，無與於學術思想之研究。故自有生以來，既有

白話矣，逮人羣進化，不得不更造文言。……至文言之制作，大都依據白話。白話是原料，文言是原料製成之器具，此又古聖人開物成務必經之事。從來大文學家皆就已成之器，加以改良，使適於時地之用，斷無舍成器而用原料之理。」（「時代公論」一一七號許夢因「告白話派青年」）

2.「……救亡莫先於教育，教育莫急於文言，……學者須知如此，則治學方有其利器，從前失此器，故所治一無所成，今復尋得之，則一切學術，皆不難迎刃而解。」（六月一日「中央日報」許夢因「文言復興之自然性與必然性」）

3.「試問民國以上有歷史價值之書，若者可藉白話通之，無論古今中外，白話是平面的，無及於立體，是現在的，不能貫徹過去與未來。惟文言，則空間時間，無往不宜，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則青年之不學寡識，猶可謂非不習文言之咎耶？」（許夢因「告白話派青年」）

4.「……文言便於敍事，說理，議論，應用，而壯烈之節，激昂之氣，尤有賚於文言，若以白話表之，則易失之狂暴，無所裁節。」（「時代公論」一一〇號汪懋祖「禁習文言與强令讀經」）

5「文言爲口語之符號，所謂一字傳神，最能描寫文言之便利。……草寫『如之何』三字，時間一秒半，草寫『怎麼樣』三字需七秒半，時間相差六秒。文言之省便，毋待曉曉，乃必舍輕便之利器，用粗笨之工具，吾不知其何說也。」（「禁習文言與强令讀經」）

6「學習文言固較尋常語言稍難，但其努力之程度，決不如吳先生所言之甚也，而應用上之省力，則閱者作者以及印工皆較經濟，若用耳不用目，固無須文言，若須用目則文言尙矣；因文言爲語體之縮寫，語言注重音義，而文言音義之外，尙有形可察，例如說，『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只須『此生或彼生』即已明瞭，其省力爲何如，此僅就工具言之，已

無待辯論。」（「時代公論」一一四號汪懋祖「中小學文言運動」）

B. 白話的劣點：——

1.「……其奉行惟謹之白話，實質猶全係外國的而非中國的。其體勢構造，每非一般識字讀書之中國人所能領會，可領會者，大都外國假面具社會主義之宣傳，無一事一理及於實用科學，或爲本國所有者。彼固不信中國尙可爲一世界上獨立自由之國家，卽自視亦幾非中國之人，此種思想，生心害政，遂形成今日之中國。」（許夢因「告白話派青年」）

2.「青年因長久講習語體，潛移默化，而耽好所謂時代作品；卽平易之古文，涵正當之思想，每摒棄不觀，獨於現代文藝之詭譎，刻畫，與新奇刺激，多孜孜不釋手，……其結果則習爲浪漫，爲纖巧刻薄，馴至甘墮於流浪的生活。」（「禁習文言與强令讀經」）

3「現代語體文，乃新文化運動之產品，而其運動之意義，在於發揮個人主

義，毀滅禮教，打倒權威，暗示鬪爭，今則變本加厲，徒求感情之奔放，無復理智之制馭，青年浸淫日永，則必有更新奇之作品，方得讀之而快意。若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之說，彼等且視若土苴，不足以發興趣而解煩悶。孟子洪水猛獸之說，觀於今而益信。」（「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

C. 文言復興的動機與步驟：——

1「社會上反對物語教本，余初以為文人學士之言，不足為憑，故亦置之不理。迨去年下鄉考察，始知此項教本，農村中反對之聲更普，而皆道私塾讀書之有用。目前本市（南京——編者）社會局召集職業指導會議，有農工商代表列席，僉主小學高級必須教授文言，並有贊成私塾者。……興學三十年，私塾非惟不卽淘汰，且有方興未艾之勢，是亦足資猛省者。此吾文之所以作也。」（「中小學文言運動」）

2「竊謂初級小學，自以全用白話教材為宜。而五六年級，應參教文言。不

特為升學及社會應用所需，即對於不升學者，亦不當絕其研習文言之機會也。」「吾只望初中能讀畢孟子，高中能讀論語學庸以及左傳史記詩經國策莊子荀子韓非子等選本，作為正課，而輔以各家文選，及現代文藝，作為課外讀物——……」（「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

「文言復興」運動底主要的內容，不過如此。其次，我們要看到的是反對文言復活方面底步驟。主要的，我們可以舉出幾種傾向：

第一，是吳研因先生所代表的一種傾向，他在駁汪懋祖「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的那篇長文裏，所提出的最主要的具體意見是：小學不能參教文言，而中學只能選讀孟子。關於高中以上應否讀論語學庸……之類，吳先生雖沒有明說，但以「中學選讀孟子」推來，那末高中以上選讀論語學庸……當然是應當的了。所以在吳先生看來：「汪先生的主張並不極端」，不過「命題措辭却好像是一個極端派」（吳研因「讀汪文中小學文言運動後的聲明」）罷了！那末吳先生底主張

當然與汪先生的距離不遠了。

第二，是胡適之先生所代表的一種傾向。胡先生在「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獨立評論」一〇九號）一文裏說：

「今日社會還有一部分人對於白話文存着輕藐的態度，我們提倡白話文學的人不應該完全怪他們的頑固，我們應該責備我們自己提倡有心而創作不夠，所以不能服反對者之心。……我深信白話文學是必然能繼長增高地發展的，我也深信白話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一天會比一天抬高的。在這第一流的白話文學完全奠定標準國語之前，頑固的反對總是時時會有的。對付這種頑固的反對，必須還靠第一流白話文學的增多。」

他一方面以爲「不應該完全怪他們的頑固」，另一方面還是以爲「白話文學必然能繼長增高地發展的」，所以「對付這種頑固的反對」，還不能急急，必須等「白話文學完全奠定標準國語」之後，「第一流白話文學增多」之後，頑固的

反對自然會消滅！胡先生是完全沒有看到社會的發展情勢，完全沒有看到文言復活底社會意義的；他這種態度，表面是放鬆了反對文言復活的鬪爭，實質上是對「文言復興」運動表示了「友好」。

第三，是以為：「他們（指「文言復興」論者——編者）也知道復興文言文並不可能，但他們以為至少可以勉強人讀一點古書。直接提倡讀經的時代的不能再來，可以使我們無須多抱悲觀　間接的辦法能收多少效果，實在是疑問。格格不相入的意見，就讀熟也不能佔有腦中的一角。誰也不再願意為了文章去鎔經鑄史」。（六月二十一日申報「自由談」稜磨「文言的前途」）這種態度也是代表着許多人的。這種過分看輕文言復活運動的勢力，而太抱樂觀的態度，也是會生出放鬆「反對文言復活」運動的結果來的。因為汪懋祖諸先生的「文言復興」理論，雖然引不起多少人的信仰，得不到多少贊助的力量，但是「五四」以來一直保留下來的文言文的殘餘地盤（主要的是學校的國文，作文，大中學及政府機關

的各種考試，洋裝標點或仿宋影印的古書，報紙文章，公文，廣告，以及上中層社會的信札，應酬文等）却並不狹小，而且白話文本身也正在逐漸加多文言文的成分（如所謂「語錄體」以及張恨水式的白話文等），而成了文言文底有力的「友軍」。這正是「文言復活」運動底社會根據——也就是它底有力的後台！我們如果忽視了這一些，是一定不會獲得「反對文言復活」運動底勝利的。

第四，是認為：「文言之復被人提倡，我們不應該把它當作一個單獨的問題去看，而是應該把它當作目前這一串讀經，尊孔，逃禪，佞佛等……主張聯絡起來，當作整個的復古運動之一環去看的。我們尤不應該輕視它的作用，以為這種提倡根本是不值得一顧，以為這種提倡至多不過只是燈油將盡的「回光反照」，用不着怎麼憂慮，自然就會熄滅的：這都是不正確的意見，因為這種樂觀主義——對於「文言」死亡的樂觀——不啻是取消了『反文言』的運動。」（七月七日中華日報「大衆語專刊」陳頡「對於文言，白話，大衆語應有的認識」）「大

衆語運動正是配合着更高級的社會發展浪潮，針對着白話文的危機而勃起的，它一方面要使語文和大衆的社會鬪爭文化需要密切聯繫起來，別方面更要在建設新的語文形態中的過程中，加緊反文言餘孽及其所依附的封建意識的鬪爭，自然同時亦不放鬆寄生性的白話文的破敗，完成白話文運動所沒有完成的任務。」（新生週刊二十四期關心「大衆語運動的幾個問題」）這種以提出「大衆語運動」來加緊反對文言復活鬪爭的態度，是代表着最多數人的，我認為這是最正確的反對文言復活的態度。

以下，我們再來敍述到「大衆語運動」。

（四）大衆語運動底基本性質

在這「文言復興」論者底再接再厲，和「擁護白話」者底若接若離的戰鬥中，却有了一個新的發展，這就是大衆語運動。

最初提出「大衆語」這名詞的，是陳子展先生。他在六月十八日的申報「自由談」裏，發表了一篇文章，題名叫做「文言——白話——大衆語。」在這篇文章裏，他最先說到文言白話的論戰：

「其實文言白話的論戰早已分過勝負了，並不是林琴南章行嚴諸先生的

文言文做得不好，他們趕不上古人；只因中國社會已經走到某種程度變革的路上，基礎一動，舊文化全盤動搖，文學革命只是其中的一種。這種大勢所趨，自然還有許多回環曲折，可是站在沒落下去的某方面，無論個人或他所屬的某一階層，雖然還能夠來幾次掙扎，最後的勝利却不會歸到他們的，儘管也得佩服他們的勇敢。」

他說明了「文言復興」的意義之後，接着就提出了「大衆語」問題。他說：

「文言白話之爭既已表過不提，現在我以爲要提出的是比白話更進一步，提倡大衆語文學。這理由並不怎樣高深繁重，就極淺薄極簡單的說，十多年來的白話文雖然比較文言的東西是要和大衆接近些兒，可是事實上告訴我們，這個顯然還不夠。目前的白話文學只是智識分子一個階層的東西，還不是普遍的大衆所需要的。再添上一句簡單的話說，只因這種白話還不是大衆的語言。

從前爲了要補救文言的許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話，現在爲了要糾正白話文學的許多缺點，不能不提倡大衆語。」（均見六月十八日申報「自由談」）這就是「大衆語」問題最初的提出。接着，陳望道，胡愈之，傅東華諸先生都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了關於「大衆語」問題的文章。另一方面，中華日報副刊「動向」，大晚報副刊「火炬」，以及新生週刊，新語林半月刊等都先後發表了關於這問題的文章，於是「大衆語運動」就很廣泛地擴大起來了。

A. 大衆語運動底前奏

在沒有敍述到這次大衆語討論底內容以前，必須先追述一個大衆語運動底前奏；這就是一九三二年關於「大衆文藝用什麼話寫？」的討論。那次的討論雖然沒有展開就中止了，但是牠底意義却是不可抹殺的；牠，可說是這次大衆語討論底先導，也可說是這次大衆語運動底序曲。

那文討論底開端，是宋陽先生在「文學月報」（一九三二年七月創刊，光華書局出版）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大衆文藝的問題」：這論文底第二節就提出了「用什麼話寫」的問題。他說：

「五四之後，從「文學革命」發展到「革命文學」這是前進的鬪爭。但是，幾幾乎正是革命文學的營壘裏面，特別的忽視文學革命的繼續和完成。於是乎造成一種風氣，完全不顧口頭上的中國言語的習慣，而採用許多古文文法，歐洲的文法，日本的文法，常常亂七八糟的夾雜着許多文言的字眼和句子，寫成一種讀不出來的所謂白話；即使讀得出來，也是聽不懂的所謂白話。

……………………

現在中國文字的情形是：同時存在着許多種不同的文字：（一）是古文的文言（四六電報等等）；（二）是梁啓超式的文言（法律，公文等等）；

（三）是五四式的所謂白話；（四）是舊小說式的白話。中國的漢字已經是十惡不赦的混蛋而野蠻的文字了，再加上這樣複雜的，互相之間雖然有分別的許多種文法，這叫三萬萬幾千萬的漢族民衆怎麽能夠眞正識字讀書？這差不多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

新的文學革命不但要繼續肅清文言的餘孽，推翻所謂白話的新文言，而且要嚴重的反對舊小說式的白話，「反對現在的一切種種林琴南！」是我們的新口號。這就要一切都用現代中國活人的白話來寫，尤其是新興階級的話來寫。新興階級不比一般「鄉下人」的農民。「鄉下人」的言語是原始的，偏僻的。而新興階級，在五方雜處的大都市裏面，在現代化的工廠裏面，他們的言語，事實上已經產生着一種中國的普通語（不是官僚的所謂國語），牠容納許多地方的土話，消磨各種土話的偏僻性質，並且接受外國的字眼，創

造着現代的政治技術科學藝術等等的新的術語。這種大都市裏，各省人用來互相談話演講，說出的普通話，才是眞正的現代中國語，這和智識份子的新文言不同。新文言的杜撰新的字眼，抄襲歐洲日本的文法，僅僅只根據於書本上的文言的文法習慣，甚至於違反中國文法的一種習慣。而新興階級普通話的發展，生長，接受外國字眼，以至於外國句法……却是根據於中國人口頭上說話的文法習慣的。總之，一切寫的東西都應當拿「讀出來可以聽得懂」做標準，而且一定要是活人的話。……」（宋陽「大衆文藝的問題」）

宋陽先生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文學月報」第二期上就有止敬先生發表了一篇「問題中的大衆文藝」，對「用什麼話寫？」的問題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底意見是這樣的：

「宋陽先生說得很明白，『他所謂眞正的現代中國語』不是智識分子的藍靑官話，（他指這爲官僚的所謂國語，）而是五方雜處的大都市裏現代化

的工廠內工人們所使用的『普通話』。……根據這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出幾個要點，（也不妨說是原則，）卽五方雜處的大都市的上海工人雖然各省人都有，然而他們『通用語』的趨勢都是『上海土白化』；這是一。又各工人區域每因其何省人佔最多數而發生了以該多數人省分的土話爲主的『通用話』；這是二。上海土白因而一天一天增加新的單字，新的句法；這是三。……上海各省工人所用的方言，除能移植少數單字到上海土白內，就很少獨立發展成新『普通話』的可能，反之，上海土白倒能影響他們，使改其原來鄉音，從而產生一種『半上海白』，使得上海白一天一天在變化中；這是四。

現在我們可以補充宋陽先生忽略的一點，卽五方雜處的大都市如上海的新興階級的普通話還是一種上海白做骨子的『南方話』。這原因是『各省人』之流入上海工人社會畢竟是逐漸的……，所以居於主位的上海本地話常居主

位。上海以外的大都市中亦有同樣的情形。……即使在一地的新興階級有其『普通話』，而在全國却沒有。宋陽先生所描寫得活龍活現的『眞正的現代中國語』何嘗眞正存在。

……………………………………

然則努力發展土話文學如何？這一點，誰都贊成，可是誰都覺得有許多困難，非一時可以克服。最大的困難是沒有記錄土話的符號——正確而又簡便的符號。……所以用固有的漢字來拼『土話』的音，旣然不行，用注音字母或羅馬字也有不便。……這一難關未打通以前，土話文學暫時只好不論。

在目前，我以爲到底還不能不用通行的『白話』——宋陽先生所謂『新文言』。現在通行的『白話』，尙不至於像宋陽先生所說的那樣罪孽深重無可救藥。……」（止敬「問題中的大衆文藝」）

止敬先生的文章發表之後，在『文學月報』第三期上，又發表了宋陽先生的

「再論大衆文藝答止敬」。在這篇文章裏面提出了許多很有系統的意見。現在節錄如下：

「中國的文學革命沒有完成，而需要第二次的文學革命。——這是我的見解。而止敬先生認爲『不能不仍舊用新文言』，不必管舊小說的白話還佔着統治地位，——這是根本認爲沒有新的文學革命的必要。……

關於這部分的說明，尤其重要。而且這不僅僅是大衆文藝的問題，而是一般的文化革命的問題。我在第一篇文章裏就屢次說明：『一切東西都應當用現代中國活人的白話來寫，』而大衆文藝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現在，我們在這一篇文章裏，再來特別着重的說明『一切寫的東西』的文字上的革命的必要。

第一，現在中國的出版界，尤其是所謂新書的出版界，從著作，翻譯直到雜誌報章，——的確是一種新文言佔着統治的地位。所謂統治的地位，就

是說：除開新文言式的所謂白話文以外，還有些別的，例如舊文言，例如少數好的作家的眞正白話文，不過不是『統治者』。……我所着重的，就是一些先進的作家不要只顧自己寫得出眞正白話文，而且要發動一個社會上的運動——去推翻新文言的統治，使那些多數的隨隨便便亂寫新式文言的作家和一切刊物，受到民衆方面的『輿論的懲罰』。……

止敬先生說：『新文言——蕭淸歐化的句法，日本化的句法，以及一切抽象的不常見於口頭的名詞，還有文言裏的形容詞等等，或者還不至於讀出來聽不懂』。其實，新文言要經過這一番手術之後，牠就不成其爲新文言了。讀出來而聽得懂——的確像個現在中國人的人話——那就成了中國的眞正白話文了。現在止敬先生也說『何嘗沒有可讀可聽而懂的作品』（我在第一篇文章就說過的，）——這正足以證明新的文學革命的可能已經發現。

第二，但是，大多數的科學政治論文（我說的是『地面上的』，）大多

數的新式文藝作品，是用的一種新式文言的假白話，這種文字在質量上，已經和中國活人說得出來的話是不同的東西。因爲沒有自革覺的文學革命的運動，所以好些比較好的作家，也馬馬虎虎的跟着亂寫。……我所謂的新文言，就是隨便亂用不必要的文言的虛字眼——口頭上說不出來的許多字眼，有時候還有稀奇古怪的漢字的拼湊。這樣，這種文字的本身就夠斷了羣衆了解的可能。羣衆要去學會運用這種文字，就一定要在自己的口頭言語的文法之外（或者學習普通話的文法之外），再去費五六年功夫學習漢文文言的文法。所以我說新文言在這一點上和舊文言是相同的。……中國的普通話，上海話，廣東話，福建話……（方言區域和普通話的口音標準等等還要詳細的調查研究下去）將來一定要採用羅馬字母而廢除漢字，變成新的中國文，上海文，廣東文……。現在新式文言的假白話的『威權』，正是新中國的偉大的文字改革的障礙。所以新的文學革命的發動，現在已經有萬分的必要。

第三，中國的大多數的識字的羣衆之中，却還有一種『死的白話』——舊小說的白話佔着統治地位。這種文字也是所謂『文人』寫的，寫給羣衆看的。所以現在的（不僅是水滸等等幾部傑出的舊小說，而是一般使用着的）舊式白話很雜亂的，同樣夾着惡劣的文言。……有意識的自覺的發動羣衆起來反對這種文字，指出這種文字已經不是口頭上說的話，指出這種文字不是羣衆自己的言語！羣衆要學習文字的時候，不要學這種死白話文，而要學『新興階級的普通話』以及當地主要的方言文的寫法。同時，他們用不着再去學習新式文言的假白話。這種新的文學革命的必要是顯然的。而止敬先生指出來：羣衆之中已經會有一部分人，『十分的不懂』舊小說的白話，那是更加證明這種革命的可能。……

第四，新的文學革命的對象是新式文言的假白話和舊小說的死白話。而新文學革命的目的，是創造出勞動民衆自己的文學的語言。中國現在的形

勢，以及將來發展的趨勢，——需要一種各省人共同的普通中國話的白話文。在口音方面，自然不會立刻統一的，——我們反對那種强迫的統一國語運動，——可是，在寫出來的文字方面，相當的是一致的。……根據這種已經在產生着的新興階級的普通話，而且贊助牠的發展，用來寫一切東西。止敬先生的調查，說上海各工廠有三種形式的普通話，都是南方話，又說沒有全國範圍的普通話。他所說的三種形式的上海普通話，只是證明全國範圍的普通話形成的過程，還只發展到一個初步的階段。而同時，却也證明着這種普通話是在產生出來。……我把真正白話文叫做『根據新興階級的普通話寫出來的文字』，意思是在於：（一）不是農民的原始的言語，而能夠接受政治技術科學藝術等等豐富的字眼；（二）也不是紳士等級的言語，不會盲目抄襲歐洲日本的文法而只從古代漢文裏去找些看得懂而聽不懂的『象形字』來勉强應付現代化的生活；（三）並且不是用某一地方的土話去勉强各省的

民衆採用做國語，也不是偏僻的固定的『鄉下人』的言語，而是容易接受別地方的方言成集的言語。

……………………………………

第五，總之，新的文學革命的綱領是要繼續五四的文學革命，而徹底的完成牠的任務。這是要眞正造成現代的中國文——可以做幾萬萬人的工具，被幾萬萬人使用，使幾萬萬人都能夠有學習科學藝術的可能，簡單而明瞭的：先要根據現在這種不完備的沒有完全形成的中國的普通話（可是眞正是活人能夠說得出來的話），造成一種比文字更優美的文字。雖然這種普通白話，用漢文寫着仍舊是一種『糊弄局兒』，然而這種眞正白話——活人說得出來的話，很容易用羅馬字母拼音而廢除漢字。……』（宋陽『再論大衆文藝答止敬』）

一九三二年關於『大衆文藝用什麼話寫』的討論，到這里就告了終結，沒有

繼續發展。這個討論，雖然沒有提出「大衆語」這名稱，但實際已是「大衆語」問題的討論，是無疑的。這回的大衆語運動底產生，當然有牠底特殊的社會條件；但和上次的討論有許多不可分離的聯繫却也是不可否認的。總之，那個討論是這回大衆語運動底前奏，而這回的正是那個討論底更高的發展。

B. 大衆語運動底意義

一九三二年關於「大衆文藝用什麽寫？」的問題底內容，我們已明瞭了一個大概；現在，再來看這次大衆語討論底內容。首先要敍述明白的就是「大衆語運動底意義」根據到現在爲止各刊物所發表的文章，我們可以把大衆語運動底基本意義，歸納到下列幾點：

1. 大衆語運動是把語言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的——「我們必須首先承認陳（子展）先生等提出的大衆語問題，在文學運動的現階段，是非常正確和切要

的。文學的『大衆化』，在目前，已成爲文學創作者和讀者大衆們一致的要求。要表現大衆生活，只有用大衆自己的語言方得達到成功；也可以說，在大衆的實生活中，已孕育着大衆語言的成長，只待我們採用。這不僅不是重複『五四』的舊賬，而是把語言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加強牠自身的任務。」（見三月二十二日申報讀書問答「怎樣建設大衆文學」）

2 大衆語運動是反文言文鬬爭底正確的發展——「文言文復活運動是封建復古潮流中當然有的現象，對於這一運動的鬬爭，當然而且必然是反封建復古運動底一翼。……『大衆語』問題底提出，表示了這個問題得到了正確的發展。這意思並不是說由一個問題發展到了另一個問題，而是指出：這是一個運動底兩面。認淸了封建復古運動中文言復活運動底本質，就一定會達到建設『大衆語』的結論。祇有『大衆語』問題得到了具體的解決和實踐的効果以後，反文言文鬬爭才能夠爭取實質上的勝利。」（七月十五日中華日報星期專論高荒「由反對文言文

到建設大衆語」一）

3 大衆語運動是徹底反對「士大夫文字底復活」的鬪爭——「語言文字的改革，是和社會的改革有着密切的關係的。五四時代的提倡白話文，是當時新興資產階級對封建階級的文化上的進攻。……可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在文化上不能完成這種任務，……於是這運動的第二步沒有向前走，一部分走到歐化文字的道上，成功了一種高等華人的『買辦文字』。一部分又回頭鑽進封建殘餘巢穴，形成舊小說式的白話。這樣，白話文便逐漸變成和文言文一樣不適合大衆的一種新八股了！時至今日，封建的勢力死灰復燃，士大夫之流——很多是當年的戰士，已經福至名來，換過一副嘴臉，把白話文成爲『士大夫的文字』。……提倡『死人的白話』——語錄體，把言語文字同轉到幾百年前的時代去，這些都是『士大夫文字』的復活，和誦經唸佛的復古是一樣的。這種蛆蟲的活現，這種新殭屍的叫喊，在這正須努力着文藝大衆化的進程中的現代，實應加以嚴肅的斥摘，而對於

「白話文」問題之須再提出——大衆的白話文，也是必須的事。（六月二十六日中華日報「動向」佛朗「大衆語文問題」）

4 大衆需要自己底語言——「中國的語言，一向就和大衆離得很遠；古老的文言，固然不必說；就是經過一番革命來的白話，現在亦與大衆沒有什麼關係，早已變成所謂新文言了。現在底大衆是不能不要自己底語言的。……目前突然有一種文言復活的趨勢，過去曾經和它決過勝負的白話及其所有者早已失掉了戰鬪的作用，要克服它只有由現在的大衆以自己底語言來完成。所以目前必須趕快建設起大衆底『大衆語』來。」（新語林半月刊創刊號任白戈「大衆語底建設問題」）

5 大衆語運動是滿足大衆的文化需要的一個長時期的鬪爭——「大衆語的建設……決不能和某些人所想像的一樣，只是看做對『文言復興運動』所起的一種『反動』，實在應該認做為滿足大衆的文化需要的一個長時期的鬪爭；把這鬪爭解釋為白話文言的論戰固然不妥當，就是單從語文本身去認識這鬪爭的意義也是

不夠的。因爲大衆語運動，一方面是要破壞陳腐的語文形式與所寄托的社會意識，另一方面更要利用新的語文工具傳播進步的文化意識於大衆中間。所以這運動必然包含兩種主要任務：一是爲大衆的教育而鬬爭，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即是使語文轉變爲大衆吸收智識發表意見的便利工具；再則是改造中國文化，掃除隱蔽羣衆的奴隸意識，帝國主義文化影響，以及各種寄生的意識形。跟着這兩個問題的澈底解決，也就聯帶解決了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問題。—（新生週刊二十三期關心「大衆語運動的幾個問題」）

C. 大衆語底性質

在這次討論中，關於「大衆語運動底意義」的意見，主要的不出上述幾項。

現在，我們再看第二個問題——大衆語底基本性質是怎樣的？

根據已經發表的許多意見，我們歸納出大家公認的幾個要點：

1.形式方面——關於大衆語底外表的形式的特點，陳子展先生指明說：「所謂大衆語，包括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六月十八日申報自由談陳子展「文言——白話——大衆語」）陳望道先生補充說：「陳子展先生只提出說，聽，看三樣來做標準，我想是不夠的，寫也一定要顧到。……總要不違背大衆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條件，才能說是大衆語。」（三月十九日申報自由談陳望道「關於大衆語文學的建設」）這是形式方面最明顯，最重要的特點。

2.內容方面——內容方面，胡愈之先生首先指出：「大衆語應該解釋作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六月二十三日申報自由談胡愈之「關於大衆語文」）後來陶知行先生修正說：「大衆語是代表大衆前進意識的話語；大衆文是代表大衆前進意識的文字」。他還補充說：「大衆語文適合大衆的程度，需要和意識時，在大衆本身所起的反應是「高興」，所以大衆語文是大衆高興說，高興聽，高興

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七月四日申報自由談陶知行「大衆語文運動之路」）

這補充的說法，實際就是內容和形式統一了的結果。關於這一點，聞心先生說得更透澈。他說：「大衆語……的主要源流就是現代活的大衆日常所通行的話語，唯有最能代表大衆的需要，吶喊，情緒，最能表現進步羣衆的意識的語文，才是眞正的大衆語文。……所以大衆語必然是現代的，富有流動性的，而且必然是在形式和內容上一致，同在用語，寫法，思想上全都拋棄陳腐的屍骸的。」（新生週刊二十三期聞心「大衆語運動的幾個問題」）

3.社會根據——從牠底社會根據上考察，「大衆語是大衆表達自己生活，從大衆自己生活中成長起來的語言。……大衆語是有普遍性的，是時時發展着的。」（六月二十二日申報讀書問答「怎樣建設大衆文學」）這個說明似乎籠統了一點，高荒先生關於這點說得較具體，較透澈。他說：「建設大衆語必然地是大衆底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問題。從大衆底生活需要出發的文化鬬爭，一方面要反

對一切封建的文化麻醉，一方面要滿足他們底文化欲求，使他們底空前的志願和切膚的情緒得到表現。所以眞正的大衆語作品，必然地要帶有大衆底土底氣息，汗底氣息，能夠充分地傳達大衆底生活需要，表現大衆底生活色彩。」（七月十五日中華日報星期專論高荒「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衆語」下）

根據上述幾點，我們已可明瞭大衆語底基本的性質。最後，再把任白戈先生在「大衆語底建設問題」（新語林創刊號）一文中關於大衆語底性質的話引在這里，作爲本節的結論。

「它（大衆語）雖然是隨着文言——白話之後產生的一種語言，但它必然是超過文言和白話的一種較高級的語言。……現在的所謂大衆語，自然是市民社會以下的成千累萬的大衆底語言了。這種語言，必然是爲大衆所有，爲大衆所需，爲大衆所用……必然是拿來爲大衆服務而且很適宜於爲大衆服務的。……大衆語就是一種拿來傳達大衆底思想與感情，而且很適宜於傳達大衆底思想與感

情的語言。更具體地說，就是一種使大衆寫得出，看得懂，讀得出，聽得懂的語言。」

（五）「大衆語」與「白話文」

這次，大衆語運動底基本性質，在上節已經敍述了一個大概。其次，大衆語運動對於「五四」以來的白話文採取怎樣的態度——大衆語是和白話文「手挽手」地並存呢，還是也要「反對」白話文的呢？這個問題是曾經引起激烈的論戰的，這里，我們必須比較詳細地敍述。

這個論爭底最初的起因，是因爲有一位垢佛先生在六月廿三日申報本埠增刊裏發表了一篇「文言和白話論戰宣言」，主張「討論文言文和大衆語是一個戰

局，討論白話文和大衆語又是一個戰局，雙方須將兩問題分別討論，不可混爲一談，使讀者易得認識，不致眼花撩亂口雜言。」六月二十九日就有王鋼先生在沖華日報動向上發表了一篇「一支從斜刺裏射來的毒箭」，指明：「一垢佛先生這篇巧妙的文章」是「文言文在這次受到一個猛烈攻擊的時候，顯然地已經有人搖着鵝毛扇出來獻策，暗示文言文趕快向白話文讓步，用挑撥離間的方法來混亂白話文與大衆語一致的陣容，而且還想進一步奪取白話文叫牠同大衆語自相殘殺！這眞是好巧妙而惡毒的計策！」同時，在這篇文章裏，他講到白話文和大衆語的關係說：「白話文和大衆語並不矛盾。正相反，大衆語是從用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戰鬪中發展出來的。大衆語是白話文的發展，是進步。……白話文和文言文是一個戰局，然而白話文和大衆語是手挽手兒站在一線上的。……凡是一個不願當亡國奴的進步的作者，反對這種亡國的封建妖孽的文言文，必然是贊成救國自發參加大衆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堅實的大衆語。」

另一方面，家為先生在六月二十八日的申報本埠增刊上發表了一篇「歷史固會重現嗎？」他在這篇文章裏說：

「……時代是不斷的在向前進，而社會意識也就得不息地在變動，演進。…文和語，是每一個社會意識的標誌，牠們隨着社會意識的改進而改進。所以在於我們現階段的社會意識的需要，我們是絕端要不得，也來重現五四時代的歷史，以一般智識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洋八股」底「白話文」，來與現階段「古文復興」的死的「文言文」對敵；吾們須要更進一步，隨着社會意識的演進與大衆的需要，我們須得來建設與提倡大衆語，向死了的「文言文」作戰，同時，也得向「洋八股」的白話文進攻！」

同日，申報讀書問答欄發表了一篇「再談建設大衆語文學」，也提到這一個問題，他說：

「語言文字的發展和社會發展一樣，是有其一定的程序的。我們如果要明白

大衆語與白話如何對立，及如何統一，只有從語言發展的過程中去理解。我們說，大衆語是反白話的，這是因爲白話運動並沒有完成牠自身的任務，達到言文一致的成功；反之，它已走上投降文言的危機，成爲語言文字發達的障礙。試看，現在流行的白話文——不是藍青官話，便是變相的八股（所謂語錄體），與大衆有非常大的距離。……但是，這樣說，決不是認爲：反白話等於反古文，反白話也和反古文一樣，有否認全部白話的意思。不是的，我們反對白話，是爲了進一步反對古文，爲了進一步保證獲取『言文一致』的勝利。在『五四』時代，大衆語運動是包含在白話文運動之中的。我們反對白話，並不容否認白話在整個語文運動中所成就的那一部；它宣佈了『文言』的死刑，指出了今後『語文一致』的必然性。所以，在建設大衆語的現階段，我們反對白話之離開大衆，我們却不能不批判地接受白話中那接近大衆語的一切。白話畢竟是與大衆語距離較近的東西。……語言不是靜態的，而是隨着社會生活的進展，時刻變動着的。五四

時代白話文的產生，同時也就是大衆語文的出發點。在這一歷程上，在白話與大衆語對立的發展中，大衆語愈漸成長，則豪紳買辦的白話愈顯出衰弱，愈暴露出它的反動性，如果我們否認白話文中大衆語的存在及發展，我們便無異否認整個語言運動，甚至文化運動的意義。……我們試拿五四前後的白話文與現在一般白話文相比，拿選少們的白話文來和大衆文學作家作品相比，就可知道何者更接近於大衆。這里所謂接近大衆，不僅指語言，且指內容；這里的大衆不指保守的大衆，而是前進的大衆。」

這兩篇文章發表之後，到七月一日中華日報動向裏就發表了司馬跐先生的「內容和形式」和王鋼先生的「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這兩篇都是主張「不反對白話文」的。

王鋼先生說：

「凡是每個眞正反復古運動的進步作者，不應該機械地在幾個排列着的名詞

之前發昏，幹着文章遊戲；而應該實際地看見國亡家破的嚴重，看見每個凡是不願當亡國奴的對於亡國的封建妖孽的憤恨，同時對於復古運動裏的復興『文言文』所起的憤恨和反抗。從表面看，問題雖着重在反對『文言文』，然而，這根據是起於反亡國的封建妖孽，因爲反復古運動反『文言文』的問題深入了，必然地會感到五四式的『白話文』在運用上已經不夠，須得更進一步的建設『大衆語』，才能完成這個使命。『白話文』和『大衆語』是不能像申報『讀書問答』的『再談建設大衆語文學』那麼機械地對立的。如果不從實際的反復古運動這個問題出發，而只是在那兒咬文嚼字，只是在『白話文』『大衆語』幾個字面上去變花樣，從表面說是文章遊戲，從骨子裏說是在替復古運動造機會。家爲先生這篇文章（指『歷史固會重現嗎？』——編者）恰巧就是這樣。……我認爲在這里應該特別提出，在這個反復古運動反『文言文』的戰鬪中，決沒有反對『白話文』的理由（大家不但要建設『大衆語』，而且也要『白話文』，）而是反對那些利用

『白話文』『大衆語』去散佈毒素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妖孽。』（『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

司馬疵先生說：

『……『文言文』不過是早已經被制死了的殭屍，亡國的封建爲要掙扎牠最後崩潰的命運，又想把牠復活起來去麻醉大衆，很顯然地是有着牠的背景和作用；而反對者方面則大多認爲那東西並不値得一駁，主要應該反對的是它的作用——即是反對那種復古運動，要眞正能夠澈底完成這種任務，大家所認清的就是現在不是五四時代的性質，唯一的方法只有建設『大衆語』，並且還要糾正五四式的『白話文』之不夠的地方。關於這個爲了守護『白話文』反對復古運動反對『文言文』，同時提出建設『大衆語』的這個問題，還有一個和五四時代不同的特點，就是：大家所注意到的已經不是單純的形式方面『文言文』和『白話文』『大衆語』的戰鬪，而是已經看清了光明的將來，看見了主要的前進的大衆，實

際地注意到戰鬪的內容。這爲大衆所迫切要求的問題，已經有着廣大開展的趨勢。這種趨勢，就是共同站在反對亡國的復古運動出發，從『白話文』發展到『大衆語』——『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胡愈之）。這就是牠的眞實內容。：至於『白話文』應該要怎樣的批評和糾正的問題，是應該和當前大衆的要求的內容不能分開的。像申報『談言』上家爲先生那樣乾脆地提出反對，我們是要反對的。至於申報「讀書問答」上那樣機械地把『文言文』和『大衆語』對立，雖然牠後來又修正過說是『對立的統一』，我們還是提出批判。……」（『內容與形式』）

這兩篇文章發表以後，關於「大衆語是否反對白話文」的論爭就正式開始了。主張「不反對白話文」的，主要的是王鋼和司馬疵兩位。主張「反對白話文」的，主要的是若生，霓璐，家爲和申報「讀書問答」等幾位。

關係這論爭的文章數量非常多，當在五萬字以上。現在除去那些翻來覆去以

及互相指駡的文章，把兩方面主要的理論介紹在下面：——

A. 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

1.「白話文和大衆語並不矛盾，正相反，大衆語是從用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戰鬬中發展出來的。大衆語是白話文的發展，是進步。（六月二十九日動向王鋼「一支從斜刺裏射來的毒箭」）「大衆語……是白話文的發展，難道離開白話文可以從半空中掉下來麽？」（七月二十一日動向王鋼「建設大衆語不應該放鬆了反對復古運動」）

2.「……在五四時代提出的內容是民主主義和科學，白話文的發展就是在這樣的雰圍中造出來的。雖然當時並沒有完成牠的任務就妥協了，但是白話文本身多少還有點是現代的。……並且牠這種形式還比較的精密，在文法上還比較科學的，並不如讀書問答上所說『大衆語愈漸成長，則豪紳買辦的白話愈顯出衰弱，愈露出它的反動性。』」（七月一日動向司馬靴「內

容和形式」））「……五四運動所興起的白話，盡過很大的任務，是從反帝反封建出發的；至於社會發展的現階段的性質雖然和五四運動的性質不同，並沒有超出反帝反封建的範圍呀！那末白話文還有着牠多少的進步性。雖然新興資產階級回頭去和封建携手妥協了，是牠本身去妥協了，白話文還沒有完全被牠所葬送，進步的東西牠是沒法完全帶走的，牠只有設法使牠封建化。」（七月十二日動向王鋼「再論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在將來的時候，比較科學一點的白話文，那種優良而又簡單的一部分一定可以批判地接收到手上而使牠更豐富起來，這才是所謂『大衆語是從白話文這基礎發展而來的』。這才是所謂『奧伏赫變』。」（七月十二日大晚報火炬司馬班「爲大衆語問題批評答讀書問答暨覺璐先生」）

3.「我們要知道牠（白話文——編者）的反動性是在牠的內容，而不在牠的形式。何況大衆語是依據當前的大衆的要求，從『白話文』這個基礎發展

出來的。所以大衆語決不能而且也不應該機械地和白話文對立。只在我們用甚麼內容來用這種形式。」（司馬疵「內容與形式」）

4.「……大家所要守護着的『白話文』和正在展開討論着的『大衆語』，實際上，封建這東西早已在那里運用着了。現在的封建究竟比五四時代聰明，你以爲牠好像只是頑固地在那里復興『文言文』反對『白話文』和『大衆語』嗎？其實牠却同時不聲不響地穿着『白話文』和『大衆語』的花衣跑到大衆中播去了。」（六月三十日動向司馬疵「不要上當」）「……爲甚麼封建都可利用，我們自己却要拋棄或者對立？這不是向敵人繳械麼？……還有甚麼比束着手等帝國主義的刺刀和皮鞭打到我們的身上更痛苦，更切身而且更迫切的麼？只要可以把這種亡國殺身的大禍告訴大衆，可以喚醒大衆起來救國自救的，無論甚麼形式都可以用，所以『白話文』我們絕對不能攻擊或放棄，牠的難懂或不夠的地方，我們只有竭力地批判

地去糾正，應用。」（司馬疵「內容和形式」）

5.「雖然牠（白話文——編者）這種形式歐化氣太重，而且還夾雜一些『文言』，以致脫離了大部份的大衆，可是還有一部份大衆，比如學生，小市民，還能懂，還在牠的影響下。」（司馬疵「內容與形式」）「白話文，大衆自然不大懂，可是一般進步的智識份子和小市民是懂得的。大家提出『大衆語』的問題，是爲了大衆，同時也喚醒這般進步的智識份子和小市民，要求他們到大衆中去實踐，共同來建設『大衆語』。可是在大衆語還沒有建設起來的時候，我們就不用『白話文』去和他們講話麼？要知道進步的智識份子和小市民在中國是佔一部份的數量的。況且中國是半殖民地，要領着他們起來發展民族反帝戰爭，『白話文』這一個有力的形式，我們決不能反對。」（七月十二日動向王鋼「再論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

6.「自然我對『自由談』上傅東華先生和胡愈之先生說的認爲大衆語在『目前要話文合一是辦不到的』這話，還不能完全同意。……我們要提出實踐的問題，眞正在大衆中去學習理解，要『辦』也未嘗辦不到，但是這只是可能性，還不是到了『現實性』的時候。……如果這麼乾乾脆脆地把白話文『滅亡』，而大衆語還沒有眞正建立起牠的基礎的時候，那末我們也就乾乾脆脆地抄着手等待『大衆語』建設起來才寫文章麼？要知道『可能性』與『現實性』這兩點應該認清楚的，大家所以要在這時期把建設『大衆語』這問題强調地提出來的意思，就因爲這種語言已經有着『可能性』，同時也就說明能澈底領導着凡是不甘心當亡國奴的同胞去反抗的，就只有前進的，勞苦大衆。」（王鋼「再論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

（註）「請問翻譯外國名著或作精密的科學論文在目前不用『白話文』辦得到麽？然而我這並不是特別尊重或「追戀」白話文的意思；正相反，倒

是說明在大衆語還沒有眞正完全建立起來的時候，在『補助』的意義上，在社會的形式的多樣性的作用上，白話文決不能拋棄而有趕快糾正的必要。」（司馬疵「爲大衆語問題批評答讀書問答暨覓璐先生」）

（註）「關於『大衆語』底『可能性』與『現實性』一點，司馬疵先生底意見很有點不同，他認爲：『……在某種程度上，大衆的語言是正在銷磨自己的難懂處，接受別人的比較普通的字眼，大衆的語言確是正在變化，形成，發展着的。這問題要達到具體，實際，就只有靠我們自己在大衆中的實踐。……從大衆文學發展的鐵的事實證明，我們可以預測到『大衆語』這貨色，不久一定會眞正的出現；不但是不久而且已經正在出現。……自然在目前話文合一還沒有辦到，可是我們如『要』去辦到也未嘗不可以辦到。……我以爲問題不是在目前辦得到或辦不到，而是看大家眞正地去在怎麼辦。』」（「內容與形式」）

B.建設大衆語必須反對白話文：

1、「……五四運動所興起的白話，是那時新興資產階級要求民主政治的一種表現，在反封建上果然已盡過很大的任務，但因他們階級本身的缺陷，不能進一步幹個徹底。他們只在字面上『白』『不白』的兜圈，不敢深入到社會的底層去和大衆相聯繫，所以留了一條給『封建』復興的路。另一方面，更因戰後國際帝國主義的加緊壓迫和其他的關係，反使他們遠離了大衆而回頭去和封建攜手妥洽了。在語文上也祇將『之乎者焉』換了『的那呢嗎』的變相八股。」（七月四日申報本埠增刊若生「建設大衆語文應有的認識」）「白話文中正潛伏着封建意識的妖孽和含蓄帝國主義的毒素。……」（七月三日大晚報「火炬」霓璐「大衆語問題批判」）「隨着社會意識的演進與大衆的需要，我們須得來建設與提倡大衆語，向死了的『文言文』作戰，同時，也得向『洋八股』的白話文進攻！」（家爲「歷史固

會重現的嗎？」）

2.「現在比之五四時代，雖然並沒有超出反帝反封建的範圍，但是社會發展的現階段的性質和五四時代的性質不同，所以反帝反封建的前衛，不應是白話文而是大衆語。因爲只有大衆才是眞正的反帝反封建者，……」（七月二十日「動向」若生「爲建設大衆語文的問題」）

3.「司馬先生以爲『白話文的反動性是在牠的內容而不在牠的形式』，『只在我們用什麽內容來用這種形式，』……司馬先生只知道形式的利用，但沒有想到有着『反動性』內容的白話文，足以影響牠形式的反動性而向正在萌芽的大衆語以迎頭的痛擊。」（七月十八日大晚報「火炬」覺瑙「爲大衆語問題批評致司馬疵王鋼及其他白話改良主義者們」）「……注意內容是對的，但因注意內容而完全忽視形式，於是連所謂內容也弄成神祕的東西，不僅否認了目前大衆語運動，連自『五四』後，整個語文運動的發

展及成就也否認了，這是多麼嚴重的錯誤，……」（七月七日申報讀書問答「爲大衆語問題答司馬疵先生」）

4.「五四下來的白話文，只是爲了上層的資產階級與一般智識階級的所有物，而且牠那麼一下子就停下來，甚至早就回向『妥協』與『投降』的路上，而造成了一種全不能爲一般的大衆所能懂的，充滿了歐化氣與八股氣的『買辦文字』。正爲了這樣，所以在那般特殊階級的統制與政策和封建餘孽的喪心病狂的復古運動，正加速地漫佈與展開的時候，雖然已經是成了殭屍的『文言文』，就不免想乘此復活起來。因此，在今日要『爲了大衆』，進一步的建設起大衆語來．就非反對這種『新八股』不可，把牠那種爲大衆們根本不能懂，也不能要的歐化氣與八股氣全數拋棄了，這樣來把牠的內容與形式澈底與伏赫變一下不可。」（七月八日大晚報「火炬」一家爲「關於批判與認識」）「我們反對白話是爲了進一步反對古文，爲了

進一步保證獲取「言文一致」的勝利。」（三月二十八日申報讀書問答「再談建設大衆語文學」）

5.「司馬先生以爲白話文雖然『脫離了大部分的大衆，可是還有一部分的大衆，比如學生，小市民還能懂，還在牠的影響下』，所以還要支持牠。但是，司馬先生却遺忘了文言文也何嘗沒有牠一部分的羣衆呢？我們不能因爲牠們還有一部分的羣衆受牠的影響而去支持牠們，而放棄了對文言文和白話文的……意識的鬪爭。」（霓璐「爲大衆語問題批評致司馬疵王鋼及其他白話改良主義者們。」）

6.『……這次大衆語言的運動中，蘊藏着社會機構的變革及其意識形態的反映作用。……這不是語言或文字上單純地變形，而是社會意識的變革反射在語言文字上底『文化革命』的行爲。所以大衆語運動決不是……單純的『反復古運動』，而是大衆爲了自己……的解放，要求着代表自己意識的

語言和文字的解放鬪爭。」（霓璐「爲大衆語問題批評致司馬疵王鋼及其他白話改良主義者們」）

7.「白話並不是完全代表官僚買辦意識，誰都知道；而我們所要反對的却是那些代表官僚買辦意識的白話文，決不能……因爲牠五四的功績而囫圇吞棗地無批判地接受。……語言是跟着一切物質現象而不斷地變動發展的，新的成分愈漸生長起來，則舊的也愈衰落下去，我們的建設大衆語應該是批判地吸收它（指白話文）底新鮮的，前進的，而極力排斥它底陳舊的，腐化的。」（若生「爲建設大衆語文問題」）

以上所舉，可說是這個論爭，兩方面的理由底大概。關於這個論爭，也曾有過一些旁觀的批判，首先是七月十日「動向」上所發表的張庚先生底「大衆語論戰中之幾個成問題的問題」（詳見附錄二），但是張先生底意見並不能得到司馬疵王鋼二先生底同意，這里不詳細介紹了。其次是七月十五日中華日報星期專論

所發表高荒先生的「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衆語」，在這篇文章裏，他說：

「文言文底勢力，一方面表現在它還沒有失掉的廣大的地盤（公文，信札，各種應酬文，報紙，……最重要的是學校國文作文等）上面，另一方面，普通所謂白話文，在內容上形式上都是和文言文相通的白話文，是文言文最有力的友軍或後備勢力。……說白話文是買辦資產階級底東西，這顯然是一個不正確的估計。白話文固然有和買辦資產階級相通的一面，但也有和大衆相通的一面。在形勢上，白話文底基本的詞彙和語法，也是勞苦大衆口語底基礎部份；在內容上，白話文現在創造了不少的進步的作品，是理論飜譯底唯一工具。我們不能把和大衆底生活需要結合着的白話文拋掉。大衆裏面的作家會把白話文裏面合乎大衆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衆需要的部份消滅，在實踐中將白話文『揚棄』。」

這意見，大體上是可以得到兩方面同意的。實際上，兩方面底意見原來頗有

共同的地方，只是大家都很意氣，以致「戰」得很厲害，似乎彼此完全相反了。根據上面所擧兩方面底論據，可以明白：建設大衆語必須「揚棄」（奥伏赫變）白話文，吸收白話文中合乎大衆需要的部分，消滅不合乎大衆需要的部分——這基本的一點，大家都是承認的，不過彼此的理解有點不同，以致釀成大論戰。

其實，既然承認：「建設」大衆語必須「揚棄」白話文，那末在肯定大衆語底進行建設中，對白話文底繼續發展確實是含有「否定」的意義的；同一個時代，同一個階層決不會有兩種同樣適用的語文並存着。白話文自五四以至現在，有和大衆接觸的長久的歷史，必然會有許多接近大衆的成分；籠統地反對當然是錯誤的（即反對者方面似乎也很少籠統地「反對」的意見），但是籠統地「不反對」或說只要「改善」或者「糾正」就夠，顯然也是不對的；因為白話文底缺陷（不能接近大衆的弱點）已經不是部分的「糾正」所能解決，這已是公認的事實，否則正無需提起「建設大衆語」，只要「白話文大衆化」已經夠了。「大衆

語」是較白話文高一級（進步一級）的語文，當然不是與白話文同等而並存的——即使是「糾正」了的白話文。目前（在大衆語沒有健全地建設起來以前），有條件地運用白話文（澈底肅淸歐化文言化的語法，抵制地接收外來語，土語，方言底詞彙，極力地去適合大衆底需要，）應當看做建設大衆語的過程底第一步——由白話文接近大衆的部分底量的增加進到質的轉變（轉變成大衆語）——，決不能看做是推進白話文本身底「改善」或發展的手段。只有大衆語是適合大衆需要的唯一的語文，白話文底任何程度的「糾正」或「改善」都是不濟事的（不能適合大衆需要的！）

高荒先生在「白話和大衆語的界限」一文（七月二十一日「動向」）中所說：

1.大衆底生活需要是統一的，大衆語一定會一方面提高或加多和白話相通的成分，一方面獲得更多的了解者，部分地部分地在白話裏面爭得地位。

2.大衆語底生活需要是變動的，發展的，他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能力也是

一天一天地改變或加深。所以，爲了表現他們底新的需要或認識，在大衆語里面加入新的字彙新的表現法就絕對必要了。而供給新的字彙新的表現法的唯一的源泉，就是白話。換句話說，爲了適應實際的生活需要，大衆語會部分地部分地征服白話，部分地部分地把白話變成自己底東西。產業工人對於機械名詞等的了解，兵士對於武器和各種表現軍隊生活規律的名詞等的了解，農民對於變動生活中的名詞和流行說法等的了解，就是明證。

3.現在的「白話」是不是有獨立的功能呢？我底答覆是肯定的。語錄體，不文不白的騾子話，當然要反對，但句法底歐化，輸入新字，批判地採用文言詞彙，不但不應該籠統地反對，而且必要，雖然另一方面要盡可能地使它容易懂。翻譯，論文，銷行廣大的地域報紙決議等，非用這種白話不可。我還以爲，以學生，知識份子，店員，小市民爲對象的文藝作品，這樣的白話也是絕對必要的。（我曾見過能看「一天的工作」「僞自由書」的工人。）這樣的白話，雖然很少

能夠直接被大衆所了解，然而都是間接被大衆所需要。這樣的白話，隨着大衆底反帝反封建的國民經濟改造的發展和勝利，一方面部分地部分地被大衆語征服，成爲大衆語底源泉之一，一方面漸漸被大衆語所充實所「揚棄」，可以成爲高級的大衆語底前身。

這些意見，我覺得是不能完全同意而可以討論的。

第一，大衆生活底需要確實是「統一的」；但是這點，只會使大衆語由多元的（詳下節）發展到統一的，並不一定會提高或加多和白話相通的成分。大衆語趨向「統一」並非「接近白話」（提高或加多和白話相通的成分）。「白話文」是完全不和「話」一致，更不是和大衆底話一致的。

第二，大衆底生活確實是「變動的」，大衆語裏面加入新的字彙新的表現法也確實「絕對必要」，但是供給新的字彙新的表現法的唯一源泉却不是「白話」，而是大衆底生活本身。大衆語跟着大衆生活底需要，一方面會從方言，土話，外

來語，白話等當中吸收新的語彙新的表現法，另一方面更會創造許多新的語彙新的表現法，所以白話決不是供給新的字彙新的表現方法的唯一源泉。「大衆語」是較「白語」高一級的語文，並非是低級的東西。就如「產業工人對於機械名詞等的了解，兵士對於武器和各種表現軍隊生活規律的名詞等的了解，農民對於變動生活中的名詞和流行說法等的了解」，都證明：「白話」並非供給新的語彙新的表現法的唯一源泉，而大衆底生活本身才是唯一源泉。因爲他們所了解所運用的名詞和流行說法中，有許多是白話裏所沒有的。

第三，繙譯論文……並不是「非用這種白話不可」；以學生，知識分子，店員，小市民爲對象的文藝作品，這樣的白話更不是「絕對必要」。大衆的非常需要繙譯，論文……等的，同時「大衆語」是較「白話」高一級的，最適合大衆的語文，那末繙譯，論文……當然不能當做專門家的專利品，當然必須學習用大衆語來寫，當然不能留做白話的特殊地盤。學生，知識份子，店員，小市民，只要

他們底意識是前進的，就必然會和大衆融合在一起，他們底生活既有和大衆融合在一起的趨向，那末以他們爲對象的文藝作品用大衆語寫當然是絕對必要的，因爲這樣可以推進他們和大衆底融合，若是定要用白話寫，那末以他們爲對象的文藝作品會成了阻礙他們與大衆融合的力量！

總之，在大衆語運動中，把「白話文」估價得過低（如說牠完全是有害的）或過高（如說牠有現代性進步性或說牠是大衆語的唯一源泉）都是有害的。

（六）大衆語運動中的幾個問題

大衆語運動對於白話文的態度，在上面已經敍述了一個大概；這里，我們還要敍述大衆語運動中幾個具體的問題。

A.「普通話」和方言土話問題：——

這里，包含兩個具體問題，第一是「大衆語底標準」問題，第二是「方言土話採用」問題。不過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不能分開的，也可說是一個問題底兩面。

關於「取那一種語言來做大衆語底標準」的問題，首先提出的是魏猛克先生，他在三月二十三日的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一篇「普通話與大衆語」。在這篇文章裏，他說：

「……『現代中國普通話』是有普遍性的，牠是主要的流行在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舖，遊藝場等處。工廠不過也受到影響，這是客籍的工人帶進去的，但因爲他們的生活不是流動的，久之就要和當地的語言同化。所謂普通話的因爲交通發達，各地人們往來日漸密切，要求交涉上的便利而產生的。所以牠的目的只在要人懂。牠不是容納各種土話，牠是竭力避免各種土話。牠在企圖每句話都能夠說得出，寫得出，每個字眼都找得出意義來。……自然，『現代中國普通話』還沒有達到完善之境地，有時還夾雜些所謂『南腔北調』（零碎的土話），但牠必然會隨着交通發達而進展。隨着社會意識的轉變而轉變。中國處在世界的狂潮之下，語言的統一當然不

是久遠的事，那時統一的語言爲『現代中國普通話』轉變而成，大約也未必會錯。所以我想，採取有普遍性的『現代中國普通話』作爲建設大衆語文學的基準，是可以的。……」

「……現在的普通話雖已有統一性，但還沒有完成，沒有盡善；但，我們却不能不承認普通話已走上了成功的道路，已在完成的過程之中，我們決沒有等到中國的語言完全統一之後，再來建設大衆語的那樣的傻事的。我們現在建設大衆語，應該是一面採取，一面創造，採取一般的大衆自己從實生活中建立起來的語言，創造與一般的大衆的實生活相連系的字彙。」（七月十五日大晚報「火炬」魏猛克「白話文，普通話和土語方言」）

此外，傅紅蓼先生關於這個問題，也發表過類似的意見，他是說「大衆語應當以中國語爲標準的推行。」「這裏所說的「國語」，是採用從前曾倡用過的「拼音」，……藉之把全國語言的複雜統一了之後，成爲一種普遍階級的語言。

……而這種國語——大衆語——所表現出來的是屬於大衆的（注意，這裏所說的大衆，不僅勞苦，是把貴族者羣，也溶化到我們的隊伍裏來）……」（見七月八日及十五日「動向」）傅先生的意見，確如昊午先生所說：「……那並沒怎樣脫掉『京話』跟『方塊字』大衣的『國語』，跟再加上『叙裙』的什麽『平上去入』的高貴玩意兒，老實說，不能夠成爲「藉之把全國語言的複雜統一了之後，成爲一種普遍階級的語言！』」「……『貴族者羣』現在正紅光滿面地高呼『復古』呀！以『復古』而來『溶化到我們的隊伍裏來』，我想，傅先生肯，他們也不肯吧？」（七月十九日「動向」昊午「我祇稍微再說幾句」）其實，「國語運動」不能成功，十餘年來的歷史早已證明；把「大衆語運動」和「國語運動」併做一段，完全是不了解這次「大衆語運動」底社會意義的曲解！這里不再用多的篇幅來檢討這種理論。主要的，還是魏猛克先生的意見，比較精密，系統得多。

對於魏先生的意見，反對得最厲害的是陳弃先生，他從各方面證明：「……

現在不單是全國到處的輪船，火車，客棧等地方不會有一種統一的話，就是單獨的在一個都市裏，也沒有這樣一種通行統一的話的。」（三月廿九日大晚報「火炬」陳弈「什麼是現代中國普通話？」）

實際，要拿「普通話」來做建設大衆語的基準，確實太空洞，渺茫，因爲「普通話」即如魏先生所說，也還是「沒其完成，沒有盡善」的，那末當然不能當做大衆語的基準。不過說這種「普通話」完全沒有一點存在，也是不合事實的。耳耶先生所說：

「……現在並非已經有一種大衆在說着的全國通行的大衆語存在。雖然有比較普通的話，也不過是比較有作大衆語底基礎的資格，並非已經就是我們所要建設的大衆語了。這普通話底語彙很少，表現力，表現方法都非常不充分，它需要大衆來充實。但是廣大的大衆說的還是土話，懂得最深的也還是土話。要大衆充實普通話，使普通話豐富起來，成爲最普通有力的大衆

話，還需要大衆底努力。」（六月廿六日「動向」耳耶「大衆語跟土話」）

這意見是比較正確的。

既然沒有一種全國通行的完成的普通話，可以做大衆語的基準，那末「方言土話的採用」問題，自然就被提出來了。主張採用方言土話的，耳耶先生是很主要的一個。他接着上面所引這段話說：

「自然，辦法是不止一種的。但辦法之一，應該是提倡用土話寫文章，掘發土話中的寶藏。如果把土話否定了，就是斷絕了充實普通話，使普通話成爲大衆語的一種動力。對土話的態度，應該跟對文學遺產的態度一樣：抵制地接受，合理地揚棄。」（「大衆語跟土話」）

對於採用土話方言表示反對的，主要的是佛朗魏猛克和霓璐三先生。

佛朗先生說：「……土話我始終認爲是保守的，含有封建意味的，它保持那地方固有的舊的辭詞，新的內容很難在這種舊的「話框子」裏適宜地表現，我

們是要把新的內容去發展到舊形式，工具的破壞，現在却反而要保存固有的「話框子」，對於新興術語的提示，將會受到阻礙，而於文化落後的窮鄉僻壤，更加不適宜。」（七月八日動向「再提出點意見」）

魏猛克先生說：「……土話是原始的，沒有進步性的語言。土話寫得出來只讀得出聲音，找不出意義（音義雙全的「土話」，便是人人可懂，人人能說，不成其為土話了……）……」（「普通話與大衆語」）

霓璘先生說：「……把土話提倡起來，那麽，在語言極其複雜的中國，徒然增加了多種多樣互不了解的語言上的隔閡，因此，更容易使普通話混亂，更容易分散各地居民的文物聯繫，更難養成大衆底寫作（因為土話不易寫成文字），也就更難建立起大衆語來。這樣，不但不能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反之，是愈加阻止了大衆文化水準的統一和向上性了。……」（七月六日大晚報「火炬」霓璘「大衆語問題批判」）

這三位先生對土話底一般的性質及提倡土話的反作用底說明，都是對的；不過他們所反對的似乎都是無條件地採用土話或提倡土話，對於「土話中有一部份優良的成分」以「大衆語可以批判地吸收牠底優良的成分」這一些意見，是並不反對，甚至同意的。

佛朗先生曾說：「……我也承認有許多土話是已經逐漸成爲大衆語（大衆的普遍語自然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七月九日動向「再提出點意見」）

魏猛克先生也說：「各地的土語方言，……我們就是要採用，也必須嚴格的選擇。自然，我們做各地（農村）的文化工作，初步只好利用土語方言，但不可忘記了『鬬爭』，我們是從這里出發，無反動性，有普遍性的土語方言固然要採用，而有反動性，無普遍性的土語方言也要慢慢的消滅它。」（七月十五日大晚報火炬「白話文，普通話和土語方言」）

霓璐先生更說：「……我們只有批判地接受土話中的語彙及其地方色彩，而

不能提倡土話。」（「大衆語問題批判」）

實際，反對無條件地採用土話或提倡土話，而主張批判地接受土話底優良成分，由這里漸漸地發展到統一的大衆語，這已經是大家共同的意見。

所以，關於「普通話和方言土話」的問題，並沒有根本衝突的意見，高荒先生所說：「……一方面被以大衆底生活需要爲基礎的文化鬪爭任務所規定，一方面被中國言語底分歧條件所規定，所謂『大衆語』，一定不是一元的『國語』式的東西而是各各以當地的大衆爲對象的多元的發展。」（七月十五日中華日報星期專論「由反對文言到建設大衆語」）這意見是可以當做這個問題底結論的。

B. 寫法拉丁化問題：——

其次，在大衆語建設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大衆語寫法拉丁化」的問題。首先提出這問題的是張庚先生，他在「大衆語底記錄問題」（六月廿四日「動向」）裏面說：

「……方塊字實在是一種死字，「文言字」封建字。……它實在記錄不了大衆語這豐富活躍的語言。否則必定會把大衆語拖向殭死的路上去。……蘇俄創行了一種中國語拉丁字，推行也很廣，而且出版了很多書報，這我們是可以拿來研究的。」

接着，葉籟士先生在「大衆語，土話，拉丁化」（七月十日「動向」）一文裏，提出了更具體的材料和意見，他說：

「關於中國語言的拼音化，過去已經有了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注音符號』（原名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它們的最大缺點，就是都以北平話張迫作爲標準，而要學像這種『京腔』，即在知識份子也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只要看自政府發表以來直到現在，可曾得到幾分效力？注音符號因爲不能忘情於方塊字結果成了非驢非馬的怪物，而且不便書寫。至於國語羅馬字，因爲要嚴格區別四聲，拼法就變得非常煩雜難學。據說知識份子也須二三年才

能學會，所以對於文盲大衆不用說是根本要不得的。在簡易學上，在蘇聯華僑創製的「拉丁化中文」（創製者是蘇俄華僑文化突擊隊領導下的「遠東邊疆拉丁化委員會」）就要强得多。「拉丁化」不但廢去四聲，而且聲母（子音）單獨也能發音，像漢字中「文字」兩字，國語羅馬字要拼作 Wentzyh。而拉丁只作 Wenz。又如「世界」兩字，前者作 Shyhjieh，後者作 Shgie，自然要簡易得多。蘇聯的華僑以山東人佔多數，所以「拉丁化」是以山東，河北，東北一帶北方話作標準的。牠的目的在於給該處大衆以一種筆頭語，並不是用來强迫全國用作普通話的。根據拉丁化委員會的意見，中國可分全國爲五——七個方言區，而把各方言都拉丁化，以消滅各地的文盲。因此「拉丁化」是非常值得我們的研究和參考的，我們特別注意的是：牠不是學者書桌上的方案，而是在伯力海參威一帶華僑中已是一個極廣泛的文盲大衆掃除運動了。」

岡林先生在「蘇聯各民族文字的拉丁化與漢字書法拉丁化」（八月二日至四日「動向」，詳見附錄二）一文底「譯者附言」裏更告訴了我們許多中國文字拉丁化的具體材料；他說：

「自第一次拉丁化中國文字代表大會在海參崴開會後於一九三二年又舉行了第二次大會。到今日止遠東的中國勞動者已經有四千人學會了新文字，他們都可以用新文字寫信作文章。遠東除出版了教科書字典外，最近又用新文字出版了報紙。莫斯科，列寧格勒也翻印了一些新文字的書籍。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蘇聯各地的中國勞動者及學生，都已開始學習新文字。」

確實如岡林先生所說：「作爲大衆踏建設的先決事項，作爲提高大衆的政治文化水準的革命工具的拉丁化中國文字，已經不是可能或不可能原理上的問題，而是如何鞏固已有的成績，加深研究，把這項工作發展到國內來的問題了。」

（七）結論

這次，由反對「文言復興」而發展到大衆語運動，我們不能不說是一個很有歷史意義的正確的展開。現在，大衆語運動已經不是「應不應該」或「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怎樣做」的問題。——就是問題已由原則的討論進到具體的實踐。今後爲着推進大衆語運動底發展，主要的是在四項具體工作上努力，那就是：

——

I.白話文底極端的大衆化

2. 方言土話文學的創製

3. 中文寫法拉丁化的研究

4. 大衆的「大衆語團體」底組織

這四項工作底實際的進行，無疑地是足以保證大衆語運動底勝利的。

附錄一

語文論戰文獻編目

題目	作者	刊物	月期
禁習文言與强令讀經	汪懋祖	時代公論一一〇號	五月四日
「駁小學參教文言中學讀孟子」	吳研因	京滬各報	五月份
讀了「禁習文言與强令讀經」以後	龔啓昌	時代公論一一三號	五月廿五日
中小學文言運動	汪懋祖	時代公論一一四號	六月一日
讀白話「中小學文言運動」後的聲明	吳研因	京滬各報	六月份

篇名	作者	刊物	日期
文言復興之自然性與必然性	許夢因	中央日報	六月一日
白話文言鬬爭史的重演	周曙山	政治評論一〇五號	六月七日
小學讀經與學習文言	余景陶	時代公論一五五號	六月十五日
告白話派青年	許夢因	時代公論一一七號	六月二十二日
鬼話文的復活	魏猛克	大晚報火炬	六月六日
關於文言文	徐懋庸	申報自由談	六月十五日
什麼是文言？	曹聚仁	申報自由談	六月十六日
文言，白話，大衆語	陳子展	申報自由談	六月十八日
關大衆於語文學的建設	陳望道	申報自由談	六月十九日
從文白鬬爭到死活鬬爭	樂嗣炳	申報自由談	六月二十一日
文言的前途	稜磨	申報自由談	六月二十一日
爲白話文敬告林語堂先生	耳耶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二十一日

文言文	齊速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二十一日
話跟話底分家	耳耶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二十二日
怎樣建設大衆文學	讀書問答	申報讀書問答	六月二十二日
關於大衆語文	胡愈之	申報自由談	六月二十三日
「大衆語」不能離開「寫什麼」的問題	俞遙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二十四日
大衆語底記錄問題	張庚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二十四日
話跟文章底分家	耳耶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二十五日
雜談讀書作文和大衆語文學	葉聖陶	申報自由談	六月二十五日
普通語與「大衆語」	魏猛克	申報自由談	六月二十六日
文言和白話論戰宣言	埽佛	申報本埠增刊	六月二十六日
建立大衆語運動的態度	朱瑞鈞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二十六日
大衆語文問題	佛朗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二十六日

篇名	作者	刊物	日期
這阻力是並不輕微的	羅　浮	大晚報火炬	六月二十六日
關於演劇對話的應用話問題	皇　易	大晚報火炬	六月二十六日
先使白話文成話	夏丏尊	申報自由談	六月二十七日
南京通訊	小　默	申報自由談	六月二十七日
再談建設大衆語文學	讀書問答	申報讀書問答	六月二十八日
大衆語問題討論的現階段及以後	傅東華	申報自由談	六月二十八日
關於「文言文」底形成跟發展	耳　耶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二十八日
文言文與新文言	胡　繩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二十八日
歷史固會重現的嗎？	家　爲	申報本埠增刊	六月二十八日
我也談談文言與白話的論爭問題	姜　琦	申報自由談	六月二十九日
一支從斜刺裏射來的毒箭	王　鋼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二十九日
給討論大衆語的人進一備忘錄	吳　午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二十九日

什麼是「現代普通話？」	陳奕	大晚報火炬	六月二十九日
大衆語的疑問	朱伯	申報本埠增刊	六月二十九日
關於大衆語的建設	樊仲雲	申報自由談	六月三十日
不要上當	司馬疵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三十日
關於「白話文」底發生跟成長	耳耶	中華日報動向	六月三十日
兩種錯覺	曹聚仁	申報自由談	六月三十日
文言，白話，大衆語	白兮	申報本埠增刊	六月三十日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件	文心	新生二十一期	六月三十日
文白鬪爭的展開	落萍	新生二十一期	六月三十日
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	王鋼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一日
忘掉了反面	傅紅蓼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一日
內容與形式	司馬疵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一日至二日

題目	作者	報刊	日期
開快車時候的一個備忘錄	耳耶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二日
自買自賣	稻子	大晚報火炬	七月二日
關於文白之爭	蔓若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三日
大家再來一回反古運動看看	何鬯夫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三日
語言文字又將成爲套狗圈	趙華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三日
大衆語的產生與建設	寒白	申報本埠增刊	七月三日
什麼是大衆語？	雅非	申報本埠增刊	七月三日
關於大衆語文學底建設	王任叔	申報自由談	七月三日
建設大衆語應有的認識	若生	申報本埠增刊	七月四日
談談大衆語的大衆	蓮岳	大晚報火炬	七月四日
拈一點蛆蟲給大家看看	稻子	大晚報火炬	七月四日
大衆語文運動之路	陶知行	申報自由談	七月四日

從中學生寫作談到大衆語	尤墨君	申報自由談	七月五日
「什麽是大衆語？」	王　鋼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五日
大衆語的建設問題	任白戈	新語林一號	七月五日
「大衆語」與「教育大衆」	吳　午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六日
我理想中的大衆語	王人路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六日
大衆語問題批判	覺　璐	大晚報火炬	七月六日
到民間去	古　月	申報本埠增刊	七月六日
爲「大衆語問題」答司馬疵先生	讀書問答	申報讀書問答	七月六日至七日
大衆語在中國底重要性	寒　白	申報本埠增刊	七月七日
對於「文言」「白話」「大衆語」應有的認識	陳　顥	中華日報大衆語專刊	七月七日
關於「大衆語」建設中的「白話文」	家　爲	中華日報大衆語專刊	七月七日至八日
「鬼話」的內容解剖	朝　水	中華日報大衆語專刊	七月七日

大衆語與小兒病	章克標	人言二十一期	七月七日
又忘掉了基本問題	傅紅蓼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八日
大衆語與大衆	高而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八日
關於批判與認識	家爲	大晚報火炬	七月八日
「大衆語」文學建設的一條先決條件	若木	大晚報火炬	七月八日
再提出點意見	佛朗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八日至九日
大衆語與大衆	周木齋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九日
再論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	王鋼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九日
大衆語，土話，拉丁化	葉籟士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十日
大衆語論戰中之幾個成問題的問題	張庚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十日
爲「大衆語問題批判」	司馬疵	大晚報火炬	七月十日至七月十二日
「駢文」「造亂」的程度	素素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十二日

篇名	作者	刊物	日期
越辯越顯出矛盾	吳午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十二日
我對於大衆語的意見	高而	中華日報大衆語專刊	七月十二日
大衆語與白話是不是對立的？	姚炳麟	中華日報大衆語專刊	七月十二日
提倡大衆語是奮鬬的	白兮	中華日報大衆語專刊	七月十二日
大衆語文學的實際	曹聚仁	中華日報大衆語專刊	七月十三日
關於白話文與土話方言的簡單聲明	司馬疵	中華日報大衆語專刊	七月十三日
「大衆語」與「世界語」	胡繩	中華日報大衆語專刊	七月十四日
從某年月日起的大衆語	王人路	中華日報大衆語專刊	七月十四日
從大衆語文學談到大衆教育	陳奕	大晚報火炬	七月十四日
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	胡適	獨立評論一〇九號	七月十五日
為全國小學生請命	叔永	獨立評論一〇九號	七月十五日
白話文普通話和土話方言	魏猛克	大晚報火炬	七月十五日

題目	作者	刊物	日期
中國人不懂中國話	傅紅蓼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十五日
字—詞—文法	雪輪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十五日
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衆語	高荒	中華日報星期專刊	七月十五日
怎樣建設大衆語	胡繩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十六至十七日
從土話文學說到文字拉丁化	馬知力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十七日
大衆討論大衆語的記錄	高而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十七日
再談「現代中國普通話」	陳奕	大晚報火炬	七月十七日
為大衆語問題批評	覺璐	大晚報火炬	七月十八日
為建設「大衆語」問題	若水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十九日
論大衆語	郁郁文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二十至二十四日
大衆語和演劇	張庚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二十日
建設大衆語不應該放鬆了反復古運動	王鋼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二十至二十二日

題目	作者	刊物	日期
「白話」和「大衆語」的界限	高荒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二十一日
建設大衆語文的實際任務	丁乙	申報業餘週刊	七月二十二日
反對「國語」	馬知力	申報業餘週刊	七月二十三日
戲劇用語與大衆語的建設	丹華	申報業餘週刊	七月二十四日
由論爭到實踐	羅子揚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大衆語跟土話	耳耶	中華日報動向	七月二十六日
大衆語運動的幾個問題	聞心	新生二十三期二十五期	七月十四及二十八日
「大衆語」究竟是甚麼東西?	馮執中	大美晚報	七月二十七日
「大衆語」與有聲電影	許幸之	申報電影專刊	七月十二日
「大衆語」與電影題材	炳䴢	申報電影專刊	七月十五日
大衆語的建設與電影	旭人	申報電影專刊	七月十九日
「大衆語」在電影中之運用	丹楓	申報電影專刊	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在電影中大衆語論爭的我見	許幸之	申報電影專刊	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電影大衆語」檢討聲中之三面觀	奠賽	申報電影專刊	七月三十一日
對於所謂文言復興運動的估價	惠	文學三卷二期	八月一日
大衆語	陳望道	文學三卷二期	八月一日
大衆語與大文衆化	高覺敷	文學三卷二期	八月一日
大衆語問題	許傑	文學三卷二期	八月一日
大衆文學與大衆語文學	榮楨	新壘四卷一期	八月一日
大衆語文統一運動的討論	另境	現代五卷四期	八月一日
大衆語萬歲	吳稚暉	申報自由談	八月一日
「大衆語」根本上的錯誤	米同	申報電影專刊	八月一日二日
蘇聯各民族文字的拉丁化與漢字書法拉丁化	Uoljev原作 岡林譯自世界語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二日

篇名	作者	刊物	日期
汪教授反大衆語的大作的估價	齊速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二日
大衆語與大衆意識	伍實	申報自由談	八月三日
大衆語和大衆戲劇	丹華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三日
「Dion Naa Mha」研究	危鉞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三日至四日
再論方言土語電影	丹楓	申報電影專刊	八月三四日
擁護吳老將軍底「大衆語萬歲」	耳耶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四日
關於曹先生提出「大衆語的幾個小問題」說幾句	阿龍	申報本埠增刊	八月四日
怎樣使中學生練習大衆語	尤墨君	新語林三期	八月五日
不同意於吳稚暉先生的兩點意見	徐懋庸	申報自由談	八月五日
大衆語與大衆語文學	周木齋	申報自由談	八月五日
答吳稚暉先生	曹聚仁	申報自由談	八月五日
中國語書法拉丁化問題	焦風	申報自由談	八月五日

擁護了吳老將軍之後	耳耶	申報自由談	八月五六日
中國的方言	百喜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六日
我對於戲劇用語的意見	森堡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六七日
關於大衆討論中「一個更小的問題」的檢討	家爲	申報本埠增刊	八月七日
讀了「Dion Naa Mha」研究以後	文博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七日
怎樣做到大衆語的「普遍」？	陳望道	申報自由談	八月八日
劇本與演劇底用語問題	森堡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九日
舊貨新談	于時夏	申報自由談	八月十日
對於家爲先生檢討一個更小問題瞎說幾句	阿龍	申報本埠增刊	八月十日
再談「Dion Naa Mha」	危鉞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十一日
一個拉丁論者對於漢字拜物主義者的駁斥	葉籟士	中華日報動向增刊	八月十一日
葉籟士先生長文後的附記	葉籟士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十二日

大衆語和文字	狄舟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十二日
關於白話文與文言文的爭論的意見	黃賓	中華日報星期專論	八月十二至十三日
讀「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後	雲渺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十三日
爲中國語書法拉丁化答雲渺君	焦風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十三日至十四日
給葉籟士先生	耳耶	中華日報動向	八月十三日
大衆語文學史的追溯	予時夏	申報自由談	八月十四至十五日
大衆語論壇	魯迅 吳稚暉 趙元任 陸衣言 吳研因	社會日報第一卷三期	八月十五日
文白論戰史話	曹聚仁	社會日報第一卷三期	八月十五日
建設大衆語文學的現階段	楚容	社會日報第一卷三期	八月十五日
大衆語與詩歌	陳子展	社會日報第一卷三期	八月十五日

擁護大衆語文學	黎錦暉	社會日報第一卷三期	八月十五日
大衆和大衆語	傅紅蓼	社會日報第一卷三期	八月十五日
由大衆語文文學到國民語文文學	徵生	社會日報第一卷三期	八月十五日
白話文大衆語文言文	嚴夢	社會日報第一卷三期	八月十五日
大衆語與大衆文化的水準問題	彭子蘊	社會日報第一卷三期	八月十五日
從文言文之復活談到國文教學問題	穆木天	社會日報第一卷三期	八月十五日

附錄二

語文論戰文獻輯要

題目	作者	刊物
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	汪懋祖	時代公論一一〇號
告白話派青年	許夢因	時代公論一一七號
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	胡適之	獨立評論一〇九號
關於文言文	汪懋祖	申報自由談
文言文	齊 速	中華日報動向

文言——白話——大衆語　陳子展　申報自由談

關於大衆語文學的建設　陳望道　申報自由談

關於大衆語文　胡愈之　申報自由談

雜談讀書作文和大衆語文學　葉聖陶　申報自由談

再談建設大衆語文學　讀書問答　申報讀書問答

先使白話文成話　夏丏尊　申報自由談

大衆語問題討論的現階段及以後　傅東華　申報自由談

關於大衆語的建設　樊仲雲　申報自由談

「大衆語」底建設問題　任白戈　新語林創刊號

普通話與「大衆語」　魏猛克　申報自由談

什麼是「現代中國普通話」？　陳　奕　大晚報火炬

話跟話底分家　耳　耶　中華日報動向

題目	作者	刊載
話跟文章底分家	耳　耶	中華日報動向
關於「文言文」底形成跟發展	耳　耶	中華日報動向
關於「白話文」底發生跟成長	耳　耶	中華日報動向
文言與新文言	胡　繩	中華日報動向
關於大衆語文學底建設	王任叔	申報自由談
大衆語文運動之路	陶知行	申報自由談
從中學生寫作談到大衆語	尤墨君	申報自由談
再提出點意見	佛　朗	中華日報動向
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	王　鋼	中華日報動向
內容與形式	司馬疵	中華日報動向
爲「大衆語問題批評」	霓　璐	大晚報火炬
大衆語，土語，拉丁化	葉籟士	中華日報動向

蘇聯各民族文字的拉丁化與漢字書法拉丁化	岡林譯	中華日報動向
一個拉丁化論者對於漢字拜物主義者的駁斥	葉籟士	中華日報動向增刊
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衆語	高荒	中華日報星期專論
大衆語運動的幾個問題	闢心	新生週刊
大衆語萬歲	吳稚暉	申報自由談
不同於吳稚暉先生的兩點意見	徐懋庸	申報自由談
吳稚暉先生第二信	吳稚暉	社會月報
吳研因先生復信	吳研因	社會月報
關於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的意見	黃賓	中華日報星期專論

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

汪懋祖

近矚湖南廣東等省當局，強令中小學讀經；而報載教育部通令糾正，並禁止小學誦習文言。各走一端，因思想上之衝突，造成教育上之紛亂，苟不研究其本源，以折衷至當，則一反一覆之間，兒童，社會，及民族前途，同受其敝。此不佞所深憂，謹不揣固陋，與當世司教育之柄者一衡之。

（一） 思想問題

小學讀經，固非合理，禁絕文言、似亦近於感情作用。竊謂初級小學、自以全用白話教材爲宜。而五六年級，應參教文言。不特爲升學及社會應用所需，即對於不升學者，亦不當絕其研習文言之機會也。初級中學國文科文言教材，以限於課程標準，分量至薄。青年因長久誦習語體，潛移默化，而就好所謂時代作品；即平易之古文，涵正當之思想，每摒棄不觀，獨於現代文藝之詭譎，刻畫，與新奇刺激，多孜孜不釋手，雖檢查禁閱不能絕也。其結果則習爲浪漫，爲纖巧，剽竊，馴至甘墮於流浪的生活。所謂現代作品，就文藝本身而論，未嘗不足恣肆自憙，孰知其禍乃至於此，偏舊之士，恫於此種現象，以爲拔本塞源之方，在使學生讀經，故讀經運動，實爲禁止文言之反動。夫讀經固違背兒童生活，然以少數人之私見而禁習文言，與以少數人之私見而強令兒童讀經，其謬則一。

或曰：「子所論者，乃選材問題，而非語體之咎。」曰然。惟文字一道，其可保存流傳，堪爲模範者，必經長久之選擇，有公認的價値，而不爲時間性所拘束。吾國所謂現代語體文，乃新文化運動之產品，而其運動之意義，在於發揮個人主義，毀滅禮教，打倒威權，暗示歸

爭，今則變本加厲，徒求感情之奔放，無復理智之制馭，青年浸淫日永，則必有更新奇之作品，方得讀之而快意。若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之說，彼等且視若土苴，不足以發興趣而解煩悶。孟子洪水猛獸之說，驗於今而益信。

（二） 教材問題

江蘇教育廳為改進國文教學，曾請十數有名教員，編定國文教程；復竭十數教員之力，纂成當代國文一書，盼其標題，以為時人作品，觀其篇目，乃知為中學國文教科書也，就所選文言文觀之，除為「週期單元」所限，深淺不能合度外，各篇內容尚鮮可訾議。獨其所選白話文，則駁雜殊甚。擇其平正者言之，如離家的一年，此文例入初中第六學期第六週，按其內容，似適於第一學期第一週講讀，倘須刪其冗蔓，今列作第六學期精讀之文，可見白話文選材之窮乏。近來文字，往往以歐化為時髦，佶屈不可理解，須假想為英文而意會之，始能得其趣味。使學生責而習之，其困難幾同讀經，而詭譎奇變，幾非中國人矣。

教育部一再令禁小學講習文言，并初中各科教科書，除國文一小部份外，不得以文言編輯。而所次修訂標準，文言文分量愈削愈少，勢將驅除文言於中學課程之外，而盡代之以白話，使十數年後文言文絕迹，移風易俗，莫善於此矣。宜有人主張高中全用語體，以爲必如是則教育普及，社會進步，不意民族意識，從此牿亡。昔梁任公先生擬定最低限度書目，有四書，左傳史記等二十五種，謂「以上各書，無論學鑛學工程，皆須一讀，若并此未讀，眞不能認爲中國學人。」以任公天才之高，所望未免過奢，又其書並不域於學校教育。惟讀書習慣，必自中學養成，吾只望初中能讀畢孟子，高中能讀論語學庸以及左傳史記詩經國策莊子荀子韓非子等選本，作爲正課，而輔以各家文選，及現代文藝作，爲課外讀物，然而何可得耶？

初中國文教材，本非枯瘠，惟以限制文言，斯窮且濫矣。白話教材，最適用於民衆教育，乃至今尙無一適當之讀本，所謂文藝作品，去通俗甚遠，彼主張語體者，何不盡心於民衆之讀物，而必限制中學用文言，此又不佞之所未解也，

學習文言與學習語體，孰難孰易，必經心理專家之長於文字者作長期的測驗研究，殊未可一語武斷。大抵白話文長於描寫物態，發抒柔情；文言文便於敍事，說理，議論，應用，而壯烈之節，激昂之氣，尤有賴於文言，若以白話表之，則易失之狂暴，無所裁節。故二者各有其用，欲卓然成一作家，則所賴於天才與功力，正復相同。如吾言之果不謬也，則白話文之佳者，要爲文藝之一部。而教育目的，決非造就多數文藝作家與能欣賞小說文藝者。而吾常聞文藝家之言，惟純文藝方有教學價值，文藝首重結構技巧，不限思想，夫以之談文藝則可，以之談教學斷乎不可。此其觀念之必須糾正者一也。

兒童初習語文，必賴於直觀及想像，故貓戲狗語，足以喚發興趣。惟施之於五六齡之兒童則可；若兒童實際經驗，既已超過，則利用此種想像者，反足遏塞其想像力。今若以老鼠請客，黃狗開會等故事，施之於八歲之兒童，除非含有寓言意味，則兒童猶將嗤之以鼻。

而吾國談鬼說狐之書，汗牛充棟，亦可選編以爲教材。今教者率喜濫用想像，不體經驗，自以爲於兒童心理深有得也，孰知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惟初級小學國語教材，自以合於兒童經驗及口語爲尙，高級必進以淺易之文言，若猶以兒童中心爲白話童語之護符，對察秋毫而不見輿薪。此其觀念之必須糾正者二也。

國文教學有三事焉：曰練習，曰思想，曰欣賞。而所以能發人情趣，鼓舞志氣者，尤必資於諷讀。吾幼讀纏綿悱惻，或悲壯激楚之文，輒爲泣下沾襟，何也？聲與心通，有不期然而自然者。故佳文必須朗誦，詩詞必須朗吟。今學校每不主朗誦，謂其妨害他人作業，而教室內除教員講解，學生幾無暇朗讀，即在講授之餘，學生亦惟枯坐默誦，生趣索然。聞某省有督學視察學校，見教室內合聲朗讀，率爲糾正，致教員拂袖而去，意非「文盲」者流，決不鹵莽至此。此其觀念必須糾正者三也。

教授文言是否妨礙算學之進步，抑另有原因，此爲極嚴重之問題，如發現文言與算學之相關成反比，則可毅然取消文言，即語體文亦可減至極少。算學固爲科學之基礎，而

今尙有持練心之說者。歐洲自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練心主義盛行，古文字與算學並重，是則文言之嚴整，正有助於算學之練習。余固不信此說也，諸君毋以國文成績勝於算學爲滿意。考試之成績，尙須觀其題目，如去年會考江蘇高中題爲「國難期間靑年應有之責任」，他省初中試題有爲「暑假期內之生活」或「求學的經驗」等等，凡日報副刊，學生雜誌，時有關於此項題意之發揮，而紀念週演講以及演說競賽亦常用此項論題，學生已耳熟能詳，如考試曳白，或幷白話不能發揮，則學校可以盡閉，豈僅廢讀文言而已哉。

余昔學習理工，凡微積分，高等物理，力學，水力學，無弗習。每夜解答練題率至十一時。又嘗爲數理化教員矣，至今觀察算學教學，雖教科書略加改良，而教法尙未脫二十年前之窠臼。昔時學生，每班不過十餘人，故黑板練習，可以同時並行，而教師爲之一一訂正焉。又吾輩入學雖早，多已國文淸通，歷史具有常識，故入中學後得傾其全力於英文算學，逮入高等學校又傾注於數理化，直以國文科爲休息調節之地，而無所用心。今初中科目增

繁，幾舉人世各種學術之基礎，盡納之於三年之中。食且不能下咽，安得消化。故師資，教法，課程，不加改良，而謂文言有礙算學，實爲學科上之一大訟案也。

（四）社會需要問題

文化愈進，生事愈繁，是有以簡馭繁之工具與方法。文言爲口語之符號，所謂一字傳神，最能描寫文言之便利。凡自然科學之各種符號與公式，皆可作文言觀；若一一以語文描述之，則學術又安得進步。社會應用，亦復如是。今初中學生因喜習白話，所作信札多累贅不通。往往一言可以說明者，而十數語不能達意。商界多不信任學校而好私塾，雖尚有思想習慣，未能滿意，亦以所學國文及算術，不切實用，尚須重習故也。猶憶年前教部召開課程會議，有攘臂起爭高中全用語體文者，以「如之何」與「怎麼樣」爲例，以較其難易，今請以此二詞付之默寫測驗。予卽自試，草寫「如之何」三字，時間一秒半，草寫「怎麼樣」三字需七秒半，時間相差六秒。文言之省便，毋待曉曉，乃必舍輕便之利器，用粗笨

之工具，吾不知其何說也。或謂學習文言，當較白話費力。曰，然。但略加努力，以後之受用，必且倍蓰。若徒崇拜自然主義，而以白話為自然，則算術亦毋須學，因算學運用抽象觀念，更有難於文言。祗教以心算與手指計數，則更合於自然矣。

嗚呼！文字商品化，足使文化閉塞，道德墮落。字數既有定價，往往一書三千字足以發揮者，必多至二三萬言，而收益可以十倍。今教科書亦成商品，各局爭銷，常生糾紛。社會人士本不喜此種貓言禽語之教本，當局乃一舉恢復讀經，焚書之禍，不難見於今日，非文字商品化階之厲耶？

（五） 學制課程問題

余近作「中學制度之檢討與改進」一文，以高初中課程之龐雜，學生既不勝重負，程度即不得不低降。初中科目十五種，（童子軍訓練尚不在內）其中必須有充分時間自修者，可分為國文英文算學自然史地五組，每組自修至少一時，共五時，加上課六時，此

外尙有習字圖畫之補充書寫生活日記，或整理筆記等等，約二小時，是每生每日工作至少十三小時。益以課外活動訓練，愈足增其疲勞。故近年優良中學，每歲退學休學留級者甚多，其幸能拾級而升，至高中會考及格，則已患高度之近視，而神經衰弱，或心臟不健全，恆居十之六七，英發活潑之氣，消磨殆盡，欲望其擔任救國大任，不亦難乎？余按桑戴克學習曲線，自十四歲後，學習能力，始加速，至二十二歲達最高度。是初中課程之繁多，與學生學習能力太不相適，須使課程簡單化或增長年限，始得循序漸進之益，而決非易文言爲語體，即足以提高科學之程度也。

（時代公論第一一〇號，五，四。）

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

胡適

本年五月初，汪懋祖先生在「時代公論」第一一〇號上發表了一篇「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引起了吳研因先生在各報上發表反駁的文字。汪先生第一次答辯（時代公論第一一四號）才用了「中小學文言運動」的題目。這個月中，各地頗有討論這個問題的文字，漸漸的離原來的論點更遠了。我本來不願意加入這個問題的討論。今天任叔永先生送來了一篇「為全國小學生請命，」這是獨立評論上第一次牽涉到這個問題，叔永在他的文章裏把這個「論戰」做了一段簡單的提要，我讀了覺得他的提要

不很正確，所以我要補充幾句，並且借這個機會說說我的一點意見。

汪懋祖的第一篇文字，條理很不清楚，因爲是用很不清楚的文言寫的。我細細分析，可把他的主張總括成這幾點：

1「初級小學自以全用白話教材爲宜。」

2「而五六年級應參教文言，不特爲升學及社會應用所需，即對於不升學者，亦不當絕其研習文言之機會也。」

3 關於中學國文科文言教材應該佔多大的成分，汪先生沒有明說，但他曾說：「吾只望初中能讀學孟子，高中能讀論語學庸以及左傳，史記，詩經，國策，莊子，荀子，韓非子，等選本，作爲正課，而輔以各家文選，及現代文藝，作爲課外讀物。」

他的主張不過如此。這樣的主張，不過是一個教育家的個人見解，本來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他的文字所以引起讀者的反感，全因爲他在每一段裏總有幾句痛罵白話，擁護文言的感情話，使人不能不感覺這幾條簡單的主張背後是充滿着一股熱烈的迷戀

古文的感情。感情在那兒說話，所以理智往往失掉了作用。例如他說：

> 學習文言與學習語體，孰難孰易，必經心理學專家之長於文字者，作長期的測驗研究，殊未可一語武斷。

這好像是個學者的態度。但他下文說：

> 二者（文言與白話）各有其用，欲卓然成一作家，則所貲於天才與功力，正復相同。

這就是「武斷」二者難易「正復相同」了。下文他又說：

> 草寫「如之何」三字，時間一秒半；草寫「怎麼樣」三字需七秒半，時間相差六秒，文言之省便，毋待曉曉。乃必舍輕便之利器，用粗笨之工具，吾不知其何說也。

這又更進一步「武斷」白話為「粗笨之工具」，文言為「輕便之利器」了！然而汪先生接着又忽然下一轉語：

> 或謂學習文言當較白話費力。曰，然。

這又是不待「心理學專家長期的測驗研究，而「武斷」學習文言「較白話費力」了！究竟學習白話與學習文言「孰難孰易」呢？還是「學習文言較白話費力」呢？還是「文言之省便毋待嘵嘵」呢？還是「二者正復相同」呢？還是我們應該靜待「心理學專家作長期的測驗研究」呢？汪先生越說，我們越糊塗了。

這是那個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的發難文字的內容。以後的討論；更使我們看出當日發難的人和後來附和的人的心事。在「中小學文言運動」一篇裏，汪先生很明白的說：

讀經決非惡事，似毋庸諱言。時至今日，使各省當局如何鍵陳濟棠之主張尊孔讀經，可謂豪傑之士矣。

在這裏，我的老朋友汪懋祖先生真是「圖窮而匕首見」了。至於附和的人，大都是何鍵陳濟棠兩位「豪傑之士」的同志。在時代公論第一一七號裏，有位許夢因先生投了一篇「告白話派青年」說：

白話必不可爲治學工具。今用學術救國，急應純

他痛哭流涕的控訴「白話派」：

其所奉行惟謹之白話，實質全係外國的而非中國的嫌疑。許夢因先生何不把這句白話改作古文試字讀書之中國人所能領會。可領會者，大都外國絕理及於實用科學，或爲本國所有者。

發這樣議論的人，當然夠得上擁護今日一班「豪傑之

這個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的主張和動機，不些討論（慚愧的很，上海各刊物上的討論，我們收集到三號上龔啓昌先生的一篇「讀了『禁習文言與強令有許多細密的議論，龔先生認清了今日白話文言之爭的問題。」他說：

我們試看社會上對於文言語體的態度如何？報紙影響於社會心理者最大，應能提倡語體才好。其他如官場內文告來往的公事，雖是加上了新式標點，內容依舊是文言。……就在教育界本身也還有種種矛盾的現象。日前看見報上載江蘇省會考試題議決一律用文言。現在國內各大學的考試，及考試院舉辦的考試，更非用文言不可。……無怪乎現在的中學生（胡適按：此處及下文：原文有脫誤）甚而小學生，你不教他文言，他還要求你教他文言。中學大學入學試驗的影響於學生心理與態度，比了行政機關的一紙號令，或文人的兩三篇文字，不知要大多少。

這都是一針見血的診斷。汪懋祖先生們說的「社會應用所需」，其實正是這一類的「矛盾的現象」在那兒作怪。教育部屢次下令禁止小學講習文言，並且明令初中各科教科書，除國文一小部分之外，不得用文言編撰。但教育部如何敵得過許多「豪傑之士」主持的政府機關，教育機關，考試機關，輿論機關的用全力維持古文的殘喘？七八年的革命政府在這一方面只做到了去年的公文一律用新式標點的通令而已。我很佩服龔先生

的說法：

> 語體文在小學裏的地位，當然毫無異議。不過應當使社會尊重語體文，廣爲推行，一切報章公文一律改過，尤其是中學大學入學試驗也要能提倡。否則一部分人提倡語體，又有一部分人在那裏提倡文言，以致青年無所適從了。
>
> 我們既是認定了語體爲提高國民文化的輕便工具，我們應當再請政府來徹底的革一下命。否則雖是十年百年也還沒有結果，

可惜今日的「豪傑之士」還不肯承認龔先生的前提啊！

龔先生說的「社會的態度」的問題，我們在十七八年前早已認清楚了。滿清的末年，民國的初年，也有提倡白話報的，也有提倡白話書的，也有提倡官話字母的，也有提倡簡字字母的。他們的失敗在於他們自己就根本瞧不起他們提倡的白話，他們自己做八股策論，卻想提倡一種簡易文字給老百姓和小孩子用。殊不知道他們自己不屑用的文字老百姓和小孩子如何肯學呢？所以我們在十七八年前提倡「白話文學」的運動時，

決心先把白話認作我們自己愛敬的工具；決心先認定白話不光是「開通民智」的利器，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我曾說：

白話不是只配拋給狗喫的一塊骨頭，乃是我們全國人都該賞識的一件好寶貝。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二集，二頁一九三）

這就是說：若要使白話運動成功，我們必須根本改變社會上輕視白話的態度。怎樣下手呢？我們主張從試作白話文學下手。單靠幾部水滸西遊紅樓夢是不夠的。所以民國七年我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很明白的說：

若要造國語，必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了國語。……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劇本。……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國語，就是將來的標準國語。

這就是說：我們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話創造文學。白話文學的真美被社會公認之時，標準化的國語自然成立了。

我當時的主張，一班朋友都還不能完全了解。時勢的逼迫也就不容許我的緩進的辦法的實行。白話文學運動開始後的第三年，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就下令改用白話作小學第一二年級的教科書了！民國十一年的新學制不但完全採用國語作小學教科書，中學也局部的用國語了！這是白話文學運動開始後第五年的事！這樣急驟的改革，固然證明了我的主張的一部分：就是白話「文學」的運動果然抬高了社會對白話的態度，因而促進了白話教科書的實現。但是在那個時代，白話的教材實在是太不夠用了，實在是貧乏的可憐！中小學的教科書是兩家大書店編的，裏面的材料都是匆匆忙忙的搜集來的；白話作家太少了，選擇的來源當然是缺乏；編撰教科書的人又大都是不大能做好白話文的，往往是南方作者勉強作白話；白話文學還沒有標準，所以往往有不很妥貼的句子。但平心而論，民國十一年「新學制」之下的國語教科書還經過了比較細心的編纂，謹慎的審查。民國十五六年的政治大革命以後，各家書店爭着編纂時髦的教科書，競爭太激烈了，各家書店都沒有細心考究的時間，所以編纂審查都更潦草了；甚至於把日報

上的黨國要人的演說筆記都用作教科書的材料！所以這幾年出的國語教科書，在文字上，在內容上，恐怕還不如民國十一二年的教科書了。

所以我們回頭看這十幾年出的教科書，實在不能否認這些教科書應該大大的改良。但這十幾年的中小學教科書的不滿人意，却也證明了我十七年前的憂慮。我當時希望有第一流的白話詩，文，戲本，傳記，等等出來做「眞正有功效有力量的國語教科書。」但十七年來，白話文學的作品雖然在質上和量上都有了進步，究竟十七年的光陰是很短的，第一流的作家在一個短時期裏是不會多的。何況牟利的教科書商人又不肯虛心的，細心的做披沙揀金的編纂工作呢？今日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對於白話文存着輕藐的態度，我們提倡白話文學的人不應該完全怪他們的頑固，我們應該責備我們自己提倡有心，而創作不夠，所以不能服反對者之心。

老實說，我並不妄想「再請政府來澈底的革一下命。」我深信白話文學是必然能繼長增高的發展的，我也深信白話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一天會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

流的白話文學完全奠定標準國語之前，頑固的反對總是時時會有的。對付這種頑固的反對，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雖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進步，——必須還靠第一流白話文學的增多。

（「獨立評論」一〇九號）

告白話派青年

許夢因

余嘗兩次著論告國人，謂白話必不可爲治學工具。今用學術救國，急應恢復文言，言皆根據事實。有未盡者，茲續陳之。

白話僅爲人類交際之物，無與於學術思想之研究。故自有生以來，既有白話矣，迨人羣進化，不得不更造文言。假使白話卽已足用，何從再有文言發生。至文言之製作，大部依據白話。白話是原料，文言是原料制成之器具，此又古聖人開物成務必經之事。從來大文學家，皆就已成之器，加以改良，使適於時地之用，斷無舍成器而用原料之理。卽使有所發

明，亦不過增制器具。果然舍器用料，是自反於原始社會用石器之狀態。

乃胡適作「國語的進化」一文，強言白話為文言之進化物。然則文言又為何物之進化？人必非生而能為文言，必脫離母腹，熟習白話，再識字讀書數年後然能為文言。故文言為白話之進化一語，恐胡適將一轉念亦不能不予以承認。今復故意顛倒之，則天下之物，直是互為進化。猿猴進化而為人，他日人又將進化而為猿猴矣。此種論調，信乎否乎？

雖然，今日白話派青年所以不肯為文言，固自有其牢不可破之主張在。而是非之實，非所計及矣。何以言之？今中國學者兩種最大之任務：曰復興民族文化，曰接受西洋科學。此救國之大本，發自孫中山先生，無可否認者也。而白話派假無可否認之名，為必不可認之實，彼視上兩事全處於反對地位。謂中國文化全是反科學的，欲復興中國文化，便無接受科學之可能；欲接受科學，非拒絕中國文化不為功。於是科學未稍研究，國故先已拋棄；不但棄之，又加破壞。凡本國含有歷史價值之古籍，為民族精神所托命者，概予以一筆抹煞之掊擊。古籍皆文言著述，故第一步即掊擊文言。彼認定吾人求知當從今日始，白話為

吾更始之利器。而其奉行惟謹之白話，實質猶全係外國的而非中國的。其體勢構造，每非一般識字讀書之中國人所能領會，可領會者，大都外國假面具社會主義之宣傳無一事一理及於實用科學，咸為本國所有者。彼固不信中國尚可為一世界上獨立自由之國家，即自視亦幾非中國之人，此種思想，生心害政，遂形成今日之中國。然而彼輩則謂昔日之中國為害也。

吾為此言，全由白話運動之歷史而來。白話運動之前，為廢止漢文漢字而代以歐文歐字之運動。運動日久，不達目的，降而求其次，方為廢文言而用白話。故其白話之實質，為外國的而非中國的，是彼輩「弱女非男慰情勝無」之苦衷也。平情言之，白話派不肯致力文言，以恢復本國文化，致為社會假面具所籠罩。以中山民族主義為違反科學，故吾乃不得不竭誠忠告之曰：

一、舍棄本國文化，斷無可以接受他國文化之理。

二、本國既有文化，非適合人生，不能留傳至今，何至根本與科學相反？科學亦無非增益

人生而已。

三、本國文化偏於精神方面，西洋偏於物質方面，正可藉此調劑，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

四、漢代印度文化輸入，極玄妙，極高超，全為出世的，與我國入世的，重倫類綱常的文化相遇，真是根本反對。而當時學士大夫，猶甚與之投合，歡欣鼓舞，承受消化，終且變成吾國特有之新文化，如宋明理學是。

五、何況西洋科學，與本國正德利用厚生之政治哲學，完全訴合無間？當吾國物質飢荒之際，源源而來，尤覺水乳。其由接觸影響，起化學作用，至發生新物體，乃必至之事，自然之理。

六、本國文化，極非單純，初則九流並行，繼為三教鼎立，相反相成，達數千年，語小莫破，語大莫載，其於西洋科學，實為固有原素。學者狃於局部小有參差，遽謂全部不相容，詎免莊生大惑不解之誚？

吾論語文關係，纔筆及此，非忘却本題，空爭意氣。吾見白話派十之八九，不肯研究國故，復以不通文言，并研究國故之能力而無之。日日舍己耘人，所言者遠離科學，又莫可窮詰。果其一朝徹悟，當知吾爲中國人，必先明瞭本國文化，而後推究及於外國，方有心得，方切實用。欲明本國文化，又必先習記載此文化之文言。胡適錢玄同，皆有整理國故之工作，何一非通達文言之效？彼旣通文言而教人不須學文言，絕人了解國故之機能，其欺人害人爲何如？無知者墮其術中而不悟，猶日與提倡文言之人爲仇敵，其思想不足道，其行爲可無改悔哉？大好青年，勝衣就傅後，卽入迷途，至大學畢業而猶不悟，如醉如癡，開口東洋西洋，至中國著名之地，淪於日本炮火之下，如赤峯著名之人，抗拒異族最有功，如張居正于謙，猶皆稱爲日本之地之人，令人頓感亡國之痛，又何足怪？（事見中大校長羅家倫君大學教育危機演講）然而白話派尙曰此不讀書之過，於不習文言無與也？試問民國以上有歷史價値之書，若者可藉白話通之。無論古今中外，白話是平面的，無及於立體，是現在的，不能貫徹過去與未來。借文言，則空間時間，無往不宜，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則青年

之不學寡識，猶可謂非不習文言之咎耶？

（「時代公論」第一一七號）

關於文言文

徐懋庸

我的一個朋友，在上海一個女校當教員，教的是高中三年級的國文。有一晚，他拿了一疊學生的作文簿來，說是因爲太忙，要我幫他改一下。

高中三年級的女生，在上海，至少已是十七八歲的摩登女郎，有的定該是寫情書的聖手了。我懷着一種近於好奇的心情，很高興地接過三十多本簿子，想看看這些卷子的主人們的手筆。在揭開封面以前，我幻想着，裏面有的是和她們的身段一般玲瓏的思想，和她們的裝束一般豔麗的詞藻：摩登女郎的文章一定是富於清新的現代味的。

了。

然而，與所謂「不看猶可」看完了三十幾本簿子之後，我是感到異常的「幻滅」三十多個高中三年級的女生的文章沒有一篇的造句是通達的，沒有一篇的立意是妥當的，字數呢，最長的還不滿五百，雖然是這樣短的文章，改起來卻異常費力，有幾篇簡直只配完全塗掉。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馬上就明白了，原來是教學文言文的結果。我翻遍三十本簿子，裏面的每篇都是用不通的文言寫的。

我不禁要替這三十多個摩登女郎呼冤，然而我又知道現在在學校中同樣地受着文言文的毒害的學生，決不止這三十多個。文言文這僵屍，已「重來」到許多學校，大肆活動了。和這同時，有許多在雜誌報章上撰文的作家，也有意或無意地傾向文言文，或全以文言文撰稿，或在白話文中夾雜許多文言的句子去。

以上這兩種事實，不是偶然發生的，研究起來，二者的原因其實是一個，在於社會的

現狀。現在有一個反對文言文的運動正在開始了。但反對者的論證，若徒從文言白話本身的優劣上出發，那是必至成無爲濟於事的常談的。反對的第一步，必須指出目前事實的社會的原因。

在這裏，我不能將那原因詳細地指陳。因爲在上面談的是女學生，我就將女人的纏足來作個比喻，纏足的起源，大概可有兩說：一說是婦女成爲奴隸之後，男子即用種種方法加以拘束，纏足卽拘束的手段之一。自從解放的口號喊出之後，中國的女子確有許多留了天足，但因留了天足究竟太自由了，所以人們又給她們穿上高跟皮鞋，使她們走路時仍然一步一拐，和纏了足一樣。

第二說，則如 Plekanov 在藝術論中所云，是富裕的妖姬們，因爲無勞動之必要，不把時間看重，所以特地把自己的步行拘束起來，當做是媚惑的樣子，而和貧窮的因而從事勞動的女子們的走相故意表示相反。這是所謂「對立的根源」說。

這兩說都是合於事實的，但深究起來，原因也只是一個。就是某一時代的社會狀態

使然。在那狀態中的社會的支配者，爲限制被支配者的起見，不但加以拘束，且將那拘束的狀態故意認爲高貴美麗而使人自願地去就範。

今日的學校之所以教學文言文，就是拘束學生的思想的自由活動，這是很容易奏效的。至於有些作家，則因身處富裕悠閒的階級，做的是吟風弄月的文章，他們的生活決定他們的作品的題材，他們的作品的題材決定他們的作品的形式，所以他們愛寫文言文。然而也有一類，則自知思想凌厲，用白話直抒胸臆，易致麻煩，所以故意用文言作文，使他的思想披上一件不甚顯明的外表，免得十分惹眼。

爲什麼許多學校要拘束學生的思想呢？爲什麼吟風弄月的作家又被重視的呢？爲什麼有的作家會這樣怕事的呢？我以爲這其間必有共通的社會的原因，但是我並不能詳細地明白地指出。誰能夠指出呢？指出了原因，使大衆認識，反對文言文的運動這纔不至落空。

看教育部所訂的課程標準，尊重文言文是不許的。那些違反教育部的法令的學校，

是要受處分的，這不待我來說。我只希望許多的作家，若非不得已，不要有意地再用文言撰稿，因為這是無意地替某種不良的傾向推波助瀾。

否則未來的青年的頭腦，都將成為冬烘，和有人推測高跟鞋流行的結果，將來全國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綫一樣。

（申報「自由談」六月十五日）

文言文

齊 速

到現在尙有人想使「文言文」復興，到現在尙須爲專文以否認「文言文」的存在，眞是太可憐了，然而也正在這可憐之中，發覺出以前向「文言文」鬪爭底路線的錯誤。

「文言文」並不是「根本沒有這樣東西」的，牠是封建社會中，一種光耀顯赫的東西，可以拿來升官，可以以之衞道，並可以靠牠使天下愚民皆陷於不知。「文言文」跟着封建社會的生長而生長，跟着封建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必然的，亦將跟着封建社會的

沒落而沒落。

「五四」前後，大家向「文言文」進攻，說牠是死話文，說牠是士的階級底居奇品，說牠是不能普遍的東西；而提倡白話文，這都是對的。白話文也就在那時風行起來了。但大家都忽略了白話文興起的社會的意義，同時也忽視了「文言文」沒落的社會的原因了。近時「文言文」又有活躍之概，亦有人想以「文言文」來否認「文言文」，這不是離題更遠了嗎？

若有人說，今日白話之盛行，白話文之猛進，是那時幾位白話文學家努力提倡，努力奮鬭所致。那便是絕大的錯誤。因為白話文之興起，完全是當時資本主義侵入中國，搖動了封建社會的緣故。作為社會底基底的生產關係起了變化，而影響到上層建築而亦變化，封建社會着着崩潰，「文言文」亦跟着封建社會的潰崩而崩潰；資本主義在中國漸漸發展，白話文以其適合於資本制度的緣故，亦跟着牠的發展而發展了。

不過，社會的改革，雖然有着他的突變的階級，而每一個社會制度並不是完全清一

色，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也有着封建的勢力殘餘着，慢慢的趨於死亡，這便是「文言文」「禮拜六文」之所以尙存於今日的道理。還有封建餘力亦能在政治的或其他的原因之下，在將死之餘，迴光返照，這也就是今日「文言文」有活躍之槪的根由。

我們已經究明「文言文」與白話文的社會的意義了。「我們應在社會的根源中去求「文言文」的死滅！我們更要在社會的意義裏去找白話文的前途！吶喊，提倡與打倒，當然是工作的一種，是有助於白話文的，但根本却並不在這裏！

（中華日報「動向」六月廿一日）

文言—白話—大衆語

陳子展

現在已經有人喊出「文言復興」的口號，同時也有人倡言「反對文言復興」好像久已停止了的文言白話的論戰又要重演一番。

其實文言白話的論戰早已分過勝負了，並不是林琴南章行嚴諸先生的文言文做得不好，他們趕不上古人；只因中國社會已經走到某種程度變革的路上，基礎一動，舊文化全般動搖，文學革命只是其中的一種。這種大勢所趨，自然還有許多迴環曲折，可是站在沒落下去的某方面無論個人或他所屬的某一階層，雖然還能夠來幾次掙扎，最後的

勝利却不會歸到他們的，儘管也得佩服他們的勇敢。

總而言之，文言白話的論戰早已過去了，目前我們雖然聽到「文言復興」的口號，並不感得怎樣的嚴重。至於個人為了某種必要，做幾篇文言文，只要對於社會上不生惡影響，不致毒害大衆，暫時似乎不妨容忍。

文言白話之爭既已表過不提，現在我以為要提出的是比白話更進一步，提倡大衆語文學。這理由並不怎樣高深繁重，就極淺薄極簡單的說，十多年來的白話文雖然比較文言的東西是要和大衆接近些兒，可是事實上告訴我們，這個顯然還不夠。目前的白話文學只是智識分子一個階層的東西，還不是普遍的大衆所需要的。再添上一句簡單的話說，只因這種白話還不是大衆的語言。

從前為了要補救文言的許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話，現在為了要糾正白話文學的許多缺點，不能不提倡大衆語。

這里所謂大衆語，包括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標準的大衆語，似

乎還得拿將來大衆語文學家的作品來規定，最要緊的還得先看一看目前大衆所受的教育程度是怎麼樣，並須想到將來大衆該受怎樣程度的教育。

這里所謂大衆，固然不妨廣泛的說是國民的全體可是主要的分子還是佔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以及手工業者，新式產業工人，小商人，店員，小販等等。就目前大衆的教育程度而論，可惜還沒有精密的調查統計可做根據，只能大概的這麼說，有的受過號稱新式的小學教育，有的只受過舊式的私塾教育，有的只受過年把幾個月的補習教育，識字教育。此外，受過新式中等以上學校教育的極少，不識字的倒最多。這樣說來，目前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是怎麼樣的一種程度就不難想像到了。

自然，我所說的大衆語文學，一方面要適合大衆用的語言文字，一方面還得提高大衆語的文化水準。倘若語言文字上有歐化的必要，不妨歐化，可是不要只爲了個人擺出留學生或懂得洋文的架子。有採用文言字彙的必要不妨採用，可是不要單爲了個人擺出國學家或懂得古文的架子。

據我個人的意見大衆語文學在詩歌小說戲曲三類，說聽看三樣都須顧到，尤其要注重聽叫人聽得懂。因爲詩歌朗讀也好，唱奏也好，聽得懂就是深入大衆的一個必要的條件。爲什麼白居易的詩在當時社會特別流行？爲什麼黎錦暉先生的歌曲如今特別流行？除了其他的條件以外，聽得懂，也怕是一個重要原因。至於戲曲上演，動作姿勢雖能幫助大衆了解劇情，重要的還在說白曲詞能夠叫大衆聽得懂。還有如今的小說雖然不必由說書的人說給大衆去聽，但是念起來能夠和說話差不多，也是深入大衆層的一個條件罷。

我因爲看到了徐懋庸曹聚仁兩先生關於文言文的論文，我就跳過白話，更進一步，在文學上主張大衆語，姑且這樣粗略的提出了，聽取大家的高明的意見。

（申報「自由談」六，一八）

關於大衆語文學的建設

陳望道

在中國文學史上，筆頭用語本來很複雜，簡單分起來，大約可以分成下面這樣一個表所列：

- 筆頭語
  - 貴族語（文言）
  - 市民語（白話）
    - 敎士語（語錄體）
    - 大衆語（在宋代如「評話」上的用語）

五四前後「文學革命」時代關於筆頭語的論戰便是市民語和貴族語的論戰。當時對文言爭市民權的筆頭語是包括着敎士語和大衆語兩種語。而且往往把兩種語平

等的看待，留一個退入語體語的可能。這是當時的短處。但當時所以把教士語和大衆語同等看待，不過是當時急於和文言對立的情勢逼他顯出了那樣看相；骨子裏到底並不是把語體做範本的。這比起以前的一切等等始終不脫把語體做中心的理論或者實際來，又不能不說是當時的長處。現在陳子展先生提出大衆語來，可說是吸收了當時的長處，又拋棄了當時的短處。我想大家不會不贊成的。

不過關於大衆語的性質方面，恐怕還有商量研究的餘地。陳子展先生只提出說，聽，看三樣來做標準，我想是不夠的，寫也一定要顧到。寫的簡便化，這幾年來已經有好多人研究，也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將來研究文學的人似乎也不能不注意研究。將來大衆語的語彙裏頭一定不免有外路語輸入，但必須用本國文字寫它的音，讓大家說得出。照過去的經驗看來，輸入些外路語或起用些古典語，在大衆也並不覺得十分不便，只要確實是當時大衆所必需的。如摩登，摩托，冰淇林，手續，引渡之類。這類語彙實際時時在變換，變換起來實際也沒有變換語法那樣的煩難。不過總要不違背大衆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

得明白的條件，才能說是大衆語。

大衆語的修練只能靠平時，不能靠臨時。一切的規律，一切的强制，在臨時纏住心頭，都會妨害了筆頭的自由抒寫。在寫成的文字上顯出了不自然的痕跡。在小說詩歌戲曲之類描寫具體形象的文字上更其如此。所以這里，便要發生了要建設大衆語文文學，必須實際接近大衆，向大衆去學語言的問題，單單躱在書房裏頭不同大衆接近，或同大衆接近不去注意他們語言，都難以成就大衆語文學作家。

大衆的語言確實是値得學習的。尤其是文法。它有好些地方都已經變得比文言更整齊，更巧妙，更自然。比如桐城派的人極賣力地說過的，所謂實字虛用，虛字實用，在文言中如「爾欲吳王我乎」「春風風人」，都不過把字來硬用，文法上並沒有一定的方法可以幫凑，所以讀起來也覺得很不自然，說起來更不必說。在大衆的口頭語上，却有一定說法，要把虛字實用，便可以加「頭」之類實字的接尾。如「想」字要實用，就可說「想頭」之類。要把實字虛用，也同樣地有方法可以添加「了」「着」「起」「下」「去」

「來」等等字。如「車」「袋」等字要盡用，便可以說「車了去」「袋了去」之類。這等語言的進步性質，固然極應該學。不過文學並非單有語言就行的。一切的文學都需要會得看現實，看現實又需要有一定的態度。態度的修養，實際又比語言的修養更重要，有些語言上的問題，也需要從態度上去選擇，去決定。

要建設大衆語文學問題很多，需要大家來細心地討論。

（申報「自由談」六月十九日）

關於大衆語文

胡愈之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幾千年來一向佔着支配地位的某一個社會層，眼見得是在很快地沒落了。跟着這社會層的沒落，凡是代表這社會層的一切文化——哲學，道德，敎育，法律，戀愛觀，文學，藝術——也都在沒落的過程中。代表這社會層的意識的語文，自然也沒有例外。

要是五四運動，在別的方面，沒有多大的貢獻，至少在語言革命上，却已把支配階層的營壘打了一個落花流水。五四文學革命的領袖們，雖然並沒有認識淸楚社會的使命，

但一方面宣佈「文言文」的死刑，不意識地繳了支配階層的文字的械，另一方面因「白話文」的大量的實際的應用使文學不再成爲大衆的禁地。因此，對於支配階層的語文的沒落，和大衆語文的產生，五四運動，確實起了不少的推動作用。

但是這沒落的社會層，決不是毫無抵抗就甘心沒落的。代表這社會層的語文，和代表這社會層的一切文化一樣，到了一個相當的時機，必然地要死灰復燃的。而且五四的文學革命，本來就沒有幹個澈底，只是把「文言」和「白話」對立起來，對於文字接近口語這一點，盡了一點力量，却把中國文字主要的病根——代表古代的封建的意識——輕輕放過，同時對於新的大衆語言的建設，還缺少努力，因此就給這判決死刑的中國舊語文，暗下裏留下了一條活路。

果然，到了目前，跟着政治的社會的復古傾向，中國舊語文的鬼怪，又重行出現了。這些鬼怪却裝着四種不同的形式來露臉：第一種保持着本來面目，就是近來所謂「文言復興」運動。第二種是穿着「白話文」的外衣，借尸還魂。（例如禮拜六派的文章，張恨

水的小說。都用「白話文」的形式表現沒落社會層的意識。）第三種的混入「白話文」的中間，如許多流行的作品在形式和意識上，不免有時露出沒落語文的狐狸尾巴。（樂嗣炳先生是最忠實於「白話」的，但是不幸得很，前天自由談所登樂先生一篇不滿一千字的文章，却有「緊鈴人自動的解鈴了，自鄶以下……」兩個古典。這不過是一例。樂先生如此，「自鄶以下」自然更不必說了。可見死文字是到處在作怪的。）第四種是戴上了「風格」「性靈」「語錄體」這些面具來出現的。這種鬼怪雖然最乖巧，但是主要作用，是傾向語文的復古，却是十分明顯的。

這四種鬼怪，連合起來，表面的力量是可怕的。但在實際上，這些都只是沒落的語文的前後掙扎。無論怎樣掙扎，都不能挽回沒落的運命，為的是使用這語文工具的社會層在沒落着，這社會層的意識也在天天沒落着。因此，在教育上儘管提倡「文言」，但「文言」所包含的意識消滅了，「文言」就愈高愈不通。至於禮拜六派的借尸還魂，到底沒有多少影響。提倡性靈文學或語錄體的，終究也會露出原形來的。

健康的人是不怕鬼怪的。沒落階層的沒落語文，是不會有多大前途的。橫在我們前面的主要問題，卻不是反對「文言文」反對「語錄體」之類，而是積極地改善建設大衆的語文工具，建設供大衆應用代表大衆意識的語文。

因此對於陳子展陳望道先生提出的大衆語文學，我是感到有重要意義的。不過在這裏我有一些意見，和兩位陳先生不完全一致。我以爲：

(一)「大衆語」應該解釋作「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大衆語文」和五四時代所謂「白話文」不同的地方，就是「白話文」不一定是代表大衆意識的，而大衆語文決不容許沒落的社會意識，混進了城門。

(二)「大衆語文」一定是接近口語的。但是絕對的「文話合一」當在話的組織有相當進步的時候。

(三)中國語言最後成爲大家用的最理想的工具，必須廢棄象形字，而成爲拼音字。因此在目前詞的連寫，筆箱字，國語音標，都值得提倡，因爲這是促進中國語文

拼音化大衆化的一種步驟。

（申報「自由談」六月廿三日）

雜談讀書作文和大衆語文學

葉聖陶

昨天稜磨先生「文言的前途」一篇文章裏的話說得非常透切，他說：「在五四時代反對白話文和在今日提倡文言文的人是不相同的：前者決不容認白話，後者只要人能寫四書五經式的白話文，一定能夠容認。只因爲要寫白話的人寫四書五經式的文章決不可能，於是仍只有提倡文言。他們也知道復興文言文並不可能，但他們以爲至少可以勉強人讀一點古書。」讀一點古書做甚麼呢？至多像他們一樣，自己陷在沒落的退潮裏，同時給前進的趨勢一點輕微的阻力罷了。這是實在的情形，可是他們決不肯相信。他

們的生活決定他們的意識，從他們的意識出發，去處理教育上的問題，不能不得到這樣的結論，就是把古書的內容和形式一古腦兒裝到青年的頭腦裏去。他們以爲這樣做是最合理的，否則就對不起青年。我們不想做甚麼猜測，說他們別有用意，存着不好的心腸。但是，顯然的，他們沒有理會到人是常常跟着環境而有改變的，他們沒有理會到人的生活的改變從來沒有像現今這般的迅速和劇烈，他們更沒有理會到生活有了改變，而其他應當跟着一同改變的却停頓着沒有改變，在個人方面是多麼大的不幸。遭到這種不幸的人的實例不必到遠處去找，只要看我們自己就是，雖然他們決不肯相信。

如果他們的願望實現了，這就是說，在教育上，眞個把古書的內容和形式一古腦兒裝到青年的頭腦裏去了，結果怎樣呢？那是很容易想到的：大部分的青年不肯放鬆現實生活，對比下來，他們覺得現實生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立刻把被裝進頭腦裏去的丟了出來，像丟掉一個不足顧惜的爛蘋果。少數青年呢，或者因爲特殊的關係，能夠寫幾篇像今年年初本市中學會考第一名所作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論」那樣的文章。丟了

出來同根本不曾裝進去差不了多少，自不用說。只有寫得出第一名的文章的人給與提倡者一種安慰，然而這種安慰太微弱了。所以提倡者的失望是必然的，失望的因子就包含在他們的意識裏邊。

現今的在校青年說不定眞會遇到這樣的一天，硬被人家「裝」這麼一下。只須看一些執着武器的人都在吶喊着「裝啊裝啊！」而一班搖着鵝毛扇的謀士也從旁響應着「裝啊！裝啊！」就約略可知道一點消息。靑年遇到了這樣的一天，對於古書的道理當然無所領會，古文也一定寫不通。然而這並不是靑年的重大的災難，至多使學校教育成爲空白的一頁罷了。他們離開了學校，或者說，他們丟開了學校的教訓和課業，自會從現實生活當中建立他們的意識，寫通足以表現他們的意識的文章。寫通文章，途徑只在乎讀書，這本來是很可笑的話。寫通了文章，而只像鸚鵡一般說些甚麼，這尤其是沒有意義的事。必須根源於現實生活，文章才眞能寫通，寫來才眞有意義。青年只要認清這一層，卽使硬被人家「裝」這麼一下，也就沒有甚麼關係，好像我們的老祖母在我們耳朵旁邊

念「多心經」「大悲咒」和我們沒有甚麼關係一樣。

最近幾位先生在「自由談」提出的「大衆語文學」，該是我們現實生活當中最切用的工具。胡愈之先生更給大衆語文學下了個內容形式都包括在內的規定，說這是表達大衆意識的文學，尤其使人容易辨認。除了執着武器的以及搖着鵝毛扇的誰不是大衆裏的一個，誰不需要大衆語文學？被除外的少數人不滿意白話文他們要回到文言，回到讀古書，依他們的道理講是不錯的。但是大衆也不滿意白話文，他們覺得白文話太空泛了，單把「的了嗎呢」換去「之乎者也」毫無意義，文學必須眞能表達大衆的意識，才配在社會中間盡交通情意的職分。自然，大衆語文學須由大衆的努力，才得建立起來，教育家，語言學家，文學家等等尤其要特別努力。這些「家」中間有搖着鵝毛扇的，他們當然無望，我們只有切望着不搖鵝毛扇的那一批。今天（廿二日）看見中華日報的「動向」欄登載耳耶先生的「話與話底分家」剖析語文的所以差異，是一篇精密通達的文章。像這樣的文章，在「大衆語文學」剛被提出的現在，我們希望各「家」多多

寫作。

（申報「自由談」六月廿五日）

再談建設大衆語文學

——答王省三君——

讀書問答編者

自我們發表一篇「怎樣建設大衆語文學」以後，有許多讀者向我們提出意見，比如，大衆語爲什麽是反古文，同時又是反白話的呢？大衆語的標準語是什麽呢？我們認爲，這些問題，實有從新提出來談談之必要。

我們曾說，「目前的大衆語運動，是反古文的，同時，是反官僚買辦的白話的，」因爲，「大衆語之與白話，白話之與古文同樣是對立的東西。」這意見，在原則上，雖然沒有什麽錯

誤，但說來未免有點含糊，沒有精密地劃出其間的差別，正確地指出白話與大衆語的對立的統一，以致引起讀者們的誤解，而以爲反對白話等於反對古文。

我們的意思並不是這樣！

語言文字的發展，和社會發展一樣，是有其一定的程序的，我們如果要明白大衆語與白話如何對立，及如何統一，只有從語言發展的過程中去理解。我們說大衆語，是反白話的，這是因爲白話運動並沒有完成它自身的任務，達到「言文一致」的成功；反之，它已走上投降「文言」的危機；成爲語言文字發達的障礙。試看，現在流行的白話文——不是藍青官話，便是變相的八股，（所謂語錄體）與大衆有非常大的距離；那些冷嘲熱罵青年作家把「丟媽」「媽媽的」寫進文學作品內的作家們，與汪懋祖之提倡古文，在反大衆語這一點上，是並無不同之處的。

但是，這樣說，決不是認爲：反白話等於反古文，反白話也和反古文一樣。有否認全部白話的意思。不是的，我們反對白話，是爲了進一步反對古文，爲了進一步保證獲取「言

文一致」的勝利。在「五四」時代，大衆語運動是包含在白話文運動之中的。我們反對白話，並不否認白話在整個語文運動中所成就的那一部份；它宣佈了「文言」的死刑，指出了今後「語文一致」的必然性。所以，在建設大衆語的現階段，我們反對白話之離開大衆，我們却不能不批判地接受白話中那接近大衆語的一切。白話畢竟與古文不同，白話畢竟是與大衆語距離較近的東西。

那末，白話中有那些是我們應該接受的呢？大衆語的標準語是什麼呢？這問題，是不能機械地回答的。

語言，不是靜態的，而是隨着社會生活的進展，時刻變動着的。五四時代白話文的產生，同時也就是大衆語文的出發點。在這一歷程上，在白話與大衆語對立的發展中，大衆語愈漸成長，則豪紳買辦的白話愈顯出衰弱，愈暴露出它的反動性，如果我們否認白話文中大衆語的存在及發展，我們便無異否認整個語言運動甚至文化運動的意義。不說別的，我們試拿五四前後的白話文與現在一般白話文相比，拿這少們的白話文來和大

衆文學家作品來比，就可知道何者更接近於大衆。這裏所謂接近大衆，不僅指語言，且指內容；這裏的大衆不指保守的大衆，而是前進的大衆。這種語言文字的發展，是漸進的而不是突進的，（五四白話文運動可說是突進的）所以我們並不容易看出它的發展的形式，指出幾篇具能作爲大衆語文學的標準的作品。

以此來回答什麼是大衆語的標準文的問題，是可以得出同樣正確的結論的。有些人認大衆語的標準語應該是流行的普通話，又有些人認爲應該是輪船火車上流行的江湖話。他們均視語言爲靜止的東西，視語言發展與大衆實生活的各面無關。他們只看到了這些構成大衆語的要素，誤將某一要素作爲全體。我們現在建設大衆語文學，我們固可預設一種標準語，但這種標準語，並不能認爲卽是未來的大衆語，只能當作這運動的依據。大衆語是在大衆實生活中長成的。夏丏尊先生謂農婦也喊「革命」，「革命」不是大衆語，但在北伐時的江西兩湖及廣東一部份的農婦，却眞能談革命，却又不能不說是大衆語了。在目前，語言與文字，其自身還留有很大的差異，看得懂的不見得聽得懂；聽得懂的，

不見得看得懂。我們採用某種語言作爲這運動的標準語是可以的（這須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努力。）然而顯然的這並不是主要點，現階段建設大衆語文的主要任務，我們以爲是：

（一）改進形義字使逐漸變爲拼音字，打破語文間的根本差異；

（二）提高大衆生活——文化，增進大衆語辭彙，使大衆語言，與一般文化發展趨於一致的步調。

關於這兩點的詳細解釋，容後再及。

（申報「讀書問答」六月廿八日）

先使白話文成話

夏丏尊

五四以來的白話文，因爲提倡者都是些本來慣寫文言文的人們，他們都是知識階級，所寫的文字，又都是有關於思想學術的，和大衆根本就未曾有過關係。名叫白話文，其實只是把原來的「之乎者也」換了「的了嗎呢」，硬裝入藍青官話的腔調的東西罷了。凡事先入爲主，白話文創造不久，就造成了那麼的一個腔殼，到今日還停滯在這腔殼裏。當時提倡白話文的人們有一句標語叫做「明白如話」。眞的，只是「如話」而已，還不到「就是話」的程度。換句話說，白話文竟是「不成話」的勞什子。

白話文最大的缺點，就是語彙的貧乏。古文有古文的語彙，方言有方言的語彙，白話文既非古文，又不是方言，只是一種藍青官話，從來古文中所用的辭類，大半被删去了，各地方言中特有的辭類也完全被淘汰了，結果所留存的只是彼此通用的若干辭類。於是寫小說時一不小心農婦也喊「革命」，婢女也談「戀愛」了。編成戲曲的說白可以使台下人聽了莫名其妙。

舉一例說，現在白話文裏所用的「父親」「母親」二語，就很可笑。實際上我們大家都叫「爸爸」，叫「爺」叫「爹」，叫「娘」叫「媽」或叫「姆媽」；決不叫「父親」「母親」的。可是白話文裏却要用「父親」「母親」的稱呼，甚至於連給六七歲小孩讀的初小教科書裏也用「父親」「母親」字樣。「爺娘妻子走相送」唐人詩中已叫「爺娘」了，我們現在倒叫起「父親」「母親」來，這不是怪事嗎？

要改進白話文，要使白話文與大衆發生交涉，第一步先要使牠成話。

現在的白話文，簡直太不成話了。用詞應儘量採取大衆所使用的活話，在可能的範

圍以內儘量吸收方言。凡是大衆使用着的活話，不論是方言或是新造話，都自有牠的特別情味，往往不能用別的近似語來代替。例如「揩油」在上海一帶已成爲大衆使用的活話，自有牠的特別的情味；我們如果嫌牠土俗，用「作弊」「舞弊」等話來張冠李戴，就隔膜了。方言只要有人使用，地方性就會減少。如「像煞有介事」一語，因使用的人多，已有普遍性了。此後的辭典裏，應一方面刪除古來的死話，一方面多搜列方言。

放棄現成的大衆使用着的活話不用，故意要用近似的語言來翻譯一次，再寫入文中去，這就是從來文言文的毛病。白話文對於這點雖經痛改，可惜還沒有改革得澈底，結果所表達的情意還不十分親切有味。我有一個朋友，未曾討老婆，別人給他做媒的時候，他總要問「那女子是否同鄉人？」他不願和外省的女子結婚。理由是：如果老婆不是同鄉人，家庭情話彼此都須用藍靑官話來對付，趣味是很少的。這話很妙。現在的白話文作者與讀者間，等於一對方言不通的情侶，彼此用了藍靑官話來作喁喁的情話，多隔膜，多難耐啊！

（申報「自由談」六月廿七日）

大衆語問題討論的現階段及以後

傅東華

近來汪懋祖和吳研因兩位先生關於文言白話的爭論。（單說在上海方面）曾經引起兩種反應：（一）是擔憂文言文的復興，因而感覺到對這傾向有提出嚴重抗議的必要；（二）是連帶感覺到五四的「白話」的先天病（雖然這種感覺並不等到現在纔有，）及須有另外一種較健全的文學用語起來代替它的必要。這另外一種用語，爲要對五四的「白話」表示不同，及爲以後關於它的建設問題便利討論起見，曾得一部分人的同意，給它暫時起一個名字，叫做「大衆語。」

直到現在爲止，參加這問題的討論的，似乎對於（一）點都不大重視。稜磨先生在「文言的前途」一文裏說：「我斷言這抗議是無效的。」確實，在汪懋祖先生所反覆申說的「社會需要」不住地在替文言文打强心針的現在，這抗議能發生多大效果呢？因爲汪先生對於白話文的抗議也原不是「無病呻吟」啊。他看着許多人學英語，都只爲預備走進大英「寫字間」，那末學國文的目的除預備進中國「寫字間」還有什麽呢？而現在的中國「寫字間」無論官辦，商辦，或者官商合辦，都只要文言不要白話，於是汪先生不得不替青年們擔憂了。是的，在目前的中國生活迫得人們不得不「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這里「人話」和「鬼話」都照劉大白先生所解釋的用例，）典型的紅人們，大都拿起白粉條來，就能在黑板上寫「白」的「話」，一旦拋下白粉條，搖起葉聖陶先生說的那把鵝毛扇，就又能拿起也是毛做的筆，在紅格紙上「等因奉此」了——只有這樣的人們才會發跡。所以汪先生擔憂文言文的墮落並非無故。但可惜現在的青年們未必——也不容——人人都打算進「寫字間」去發跡，因而汪先生的美意未必

會普遍地被接受，那末稜磨先生說的「現在對白話文無須擔憂」那句話又是千眞萬確的了。

不過稜磨先生對於他自己提出的「白話文被利用後是不是另有可擔憂處」一個問題，只簡單地給它一個「不見得有」的答案，似乎還嫌太大意一點。因爲話跟話雖然像耳耶先生說的自然會得「分家，」（見六月二十日「動向」發表的「話跟話底分家」）但若不經一個會計師或者律師之類替它們分一分清楚，難免要出起毛病來。所以現在把「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問題再提出來討論，原要算是「五四時代剩下來的文章」（也是耳耶先生的話，）至於把「白話文」和「大衆語」應該怎樣分家的問題來討論，應該不至於是「倒霉透」的事情吧？

到現在爲止，對於「大衆語」這個名詞，還不會有人提出異議，但也不會有人加強這個名詞的重要性，至多把它當作「白話文」的同義語罷了，例如龍貢公先生的「再進一步」文中（見六月二十五日「動向，」）有一處在「白話文」三字底下用括弧

括着「大衆語」和「活語」，像是這三個名詞是沒有分別的。其實龍先生要「再進一步」去討論的問題就是耳耶先生所說的「話跟話底分家」的問題，所以同「白話文」分了家的另一種用語，似乎有先給它一個名字的必要。

不過一個名字常要被人給與不同的內容，因而龍先生的「再進一步」的需求，又是很自然而且必要的了。到現在爲止，給與「大衆語」的解說已有了下面幾種：

（一）「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陳子展）

（二）「只提出說，聽，看三樣來做標準，我想是不夠的；寫也一定要顧到。」（陳望道）

（三）「爲尊重大衆利益起見，一切文字都該話文合一。」（樂嗣炳）

（四）「大衆語不是什麼人創造出來的，而是隨着大衆生活的進展而進展的東西。」（申報「讀書問答」）

（五）「應該解釋作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胡愈之）

但是因爲「大衆」和「大衆意識」這兩個名詞本身太富有彈性，所以關於實際建設的討論上仍舊要發生困難，例如都市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的語言，農村大衆未必「說得出，聽得懂；」又如一部分落後的農村大衆對於「眞命天子」出現的希望，能不能不算它「大衆意識？」因此，大衆語是不是可聽憑它自然發生和進展，完全不加一點人工的「創造」和促進？如果我們對於最後這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末現在這許多討論就都沒有意義了。

故從這問題討論的現階段的情形看起來，我們只能夠把握住下面幾個要點：

（一）「大衆」是跟一切特殊的個人或特殊的羣——從皇帝到買辦——對立的名詞，故一切特殊的個人或特殊的羣的特殊用語，無論是口頭的或筆頭的，都不是大衆語。文言文自從專作筆頭用語用的時候起，就全部是特殊的羣的特殊用語，故全部文言文都不是大衆語。「白話文」因它只拿「白」不「白」做標準，無法防衛自己不被特殊的羣拿去利用，故「白話文」不必就是大衆語。

（二）「大衆語」一面要向大衆去學習，一面也要大衆來學習，所以它的進展至少得要一點人工的幫助，猶之歷史的進展需要人工幫助一樣。例如「肺病」最落後的大衆叫做「野貓迷」（神話的），次落後的大衆叫做「癆病」（玄學的）標準之大衆語語彙裏就應該不容有後面這兩個名詞的存在，不管它們是怎樣的「白」，怎樣的「活」。（至於描寫大衆知識落後的小說，當然在例外。）

（三）因上面第二項的理由，目前要「話文合一」是辦不到的（胡愈之先生已經說過，）所以「大衆要聽得懂」這個標準，只好暫時讓步一點給龔先生所主張的「精密正確」的標準，（例如北平話「汽車」叫「電車」，「留聲機」叫「話匣子」，大衆語語彙裏都應該改正。）換句話說，只好暫時把「大衆」的範圍縮小起來，說得再具體些，可假定拿現在高級小學的教育程度做我們的大衆語的標準。至對於比這程度更低的及文盲大衆，當然還得再遷就些。就如對兒童說話有時不用代名詞，而沒有代名詞的話究竟不能算是標準語。

以後呢，我們希望對於這個問題能夠繼續有人像龍實公先生那樣「再進一步」「又進一步」，「更進一步」的討論下去，逐步的把實際問題提出來解決，並且實行。即使我們的抗議果眞無效，至少在文學的領域裏應得先做一番「堅壁淸野」的工作。

最後，我們不可忘記，現在參加這個討論的人們，從某一意義講時也未嘗不可算是「特殊的羣，」那末我們的這種打算是不是合於眞正的大衆的需要，那就只有眞正的大衆自己纔能判斷。

（申報「自由談」六月廿八日）

關於大衆語的建設

樊仲雲

白話文運動十五年，又聽到文言抬頭的呼聲，不是一件怪事嗎？可是不，在這馬拼復興的今日，這正是意想中事。

白話文運動是戰後受民族自決主義的影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要求革新並建立現代中國的表現。可是這種要求在國際資本主義的巨大壓力下，馬上給摧毀了。於是在一方面，白話文運動立即成爲整理國故運動，在他方面，則不過把封建的才子佳人的小說，改變成爲摩登男女的戀愛描寫。白話文運動在把「之乎者也」改成「的了嗎呢」

之後，就從此終止了。

因此之故，這所謂白話文者，其實與文言沒有什麼不同。這沒有與一般大衆打成一片，且不消說，還有他的根本的意識，也與文言相同，爲封建的，享樂的，消費的，剝削的。所以這種白話文之應加改造，是不必多說的。但欲不蹈過去的覆轍，問題來了：（一）是意識問題，屬於思想的表現，（二）是智識問題，屬於內容的充實。我覺得用語問題，還是第三，但這三者必須同時並進，事乃可成。

一方面是要使白話文成爲一般大衆生動的語言，一方面則現在大衆的思想，不脫陰隲文感應篇的支配，而智識方面，其水準之低，我們也不必諱言，在這一點上，他們簡直是一張白紙。所以必須輸入新智識以豐富其語彙，介紹新思想以改正其意識，待至智識充實，思想正確，白話文與大衆語，我的意思以爲自然會彼此接近的。

講到智識的傳布與思想的矯正，那末教科用書以外，要數報章與雜誌。但今日教科用書，像過去的白話文一樣，很多只是文言的翻譯，而現今的報紙，尤滿紙是封建意識的

表現。譬如記男女問題，不曰「陳倉暗度，已非一日」，即曰「珠胎暗結，大腹便便」。記其他新聞，也多關於個人；如某某於某時由京專車啓行，送者某某等，幾時到某處，迎者某某等之類；如某社開會於某處，到者某某等。很少指出這事件的社會的意義。總括一句：新聞記載的公式化，就是由於中文言的毒太深了。

因此白話文運動雖已十五年，而一般大衆還是沒有可資閱讀的書物。但他們既然已認識文字，就要讀書，不得已，只好到水滸傳紅樓夢等舊小說中去求滿足，或者看些啼笑姻緣武俠小說之類，或者新一點，讀新禮拜六的戀愛小說。由這種低級趣味，於是小報盛行，黃色新聞主義支配了整個的新聞界。

說起來這個現象的造成，還是由於白話文運動之半途中止。所以今後從事文化運動，我們應當知道必須先使一般大衆有可讀的東西，只有這樣，纔能斷絕文言的殘餘勢力，消滅一切爲消費享樂的封建意識所凝結成功的低級趣味。

建設大衆語文學，我們要求先合於大衆需要的讀物。（申報「自由談」六月卅號）

「大衆語」底建設問題

任白戈

目前，又有人提出「大衆語」這個名詞來作爲問題了。也許有些人會覺得生疏而認爲很可以不必要的吧。然而，我卻覺的這個問題在目前提出實在是有最大的意義和必要的。中國的語言，一向就和大衆離得很遠：古老的文言，固然不必待說；就是經過一番革命來的白話，現在亦與大衆沒有什麼關係，早已變成所謂新文言了。現在的大衆是不能不要自己底語言的。所以「大衆語」這個名詞便被提出而成爲問題了。這是主要的一點。其次，目前突然有種文言復活的趨勢，過去曾經和它決過勝負的白話及其所有者

早就失掉了戰鬪的作用，要克服它，只有出現在的大衆以自己底語言來完成。所以目前必須趕快建設起大衆底「大衆語」來。這是第二點。只要是一個不必使大衆完全變成盲啞聾瞶的人，我相信必定會贊成這個問題之提出的。

（一）什麼叫做「大衆語」？

這個問題，本來在過去老早就有人提出過了；然而常常總是只被作爲問題中的問題提出，雖然經過多次的討論終於還是沒有達到一個圓滿的結論。而且，好像是受了「大衆」這兩個使人膽戰心驚的字所累，從來就沒有一直讓討論好好地發展下去過，即使匆促地得出一點結論也只是原則上的原則；實際上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作用。所以，一直到現在，就連「大衆語」這個名詞都還沒有一個普通地確適的定義，甚至於連這個名詞底本身都還沒有普遍地成立起來。什麼叫做「大衆語」呢？所謂「大衆語」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語言呢？我們首先就必得將這些問題弄清楚。

很明顯地，這個名詞是由文言——白話聯繫而來的。「它雖然是隨着文言——白

話之後產生的一種語言，但它必然是超過文言和白話一種較高級的語言。」每一種語言都有它所代表的具體所有者，那它底內含的意義便由這個具體的所有者來規定。文言是貴族階級底語言，白話是市民社會底語言，這是在「五四」時代底「文學革命」當中分劃得很清楚的。那末，「現在的所謂「大衆語」」自然是市民社會以下的成千累萬的大衆底語言了。這種語言，必然是爲大衆所有，爲大衆所需，爲大衆所用。即是說，這種語言，必然是拿來爲大衆服務而且很適宜於爲大衆服務的。如果再換一句話反轉來說，那「大衆語」就是一種拿來傳達大衆底思想與情感而且很適宜於傳達大衆底思想與情感的語言。更具體地說，就是一種使大衆寫得出，看得懂，讀得出，聽得懂的語言。」

(二)爲什麼要建設「大衆語」？

從此看來，我們可以說現在一般流行的語言是和「大衆語」離得很遠的。要達到標準的「大衆語」，至少我們還得做一番建設的工作。這理由非常簡單而明白！中國底大衆，一向是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和可能的，他們大多數連西瓜那樣大的字都不能識上

一擠，其知識之淺陋更可想而知了。又加以地方閉塞，交通不便，語言複雜分歧到了萬分，有的甚至連同省的人都不通語言。在這樣的情形當中，我們是不能要求一切大衆底現有的語言當中很快地就自然發展出一種標準的「大衆語」的。同時，因為大衆急需取得他們精神上的武器來解放自己和整個世界，事實上又不能不急需取得一種可以傳達新的思想與情感的語言去戰勝那種傳達舊的思想與情感的語言。這却須得馬上就有我們所說的「大衆語」出來供給他們應用。目前是大衆吶喊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幫助他們底嘴巴首先解放。自然，我們不能夠說大衆沒有嘴巴，完全和語言脫離了關係。事實上，亦有許多所謂大衆的讀物在大衆之間流行，例如最低級的小說（七俠五義，說唐，征東傳，岳傳，施公案，彭公案，……等）時事小調唱本以及連環圖畫，等等。不過這些讀物，正因為不是由大衆自己底語言傳達大衆自己底思想與情感，往往倒是由大衆學得了這種語言去接受了它所傳的思想與情感，所以愈是深入大衆，反而愈是束縛毒害大衆的，結果只有使大衆愈是愚蒙和苦痛。言語是不能和意識分開的：要獲得新的意識首先

就要獲得新的語言。為了使大衆能夠獲得新的意識我們亦必須為大衆建設一種能夠獲得新的意識的語言。所以，目前「大衆語」底建設是非常必要而且迫切。我們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建設起大衆底「大衆語」向一切反動的語言進攻，消滅一切語言底隔閡，一直到語言底統一使語言完全成為大衆的。

（三）「大衆語」底建設是可能的嗎？

但是，有許多人認為要建設像這樣的一種「大衆語」實在很困難也許竟是不可能。困難自然是很困難的，天地間並沒有一件並不困難的事業，但如果要認為不可能却就很有商議的餘地了。有的說，這是可能的；而且大衆自己早已開始建設起來了，例如「在五方雜處的大都市裏面，在現代化的工廠裏面，他們的言語，事實上已經在產生着一種中國的普通話（不是官僚的所謂國語。）它容納許多地方的土話，消磨各種土話的偏僻性質，並且接受外國的字眼，創造着現代政治技術等等新的術語。這種大都市裏，各省人用來互相談話，演講，說書的普通話，才是真正現代中國話，這和智識份子的新文言不

同。」有的說，像這樣描寫得活龍活現的「眞正的現代中國話」事實上並不存在，而且舉出實例說就是五方雜處的大都市的上海工人亦沒有一種通用的普通話，在他們中間流行着至少三種形式的普通話，不過並未說出建設「大衆語」之不可能。也許有人還會說要建設像這樣的一種標準的「大衆語」在事實上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在我，却要十分之十地說有十分之十的可能。即以五方雜處的大都市的上海工人眞的沒有一種通用的普通話而有他們中間流行着至少三種形式的「普通話」來說，亦可見得這是完全可能的。既然是五方雜處的不知道有若干種語言的工人都已經只有兩三種「普通話」在他們中間流行着了，爲什麽這兩三種「普通話」不能再融合統一成爲一種共通的普通話呢？即是說，這些各種各樣的不同的語言，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大衆語」建設底障礙，然而其實正是「大衆語」建設底基礎。語言是有它自己底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根據的，我們不能任意憑空將它造出，硬栽在大衆底口裏叫他們說出。我們決不能認爲要沒有各種各樣的不同的語言才能建設起一個同一的共通的「大衆

語。」反之，倒正是因爲語言有了各種各樣的不同才需要建設起一個同一的共通的「大衆語，」而且，在事實上亦是可能的。語言雖然可以說是一種符號，但這種符號和那抽象的或只是代表一些數目的數學底符號不同。它是含有具體的內容的，而這種具體的內容往往規定它底發展和變革乃至創造。它是隨着內容底發展，它是隨着內容底變革而變革。現代的社會，無論在生活上或意識上都將分離的大衆結合統一起來了。他們經驗着同一的生活，他們形成着同一的意識，他們遍處着同一的環境。即是說他們底一切所見，所聞，所感，所思都是同一的。如果語言是代表人們底思想與情感的符號和傳達思想與情感的工具，那末這樣同一的大衆便必會說出同一的語言，建設起一種同一的共通的「大衆語。」

也許這條道路走起來有點困難，但決不是因有一點困難就說無路可走而竟至不走。只要努力地開着足步走去終於會要達到目的。譬如說，在五卅以前，上海的工人很少有知道「罷工」「示威」這些名詞的，到現在可以說誰都會掛在口邊了，這便是由於

生活環境的影響和需要使大衆接受了一些新字，構成共通的語言底明證。誰能夠說「大衆語」底建設是不可能的呢？

(四)怎樣建設「大衆語」？

既然「大衆語」底建設問題可能的了，那末緊接着來的問題就是怎樣建設的問題。怎樣去建設「大衆語」呢？首先我們得決定「大衆語」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語言或具備怎樣的條件。

自然，正如前面所說，「大衆語」就是一種使大衆寫得出，看得懂，讀得出，聽得懂的一種語言。不過要做到這種境地很不容易，至少必須做到下列幾點：

第一，必須拋棄和排斥那些含有毒素的反動的貴族的死去了的言語，批判地接受和採用一般說着現實的具有進步性的新的語言。語言一定有它底一定的內容的，我們一定要關聯着社會意識去檢閱過它底內容包含着舊的遺質有多少和新的生機有多少之後才來決定接受和採用。我們可以滲加些新的東西進去改革舊的，我們亦可以扶

取些舊的東西出來創造新的，但主要的是必須是能正確地傳達大衆底正確的思想和情感的語言。

第二，必須是統一了言文的一種語言，這樣也就將寫，看，讀，聽聯在一起而成爲一種旣寫得出又看得懂，旣說得出，又聽得懂的語言，以後再沒有什麽聽的語言和讀的語言的區分了。自然，語言和文字，在現在究竟是方式不同的傳達思想與情感的工具，有時爲了工具本身限制總難免有種差異：例如語言可以用聲調手勢等等來作幫襯，而文字可以用標點和圖表等等來作幫襯，兩者不能做到完全機械的同一。但這點差異正如說話時的聲調底高下和作文中的圖表底繁簡也會有時不同一樣；只是一種同一工具上所有的差異，決不會妨礙了語文的同一或統一。必須做到這種境地，語言才會簡便經濟起來而爲大衆所有，不然大衆是無法獲得的，結果仍然會如白話之變爲新文言一樣，至今還與大衆離得很遠。這當然不能說是「大衆語」，亦不能成爲「大衆語」。

第三，要是直白的和現實的，一般的大衆都很少有時間過一種精神的生活或作一

種觀念的遊戲，他們缺乏緻密的思維和豐富的想像，只有他們所經驗着的實際生活能使他們特別明瞭感動，而且他們也沒有什麼可以隱諱或掩飾的，所以對於他們必須要是說得現實，直白中肯的話才容易使他們接受和愛好，一種不爲大衆所愛好的語言決不能爲「大衆語」而且也不能很滑稽的稱爲「大衆語」。

第四，要單純，明確，簡短。這里所說的單純簡短，自然是對那種複雜和冗長的語言說的，並不是簡單的意思。卽是說，一切不必要的複雜冗長的文法文句都應該拋棄。有許多複雜的文句，在外國底語言中因爲文法底周備和整齊本來是一眼就可看清的，正如數學中的括弧一樣。但中國底語言，因爲文法和組織的不好却不能這樣了。近幾年大家都在叫譯文看不懂，其原因就在翻譯者將外國底文字依着原有的文法和組織生生地直譯過來。所以，大衆所能接受和愛好的語言一定是單純，明確，簡短的語言。如果用一句術語來說，那就是一種以最小限度的話收最大限度的效果的語言。這也就是「大衆語」底長處和特點。

第五，要通俗化。所謂通俗化，亦可以說就是大衆化的意思。「大衆語」當然要大衆化，這還成什麼問題呢？不過，我們應該具體地說，所謂通俗化就是說這種語言應該隨着大衆底程度建設，提高，主要的條件是要與大衆底理解相適應，決不能超過大衆底理解程度使大衆不懂。而且，更主要的是使一切大衆都能理解使用，不只是爲那一部分大衆所理解和使用。不過，我們同時要反對故意將語言降低到失掉了進步性的程度去迎合一般落後的大衆低級趣味。即是說，我們一方面主張語言通俗化一方面又反對將語言轉化成爲低級的語言。因爲那種語言決不能爲進步的大衆服務，決不能代表大衆語言而成爲眞正的「大衆語」。

這不過大體地說說，如果要周納備至地列舉出來，那恐怕還有很多很多。接着問題還是怎樣去建設「大衆語」呢？

第一，目前的大衆還沒能力來建設自己的語言，這種工作便留在一般進步的肯爲大衆服務的智識份子身上。自然，這建設底原動力仍然是在大衆自身底發展，不過一種

意識的完成和能動的推進却必須大衆自身以外的助力，一般進步的肯爲大衆服務的智識份子，必須走入大衆當中去體驗他們底生活，通曉他們底語言，學得他們底視聽採取他們底有最大的同一性的語言來加以分析，揚棄，研究，組織，建設成爲一種最低限度的「大衆語」，然後再對它加以充實，提高，使其發展到標準的「大衆語」的境地。

第二，利用一切同樣的方式或形式去和那些大衆所愛讀和聽的最低級的故事演義小說，時事小調，唱本，落後思想和反動意識最濃厚的戲曲，說書，灘黃，宣卷等等對抗，同時就在這對抗之中建設起大衆所愛讀和聽的「大衆語」。

第三，舉行普遍地廣大的「大衆語」宣傳，創辦通俗的大衆雜誌，以一部分作爲研究討論「大衆語」底建設問題，以一部分作爲敎育大衆的篇幅。並發起組織一種機關來研究中國俗話底文法，句法，性質等來作爲建設「大衆語」的原料。

第四，提高大衆底文化水準。中國底大衆是很少有機會受敎育的，要提高他們底文化水準，我們應該普遍地組織大衆讀書班和大衆通信乃至起碼的識字運動，文化水準

不提高到相當的程度，「大衆語」是不容易建設起來的，這一點，看起來好像是與「大衆語」運動離得較遠一點，然而其實是最基礎而又迫切的工作。

「大衆語」底建設，在目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運動，也是一個偉大的艱苦的運動，必須要盡可能地努力去才能不至於如過去那樣半途夭折，必須要很鄭重認眞地刻苦地開始工作方能達到成功的目的。一切進步的肯爲大衆服務的智識份子都應該向這方面進軍。

（新語林創刊號七月五日）

普通話與「大衆語」

魏猛克

現在的所謂「文言文復活」其實只是燈油將盡的「回光反照」，本來不足稀奇，更用不着怎麼憂慮。倘若爲青年人前途打算，少使他們上點無謂的當，而羣起以攻之，則雖然所耗費的氣力太可惜，在當前却還是有意義的。關於「大衆文學」的問題，好幾年前早就有人當作一個嚴重的問題來提出過，不過那時所獲得的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理論上的鬬爭簡直可說是完全沒有。直到一九三二年文學月報創刊時，才又由宋陽先生將這問題重行提出，這回却不但有了理論上的鬬爭的發展，並且最先涉及到「用什

麽話寫」的文字本身，這實在是大衆文學急待解決的先決問題。但是他與止敬先生戰了一個回合之後，又不幸因該誌的停刊而被延擱下來。現在我們再提出「大衆語」的建設問題來發展討論，倘能因此而成爲一個新的運動，那意義自然更重大了。

看現在的議論，是已經同意話和文不能分開。但「用什麽話寫」大衆有不有一種普遍的語言，我們可不可採取一種語言來做「大衆語」呢的這些問題，却似乎還少有具體的意見。但從前宋陽先生是提出過了：他以爲只有「現代中國普通話」才是「大衆語，」才是大衆中間的普遍的語言。不過他所指的普通話主要的是「現代化的工廠」裏面流行的那種話。所以經止敬先生調查的結果，知道還是以當地土白爲基本，仍然不是普遍性的大衆所能懂得的話。其實「現代中國普通話」是有普遍性的，牠是主要的流行在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鋪，遊藝場等處，工廠不過也受到影響，這是客籍的工人帶進去的，但因爲他們的生活不是流動的，久之就要和當地的語言同化。所謂普通話是因爲交通發達，各地人們往來日漸密切，要求交涉上的便利而產生的。所以牠的目的

只在要人懂。牠不是容納各種土話，牠是竭力避免各種土話。牠在企圖每句話都能夠說得出，寫得出，每個字眼都找得出意義來。牠比北平話簡潔，少「兒」「啦」等語尾詞。自然，「現代中國普通話」還沒有達到完善之境地，有時還夾雜些所謂「南腔北調」（零碎的土語，）但牠必然會隨着交通發達而進展，隨着社會意識的轉變而轉變。中國處在現在世界的狂潮之下，語言的統一當然不是久遠的事，那時統一的語言爲「現代中國普通話」轉變而成，大約也未必會錯。所以我想，採取有普遍性的「現代中國普通話」作爲建設「大衆語」文學的基準，是可以的。作家在作品中盡量採納普通話，也未必不是文學接近大衆的初步。完全用普通話寫文章，將來也許要變成最明朗簡潔的文章。

我對於採用土話的主張很懷疑，土話是原始的，沒有進步性的語言。土話寫出來只讀得出聲音，找不出意義（音義雙全的「土話，」便是人人可懂人人能說，不成其爲土話了，即如「搗蛋」一語，便非山東人也常說。）試拿張天翼君的小說來看，他最喜用的一句罵語是：「奶奶雄，」這「奶奶雄」我們可知道是指什麼東西呢？又如「啊啦，」「

頂括括，」——「乖乖隆」——等語，倘非當地人是不能從字面上理解其含義的。一篇文章用許多看不懂的土話，即使加了註釋，那效果與搬用成語和典故，又有什麽分別麽！

「大衆語」文學的建設是艱難的工作，還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論爭。倘談到土話的採用時，則希望不要忽略了牠現在在文學作品上所收到的是怎樣的效果。

（申報「自由談」六月廿六日）

什麼是「現代中國普通話」？

陳弈

在「文言」與「白話」的爭論中，陳子展和陳望道兩位先生的更進一步的提出了「大衆語」文學問題的討論這是一件可喜的事。

關於「大衆語」文學的這一課題，在幾天來的各報附刊上，都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昨天在「自由談」上，又讀到了魏猛克先生的「普通話」與「大衆語」一文，魏先生在這篇文章中，特別的提出了「現代中國普通話」來，魏先生認爲「『現代中國普通話』作爲建設『大衆語』文學的標準是可以的。」關於這一點，我以爲有很多的疑問，

而不敢妄加苟同的。

什麼是「現代中國普通話」呢？這在以前的文學月報上是沒有討論出結果來的。但據魏先生說「『現代中國普通話』，牠是主要的流行在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舖，遊藝場等處。」對於這點，不知是否魏先生有親自觀察過，而發覺有這末一種「普通話」在那些場合上普遍的流行着？不過，我們只知道在現在的情況之下，整個的中國是沒有一處的語言統一的。而魏先生却是說這一種「現代中國普通話」是到處的流行在「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舖，遊藝場等處」的。那末，這種流行普遍各處的「現代中國普通話」到底是那一種語言呢？這不知魏先生是否有着明確的事實可以證明？

說到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舖，遊藝場等地方，在我個人到是經過很多的，但是，我從來就沒有聽到這種到處流行的「普通話。」而只是到一處就有一處的話。比方說到了香港或廣州的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舖，遊藝場等地方，總是聽着一些廣州話，甚至內地的土話。要是你再到汕頭或廈門去，在這些輪船，碼頭，客棧，遊藝場等地方，又是

變成完全用碼頭話或廈門話了。再之，就是單在上海的這一都市裏，是不是各輪船，火車，碼頭，車站，飯舖等地方，都是說一樣的語言呢？所以魏先生的提出「現代中國普通話」是「流行在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鋪，遊藝場等處。」這不知到底是那一種話？最低限度，我是不知道的。因爲現在不單是全國到處的輪船，火車，客棧等地方不會有一種統一的話，就是單獨的在一個都市裏，也是沒有這樣一種通行統一的話的。

魏先生還說：「中國處在現在世界狂潮之下，語言的統一當然不是久遠的事，那時統一語言爲「現代中國普通話」轉變而成，大約也未必會錯。」這一點，我認爲魏先生是太過於武斷了。中國的語言是否很快的在短時期內就能夠統一？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然而假如是統一之後，據魏先生說是通行「現代中國普通話」所變成的語言；那末這是不是可能的？上面我說過，現在的這種「現代中國普通話」還不知是那一種話，爲什麼魏先生現在就這樣武斷的說統一之後實用這一種由「現代中國普通話」變成的語言，這不知魏先生是否如某預言家（？）的有先見之明，或者是有什麼證據可以

先搬出來給大家知道？

至於說到「採取有普遍性的『現代中國普通話』作爲建設『大衆語』文學的基準。」這更是一種空洞的理論。其實，現在還未知道所謂「現代中國普通話」是那一種話的時候，就先把牠提出「作爲建設『大衆語』文學的基準，」這還不是笑話嗎？

最後我希望魏先生把這所謂「現代中國普通話」是那種話這一疑問解說之後，再去談別的吧。

（大晚報「火炬」六月廿九日）

話跟話底分家

耳耶

話跟文章，都是表達人底思想感情甚麼的的東西；文章，甚至於是寫出來的話。照理，除了文章，因為受繕寫印刷等技術上的制約，必需比較經濟，謹嚴以外，以及文章可以容許獨有的方法如標點圖表甚麼的以外，話與文章，應該是一致的。但是現在事實上，話跟文章這樣地不同！但中國，世界各國的話跟文章也很不同！它倆為甚麼分了家的呢？這一點，現在討論「文言文」跟「白話文」的問題的先生們並未提出。

我以為是必需提出的。

話跟文章分家的問題，其實就是話跟話分家的問題，也就是人跟人分家的問題。在這裏沒有工夫來詳細研究人跟人分家的問題；那末就從話跟話分家說起吧。

人類社會，在最初，他們說的話，在某種程度的地域範圍以內，是一樣的。因爲他們底生活習慣，他們底行爲，他們底觀念，沒有甚麽不同。但是在很久以前，人跟人就分了家。中國的聖賢，究竟是不凡的；譬如孟子，在幾千年以前，就把人類社會分成「勞心者」跟「勞力者」兩大類。這分法是對的。雖說現代的社會科學，有更準確的用語；但是有些人好像不很喜歡科學，那末，就用「勞心者羣」跟「勞力者羣」這不科學的話來代替吧。

所謂「勞心者羣」跟「勞力者羣」的分別，無非就是參加生產過程跟離開生產過程的分別，因爲有的參加生產過程。有的離開生產過程，兩者之間底生活習慣，就慢慢不同起來，不但行爲，就是觀念也慢慢不同起來；不消說，兩者之間底生活習慣行爲思想所需要的話，自然也跟着不同起來。時代底進化，就是說，生產工具跟生產關係底逐漸改變，兩方面的生活習慣行爲思想也以不同的發展路線逐漸改變；兩方面的話底不同程

度，就逐漸增大。但這裏所說的不同，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體。他們兩者，究竟不是可以「老死不相往來」的兩個民族，他們必需交通彼此底意見，纔能維持彼此的關係。就只這一點，也就不允許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話。這樣一來，這不能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的話為了研究，我們倒可分成三種了。一種是共同的話，其餘兩種是兩方面各自的話，換句話說，就是：勞心者羣底話等於兩方面共同的話加自己獨有的話；勞力者羣底話等於兩方面共同的話加自己獨有的話。話，就是這樣分了家，自然地。

還有一種是人工地分家。

有兩個不同的「者羣」（恕我杜撰），就是有不平等的事實，也就一定有不平等的觀念。換句話說，就是有尊卑貴賤的事實跟觀念。在這樣的社會，尊貴者羣，會鄙視卑賤者羣，是必然的。鄙視他們底人，鄙視他們底行為動作，決不會單獨不鄙視他們底話——他們所獨有的話。鄙視他們的話，就不說他們底話，即使非說不可的時候，也特為找旁的話來代替。從前俄國的貴族，在他們自己底「者羣」之間，是不說俄國話而說法國話的。

那原因就在於農奴們都說的俄國話。在華貴的「紗籠」裏面，如果有一個「麥歇」在一個「馬丹」面前無意地說出了一句俄國話，那簡直是莫大的侮辱，像我們在一個小姐面前說出了兩性生殖器底最土俗的名字一樣。至於那些貴婦人們，除了在她們底奴僕面前，永遠沒有說一句俄國話的機會。這雖是極端的例子，却也是說明尊貴者羣怎樣鄙視卑賤者羣底話的最好的例子。舉一反三，我們就可知道話跟話是怎樣人工地分了家。

（下次：話跟文章底分家）

（中華日報「動向」六月廿二日）

話跟文章底分家

耳耶

說明了話跟話底分家，再要說明話跟文章底分家，是很容易的。在分成兩個不同的「者羣」的社會，那一個「者羣」最願意維持現狀，因之也最需要「宣傳」，就是說，最需要寫文章，同時也最有工夫跟能力寫文章。最有機會發表文章呢，何消說，一定是勞心者羣，也就是尊貴者羣。自然，尊貴者羣跟卑賤者羣底界限，並不是一架翻不過的山；出身卑賤的人，也常常「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卑賤者羣也不見得沒有人寫文章。不過，無論怎樣出身卑賤的人，只要他一開始「十年寒窗，」他就已經脫掉了卑賤

者羣底特色——勞力參加生產。生活上他已經不屬於卑賤者羣而屬於尊貴者羣了。何況他因爲要「一舉成名」，必需先丟掉卑賤者羣底意識，抓住尊貴者羣底意識，纔有辦法。意識上，他又確乎是個尊貴者羣。當然，像現代因爲產業底發達，人類知識底進步，卑賤者羣，也有人能夠寫文章，並且還保維着卑賤者羣底意識的事是有的；但在往古，例如完全的封建社會，卑賤者羣如果要寫文章，必需先變成尊貴者羣。「儒林外史」上有個裁縫做詩，雖說他沒有丟掉他底職業，但是他底意識，仍是尊貴者羣的。

這尊貴者羣寫文章的時候，究竟願意用哪一個「者羣」的話寫，能夠用哪一個「者羣」底話寫呢？卑賤者羣底話，他們是鄙視的，平常連說都不說，難道還肯願用那種話寫文章麽？並且因爲他們底生活習慣隔膜，他們對於卑賤者羣底話也隔膜了；就是想用那種話寫，這隔膜也使他們不能運用。那末，剩下來的還有甚麽話呢？只有尊貴者羣底話！也只有這種話他們願意用，能夠用。有人說，寫文章的人，從古就有很多用通俗話的，胡適底「白話文學史」上就有不少的例子。豈不好像寫文章並不一定非用尊貴者羣底話不

可麽？不過，我們要知道，卑賤者羣底話，如果有時被寫文章的人採用，那動機怕是好奇，態度常常是玩笑的，游戲的，像「儻約」甚麽的就是。并且，那也不過偶一爲之，平常還是用尊貴者羣底話寫；同時，也只是個人底事，全體還是用尊貴者羣底話寫。

還有，表現某一個「者羣」底生活意識，只有用那個「者羣」自己底話，才能恰到好處，才能體貼，刻畫到「入微」的程度；另外的話，一定會牛頭不對馬嘴。不但寫文章的人底表現問題；讀文章的人底理解問題，也很要緊。寫給某一個「者羣」讀的文章，當然要用那讀的人所屬的「者羣」底話；要是不，讀的人一定不會了解，就算了解也不會透澈。寫文章的人既然屬於尊貴者羣，他必需表現卑賤者羣底生活意識，以及特別寫給卑賤者羣讀的理由，是不容易找到的。自然，在一種新舊交替的時代，這樣的事實也可以有；但作爲通常的情形，尤其是初有文章的時候，文章一定是表現尊貴者羣底生活意識，以及寫給尊貴者羣讀的。這場合，我們怎能夠說寫文章的人會不用尊貴者羣底話呢？

但是文章雖是用尊貴者羣底話寫的，却並非只要是尊貴者羣底話都有寫進文章

的資格。也不能照尊貴者羣底話原樣一絲不改地寫進文章裏去。第一，在紙底出現以前，寫文章要用「竹」「帛」，那夠多麼麻煩；同時，印刷術沒有發明的時候，文章要傳世，不能不靠人來鈔寫，又夠多麼麻煩。加以這時候的文字，恐怕比話還要簡單，一定不夠用。那末，寫出來的文章，雖說是尊貴者羣底話也一定是簡之又簡，省之又省的話。第二尊貴者羣雖然又叫勞心者羣，其實許多人是連心也不勞的；有許多人雖然勞心，却不勞在寫文章上，因此，寫文章的事，在尊貴者羣中間，也並非人人會做；倒成爲一部份人底專門技能或職業。這樣一來，那些文章職業家一定會盡力地研究怎樣把文章寫得簡短，怎樣在話中間採取最精采部份，怎樣使文章比原有的話，表現得還圓滿，還美麗。這樣，文章就一天天跟話隔得遠了。自然，由於工業技術底進步，紙底出現跟印刷術底發明，從前認爲必要條件的省簡，慢慢變成不必要了；但是文章並沒有從職業家底手裏解放出來，依舊被他們把持操縱着，他們那舊有的習慣技巧，就妨害文章跟着話底發展前進。因此話跟文章，只要一天有兩個「者羣」底對立，一天有文章職業家存在，就永久沒有一致的趨

勢。

（中華日報「動向」六月廿五日）

關於「文言文」底形成跟發展

耳耶

關於文言文底形成發展的問題，應當讓給對中國文學甚麼的特別有研究有興味的人來談；這裏只提供幾個原則上的意見。

第一，有人說「文言文」是周朝人底話；假如這話可靠，那也只是周朝的尊貴者羣底話底省文，不但那時的卑賤者羣底話沒有被寫進去，就是尊貴者羣底話也未必就全部留下來。固然，也有歌謠甚麼的，是從民間採取來的；但是「民間」本身就是個曖昧的名詞。到了漢朝，文章的範圍更大了，語彙更多了，表現力也更強了，本來可以有一個飛躍

的發展；但是因爲那文章所「載」的「道」並沒有前進一步，限死了文章不能有全新的面目。作文章的人，不過以周朝的尊貴者羣底話底省文爲基礎，加以改變，卻沒有人想到用自己每天所說的話寫文章。他們把話跟文章底分家，看作當然的道理；甚至把那已經發展得相當複雜了的文章，簡了又簡，省了又省，硬要它接近周朝的少數人底話底省文。相傳蘇軾跟黃魯直比做古文，同一題目，蘇比黃寫的多幾個字，蘇氣極重作，結果比黃底少兩個字。章炳麟告訴人做古文，是把平常的文章，儘量地減除虛字，減到一個也不能減了，就成了所謂「古文」。把自己寫的文章叫做古文，在五四時代曾有錢玄同先生笑過他們不通。這「不通」，就在於他們要把文章合乎周朝的少數人底話底省文，或以那省文爲基礎發展到某階段了的文章。這樣一來，時代越往後，文章跟話就越離得遠了。

第二，爲甚麼獨有周朝的尊貴者羣底話底省文，形成了「文言文」一直支配到現在；周朝的文化思想，在歷史上佔着支配的地位的緣故。原來中國底所謂文化思想，都是封建的文化思想。周朝是封建經濟底全盛時期，農業生產達到了很高的程度，所以禮制

文物大備——文化思想特別發達以後的封建經濟，雖說有長期的穩定，也不是沒有種種發展，但多是細微末節的部份，很少本質的東西；同時工商業底抬頭，雖沒有致封建經濟底死命，却也不斷地給它以打擊；從前的那種盛世已經不可再見了。因此文化思想，也就不見有超過周朝所有的進步。歷代的文化思想，既都在周朝的文化思想底支配影響之下，崇拜周朝的文化思想是必然的。崇拜周朝的文化思想，附帶地就崇拜了周朝的表現文化思想的工具——文言文叫做「載道」的「文。」

第三，文言文本身有很多的進步。同是周朝的文章，戰國時候的文章，就比春秋時候的文章暢達得多。這裏用不着多找例子，只用把孟子底書跟孔子底書，莊子底書跟老子底書比一比就可作算「民間」就是我所說的「卑賤者羣，」一經尊貴者羣底「採取」寫出，一定就不很「民間」了。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爲甚麼「思無邪」呢？難道那時候的卑賤者羣，果眞那樣知書識禮，明白「先王之道」麼？恐怕無非是經過了「採取」而又粉飾之功吧。所以我們如果把孔子底「删詩，」理解爲删除那些

由於採取者不小心，照那歌謠底原意或原話寫出，未能那樣「思無邪」的東西，大概不會有很大的毛病。

（中華日報「動向」六月廿八日）

關於「白話文」底發生跟成長

耳耶

雖然尊貴者羣極力要把文章寫得「古」，但正像資產階級在封建社會成長了一樣，用話寫文章的事，或者說使文章接近於話的事，也慢慢在那古香古色的文章的氛圍氣之中，發生，成長起來了。起初，在寫文章的人，作興是偶然的，態度也不一定好，但儘管這樣，那用話寫文章，甚至用一部份卑賤者羣底話寫文章的事終於有了。那文章還是尊貴者羣寫的。尊貴者羣，在某種場合，必需跟卑賤者羣發生契約關係之類的事，那契約又一定要卑賤者羣能懂，至少聽得懂。這場合，再好的「文言文，」「古文，」完全無用，尊貴者

羣就不能不屈尊用話或像話的甚麼來特別為卑賤者羣寫文章、「倖約」——一向是被當作滑稽文章的；就算是滑稽文章吧，我們也可以看出它底這種嚴肅性來。

這裏，應該加重補充一點：這種文章，起初一定是尊貴者羣寫的。卑賤者羣不能寫文章，也沒有工夫寫文章且不說；作算有這麼一兩個人寫，然而尊貴者羣中間，像孔子那樣的「大成至聖」多的是，他老先生「筆則筆，削則削，」並且又「删」過詩書，那種文章，經過聖人底一「削」——「删，」放心吧，本來面目是不會保存下來的。只有尊貴者羣寫的，才有希望逃過那些檢查員（不，不應當說是聖賢）底「删」與「削」！

歷史是前進的，「法律賤商人，商人今富矣。」到了有很多的「商人今富矣」的時候，一方面是工商業影響之下的大衆，會發生文化生活的要求；一方面是尊貴者羣不肯放鬆這雖然卑賤却是「富矣」的商人，要把他們拉到自己底陣營裏來，為了麻醉大衆，為了欺騙商人，尊貴者羣，可以特別寫出一種容易懂的文章。並且，隨着歷史底前進，話跟思想，越見複雜，文言文底缺點，漸漸暴露，「古文」就變成「惟不宜於說理耳」（好像

是曾國藩底話）的東西了。豈僅「惟不宜於說理耳」而已哉，「理」以外的甚麼也只剩下些空洞曖昧的「詞藻」。一方面是實生活的體驗，一方面是那偶然寫出的「儻約」之類的文章的對比；「平話」「語錄」甚麼的就產出了。這之後，用話寫文章，使文章接近話的事底影響漸漸擴大，不但尊貴者羣，就是卑賤者羣，也慢慢有人會寫文章；甚至進步的尊貴者羣中的人，也用卑賤者羣底話跟意識來寫文章。

雖說這樣，尊貴者羣，還是看不起這些用話寫的文章的。甚至寫文章的人自己，也覺得不足齒於大雅之林。就說「語錄」罷，他們並不把它當作文章看待，「語錄」這意思，是說只是「話底記錄」，記下來了準備寫成文章的。換句話說就是文章底毛坯子，不算正式文章。

不過看不看得起是小事，使文章接近話的趨向終於在被人輕視之下，不斷地發展，而且有了很好的成果。這時候，那些「我欲正人心息邪說」的尊貴者羣又來了。他們把這些成果，不當作因為是用話寫出的原故，也不當作用話寫出的文章看，只當作從這篇

那篇「古文」脫化出來的，只當作用話寫的「古文」看。至於那些成果中如果有一點甚至是卑賤者羣底意識的東西，不用說，更歪曲得一塌糊塗。譬如「水滸」是一部有名的小說，是好多年在苦難中奮鬭出來的成果。而它最可取的地方，就在是用話寫的。然而我們底金聖嘆老爺怎麼說呢？他說這是「才子書」，他硬把它放在左史莊騷一塊兒！並且，那書中有一點兒不像尊貴者羣底意識的地方——強盜不是天生的，不是壞人；官老爺們反是壞人，逼人做強盜——簡直使他忍不住。於是他竄改，他要「以為渺封肉谷」，他硬在那書中造出甚麼「微言大義」，「春秋筆法」來。

尊貴者羣這樣就完了麼？不！他們曉得卑賤者羣喜歡看這種書。可是未必懂得甚麼「春秋筆法」。光指出一下是不夠的。於是他們又作「蕩寇志」，並且還利用卑賤者羣喜歡讀用話寫的文章這件事，寫了好多大五義，小五義，彭公案，施公案之類的「為國家，秉忠心，食君祿報皇恩」的以綠林叛徒為主角的所謂大衆小說。他們這種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辦法，比林紓汪懋祖輩，要通權達變得多。

話又說回轉來用話寫文章或使文章接近話，雖然成長，發榮但是它不能取得支配的地位。因爲支配着社會的尊貴者羣，雖然有時通權達變，更多的時候，却是遵經中常的。他們根本沒有眞正用話寫文章的要求。用話寫文章，如果要取得支配地位，除非舊制度根本動搖，新興勢力，要來取而代之的時候——五四時代，會有點像。

（中華日報「動向」六月卅日）

文言與新文言

胡繩

從五四時代的林琴南之輩一直到現在的汪懋祖，提倡文言，攻擊白話的理由，似乎還是這些一點。不過林琴南之輩還老實說文學是應當爲上流人而作的，而白話却入不得大雅之堂。然而現在的文言提倡者却更聰敏了。申報二十一日汪懋祖的文章中說：（原句已不記得。）他們到了鄉下之後，看到鄉下人對於文言的擁護，才使他更堅決的提倡文言。這樣一說，似乎汪懋祖的提倡文言，倒還是爲了勞苦羣衆設想的了。——夠多聰敏的汪先生啊！

當農民們不懂得進門為什麼一定要脫帽子理由的時候，農民們會被罵作愚蠢與頑固的。而現在一部份農民的守舊與遲鈍，又被汪先生拿來作為提倡文言的幌子了。

提倡文言的理論固然不値一擊，然而對於牠給以輕視，甚至忽視是決不行的。

五四時代雖然以提倡白話為口號，但是靠了那個時代的英雄要建立起真正大衆的語言，本是不可能的。何況為了中國經濟的特殊條件，正如民族資本家剛一抬頭便與封建地主結合了一樣。五四的白話雖然在理論上戰勝了文言，而稍緩立刻與文言結合而成了新的文言。——今日的所謂「語錄體」之盛和文言的提倡原是一個聯繫中的事情，同樣都是不容我們輕視甚至忽視的。

為了澈底的戰勝文言與新文言，我們必然要去找得一個更新的武器。——於是乎，所謂「大衆語」者被人提出來了。

對於大衆語這裏不想多說，只擬就樂嗣炳君在二十二日自由談上發表的文章稍說兩句話。在那一篇文裏，樂君說：「確認普通性最大的北平話作現代語的基準大衆語

中的主要成分。」我覺得這是不妥的。我們現在的確需要方言文學，要北平話的，如要吳語的廣東福建話的一樣。但「確認」某一種方言爲大衆語的基準在事實上是做不到的。手邊有本文學，在老舍的一篇小說裏找出這許多字眼來：「別扭」「敢情」「發毛咕」「就手來」……這讓蘇州人，廣東人看未必會懂的。固然除去方言文學，我們也要普通話的。但這普通話應當是在實際生活中創立起來的，而決不是已有方言中的任何一種。

（中華日報「動向」六月廿八日）

關於大衆語文學底建設

王任叔

我以爲在這大衆語文學的名詞下，首先要決定的，是「大衆」這個名詞底屬性。因爲「大衆」這個名詞，根本是含義籠統，沒有確定的屬性的。在封建君皇之前，山呼萬歲的人民，固然可叫大衆；在革命的廣場裏，大喊打倒擁護的也可叫大衆。我們現在要建設大衆語文學，如其不僅僅限於語言底範疇裏，正如胡適之先生所說，還要包含大衆意識的。那麼，我們將以那一類大衆作爲基礎呢。落後的大衆意識和前進的大衆意識，其間相差的距離，差不多有一世紀之遠。自希望眞命天子底出現，以至於發現了自己，——想由

自己來負担歷史的任務的大衆在現階段的中國，恰巧對比地出現着。在這時候，所謂大衆語文學之建設不得不發生一絕大的困難和矛盾了。

其次，要提到爲什麼現在有人要提倡大衆語文學呢，及提倡這大衆語文學底作用是在那裏的問題了。這大約可作如下解釋。大衆語提倡契機，是在文言復興運動的刺激下，作爲反文言復興運動。同時，更使白話運動深入於大衆而起來的。所以從後一意義來說，也就是白話底奧伏赫變。（申報讀書問答欄中把這一意義也叫做「反白話」；實際上，反白話底「反」，與反古文底「反」，有其不同的意義；反古文是從其對立形態上來說的，反白話則是一種自身底揚棄與調整，這一點應該加以區別。）而所以要把白話奧伏赫變過來，就是爲的要深入大衆，接近大衆，這基礎正築在許多大衆還在希望真命天子，還看不到自己歷史的任務，而必須加以教育這一點上。大衆語文學在這教育的意義上，才把前項所說的落後大衆與前進大衆意識底衝突（也就是落後大衆意識與歷史的進展間底矛盾）統一起來了。就是大衆語文學底建設者，是以生產大衆爲其對象，

以前進的大衆意識爲作品的內容用大衆所活用的語言而從事創作。但在這前提下，立刻又發生了一種矛盾。就是在非大衆本身的「特殊者羣」——如現在提出大衆語文學的作家們——負担起現階段的大衆語文學建設任務的時候，如何能使語言大衆化呢？換句話，這些「特殊者羣，」大都爲他們自身階級所決定，比較是便於運用五四式（或買辦式）的白話的。要他們更進一步創造大衆語，是不可能的；即使勉强要裝場面，硬把語言弄成大衆化；其流弊所至，反把那些浮動的容易接受的非生產大衆罵街的語詞盡量地吸取了。這現象，在現階段中國較進步的作品裏，已顯著地發揮出來。記得文學月報裏曾經登載過一首駡論書雜誌派長詩，魯迅先生曾加以指摘，而產生這一詩篇底實際原因，却在這點上。

問題一開展到這里，覺得大衆語文學底建設根本有個矛盾；似乎不大可能的了。但這可不然。要解決這個矛盾，方法是有的；那就是作家底實踐問題。就是一句老口號「到民間去」的問題，就是參加到生產大衆中去一同生活的問題。祇有在實踐中，能增加作

品裏大衆的語彙；祇有在實踐中，能削弱大衆間對於封建殘餘觀念底擁護。能在作品中增加了大衆語彙，那就是能把作品和大衆發生了關係，盡了教育的任務；同時，能削弱大衆間封建殘餘底觀念，那麼再透過作品，就很容易引起大衆來作反封建以及反帝的運動，而展開了另一個場面。（反帝應與反封建相聯結的。因爲在現階段中國底封建勢力，實在是帝國主義爲便利其本身底侵略而扶植起來的。）那時候不特文言復興運動，失掉了它的根據——基礎，卽買辦式的白話，也自然而然地淘汰了。然而大衆語文學，進展到那時候，其自身又必須與伏赫變了。新出來的，應是「什麼」文學了吧。

當然，這一過程，決不如上面所說那麼機械和單純。大衆語文學的建設，必需有其他的動力，就是社會變革中的主要動力。那不是這篇短文所能詳盡述及，也就止於此了。

我底結論是這樣：在大衆語文學建設過程中，落後大衆意識和歷史的進展間底衝突，是可用教育這一意義給予以統一。而現階段非大衆出身之作家們其所固有的便於運用的語言，和大衆語間底矛盾，是可以實踐給以統一的。而實踐呢，是能統一一切問題

中之矛盾的。

（申報「自由談」七月三日）

大衆語文運動之路

陶知行

胡愈之先生所下之大衆語之解釋很好，我想提出兩個字的修正。大衆語是代表大衆前進意識的話語。大衆文是代表前進意識的文字。

大衆語與大衆文必須合一：在程度上合一，在需要上合一，在意識上合一。

大衆語文適合大衆的程度，需要和意識時，在大衆本身所起的反應是高興。所以大衆語文是大衆高興說，高興聽，高興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這高興的境界便是藝術的境界。

一個月前，我從一家電影公司裏借得一捲電影片子，送到鄉下去公映。我們想在公映前幾天教農人讀說明書。這說明書雖是用白話文寫的，但是鄉下小先生不會教農人也讀不來。我只好重新寫一篇說明書來教大家。這工作是不容易。我一連換了幾次稿才勉强寫成。據小先生說：我最後寫成的說明書，還嫌太深。但比了電影公司的原稿是淺了十倍也不止。這個例子說明現在通行的白話文只是把文言文的「之乎者也」換了「的嗎啊呀，」夾了一些外國文法和一些少爺小姐新士大夫的意識造成的。這種白話文，寫起來大衆看不懂，讀起來大衆聽不懂。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文學運動裏是有一個大黑幕：白話文不與大衆語合一。

大衆是過着符號貧窮的生活。但是他們需要符號是鐵打的事實。老太婆用繩結記帳。農夫刻樹皮抒情。野孩子寫王八旦罵人。民衆學校學生用注音字母代替他所不會寫的字。這種需要更可以用一個故事來說明。從前有一位婦人寄了一封信給她的丈夫，丈夫打開一看，紙上畫的是：

「一個單圈，一個雙圈，一個圓圈，一個破圈，一連許多圈。」

丈夫看不懂。一位聰明人把他夫人所畫的圈中秘密指點他說：

「欲寄相思無從寄，畫幾個圈兒替。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圓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說不盡的心思，把一路的圈兒圈到底。」

這些例子指示出大衆的生活中是有一個大缺憾。大衆沒有取得夠用的思想的符號，情感的符號，行動的符號：總而言之，沒有取得充分的生活的符號。大衆的符號是和大餅一樣的貧乏。剝削大衆的大餅的人是同時獨佔了大衆生活所需要的符號。

照這樣看來，大衆語文運動是有兩條大路可走：

（一）智識分子參加大衆生活，在大衆語演進的基礎上努力寫作語文合一的大衆文；

（二）將生活符號普及於大衆，使大衆自己創造出語文合一的大衆文。

智識分子要想寫大衆文必須先學大衆語，他必須拜大衆做老師。不夠！他必須鑽進

大衆的生活裏去與大衆共生活共甘苦。他必須是大衆隊伍裏的一位戰士。等他自己的生活與大衆的生活打成一片，然後他纔能領略大衆生活之酸甜苦辣；然後他寫大衆便是寫自己，寫自己便是寫大衆。如果他不屑拜大衆做老師，不肯在大衆的隊伍裏做一個小兵，他決寫不出好的大衆文。

拿什麼符號來向大衆普及？漢字呢？注音字母呢？拼音文呢？我的建議是三管齊下：漢字要教；注音字母要教；用注音字母拼成大衆文更要教。

漢字是士大夫的法寶，大衆必須認得這法寶，纔能看破士大夫的神祕。能教漢字的人有八千萬。漢字的本身雖難學，但是能教這符號的人如此之多，是推廣運動的一個大便利。我以爲漢字只要認得就夠了。幫助大衆認識漢字的一個方法便是注音字母。大衆學會注音字母便可以自動去用字典，認生字，追求新知識。但是我們不能停頓在這裏。我們必須立刻教導大衆運用注音字母去記錄自己的思想，情感，行動。我們必須立刻教導大衆運用字母去寫大衆文。我們教漢字的目的在使大衆認識那被漢字包圍的中國；我

們教字母的目的，小而言之在幫助多識漢字，大而言之在用秋蟬脫殼之方法創造拼音字來代替漢字，以產生拼音的大衆文。

我們做普及文字符號的工作時，應當連帶提倡俗寫簡筆漢字，印寫字體合一，字母正草合一，以節省學習之時間精力。

中小學校及民衆學校之學生都該做起小先生來，每人至少教兩個不識字的人。這樣一來，我們便有一千多萬有組織的分子來負起普及符號之重任。再加上八千萬識字民衆之進一步之培養及總動員，數年之間，必可使大衆取得他們生活所必需的符號。

大衆得到符號便能將自己的生活，深刻的描寫出來。大衆的隊伍裏自有文藝的天才。他們自然而然的會產生出第一流的大衆文。

我們把文字符號傳給大衆的時候，要做一番「濾清」的工作。我們要把時代落伍的意識濾掉，要把麻醉的毒質濾掉，要把古典濾掉，要把洋文法濾掉。我們獻給大衆的符號是要和沒有微生物的清水一樣。大衆得了這種清水的符號便能自由的，毫無成見的

寫出眞正的大衆文。

我想指出大衆語必以一種活的語言爲基礎。中國四分之三的人能懂的活的語言便是濾過的北平話。北平話又最好聽，好聽，人就願意學。因此，北平話實有成爲大衆語之主要成分之資格。但大衆語應當膽量大。凡與大衆前進生活有親切關係之各地土語，甚至於外國話都可儘量吸收。我們也不必懸一抽象的主觀的標準，勉强加以去取。讓大衆自己去選擇好了。不合前進大衆的口味的必歸天然淘汰，用不着我們過慮。

抱有前進意識之大衆要領導意識落後之大衆把自己的生活提高起來：把程度提高，把需要，把意識提高。這樣，大衆語便能繼續不斷的提高大衆文也就跟着牠繼續不斷的提高了。

（申報「自由談」七月四日）

從中學生寫作談到大衆語

尤墨君

近幾年，常在各中學擔任國文教科；去年同今年又曾評閱過浙江全省中學畢業會考國文試卷；我覺得我們當國文教師的對於中學生的寫作，實在再不能忽視了。說起中學生寫作，自然不外文言同白話二種。但無論其是文言或白話，大多數已變成非驢非馬的樣子，離開大衆很遠了。

有位同學寫給我一封信，現在把這信第一段的原文錄在下面，請大家看看這是不是大衆所需要的白話。

「我不知應該如何說好，所有我的那些爲着你的善意的關念而發的感激與依戀將是遠超過一半我所能用筆表達的，但是有一點我可以罰誓遵著我的靈感和一切；我將永不會忘了你，你曾經不斷地對我作最仁慈最動人的精神上的恩錫，而且你又是那樣一個可崇敬的老師呀！」

從前白香山作詩，據說「老嫗能解。」如果這話是確實的，那末他的詩便合乎大衆語了。像上述的一段信，論其文字，不能不說它是通順而流利，然而嚴格說起來，這是寫字檯邊寫寫的白話，沙發上讀讀的白話，離開大衆眞不知有多少遠！所以換句話說，這是弄弄筆頭的白話或高跟皮鞋式的白話。

還有一種白話文裏面嵌進了無數時式名詞，像什麼「進展」「展望」「探討」「下意識」「一切的一切」等，結果因不善運用，故語句變成費解而不通。這可以把今年浙江中學畢業會考國文試卷中的一段文字作個例，題目是「我所最敬佩的友朋。」

「古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斯可見古人之於交友也有如

此深的探討，也許對於擇友這件事是極値重視的。故然，現在是什麼時代，不應該以十八世紀的套語來阻止這科學昌明的新宇宙間進展而催謝了許多意志不決的中層階級。可是我們細憶一處，就覺得古人的話，似乎不一定是絕對性的，也許有許多的見鑑是在我們之上，是適合於近時化，並不觸落社會進化的和諧，而不愧為世界偉人的孫總理，也能打破世人的一切昏迷，注一而不三折的心理。他是承認的，因此他特以恢復古有道德古有智識來醒覺人們。這都是先知先覺者可能而一般皆以『陳舊老廢物』老是將棄諸耳後。」

右列一段文字是一位初中畢業學生寫的，標點符號別字悉仍其舊。文中堆砌了許多時式名詞，像「探討，」「十八世紀，」「新宇宙，」「進展，」「中層階級，」「絕對性，」「近時化，」「社會進化」等等，弄得全段文字像天書一樣的難解難讀，而寫作亦失其效用。這種白話，可以說是囫圇吞棗式的白話，也可以說是食新不化的白話。食古不化，固不能接近大衆；那末食新不化，又怎能接近呢！

再談談中學生的文言文。據我所知，現在還有人把「弔古戰場文」「阿房宮賦」等一類妙文當做法寶，在中學生面前變把戲。結果中學生的寫作好一些的讀起來只覺叮叮噹噹，儼然「稀世元音」；壞的則如在叮叮噹噹之中，時聞幾聲亂鑼，怪難聽的。我可再舉一段文字如下：題目是「我所最敬佩的朋友。」

「自來英雄豪傑之士，痛祖國之沈淪，而卒能奠定金甌，致不世之名者，非特有血氣之青年而誰？方其噴薄千丈，血誅激發之時，則雖刀鋸鼎鑊出之前，而其色不變；魍魎奇桴乘之後，而其心不恐。若項王之破釜沈舟，百戰百勝；豫讓之漆身吞炭，國士可風，前往奮發而莫之夭閼者，此誠國家之棟樑，中流之砥柱，亦即我所最敬佩之朋友也。」

細讀上述一段文字，雖其中有幾聲亂鑼，像「噴薄千丈，血誅激發」及「夭閼」等（也許我不知其中妙音，）然讀起來，通體還是叮叮噹噹的。不過，我終不解，這於日常生活有什麼用！獵取功名吧，翰林，狀元，已只能在破廟門裏高掛的匾額上看得到了。

數千年來載道的文言的流弊如此，十幾年提倡的白話的結果又如此，所以我們要想挽救「文運」，應趕快喚醒中學生快出「藝術之宮」「翰墨之林」而和大衆接近，這非提倡大衆語不可。不過這事體大，還得全國的中學國文教師起來共同努力才行。

（申報「自由談」七月五日）

再提出點意見

——關於土話方言問題——

佛朗

一

看過耳耶和司馬疵兩先生的文章，關於「土話方言」的問題，我還想多說幾句話，不過僅是一點零碎的意見而已，至於詳細的討論，俟將來展開怎樣建設大衆語這個問題時，再來充份地申說。

二

所謂土話方言，我們應當包括各省各縣有別的言語而言。不要張着眼顧到一兩句「阿拉」或「丟那媽」之類的已經成爲普遍語的例來說。現在各省的土話，可以分成「都市的土話」和「農村的土話」兩種，我們一般所謂的土話大概係指各省的都市土話而言，其實各省之中各縣鄉間的土話仍舊是諸多不同的，即就廣東一省而論，瓊崖，潮汕，他們的土話簡直和廣州市裏人們所說的話完全不同。現在被稱爲「廣東話」的，實際祇是「廣州話」。嚴格地說來，廣州話是都市的土話，還有其他九十多縣各別的農村土話存在着；單就廣東一省而論，方言土話已如此繁多（廣州人不能聽懂瓊崖潮汕人所說的話；瓊崖人不能聽懂潮汕人所說的話！）其他福建各省也是一樣。這樣，中國的土語方言委實過於龐雜了。這樣僅就一隅流行的龐雜的方言，假如各處都提倡將它演成文字，——範圍極窄地方主義的「土話文」，我以爲對於吸收「外來」文化傳達和

溝通智識上是未免有窒礙的。并且土話我始終認爲是保守的，含有封建意味的，它保持那地方固有的舊的辭詞。新的內容很難在這種舊的「話框子」裏適當地表現，我們是要把新的內容去發展到舊形式，工具的破壞，現在却反而要保存固有的「話框子，」對於新興術語的提示，將會受到阻礙，而於文化落後的窮村僻壞，更加不適宜。例如「帝國主義」一詞，廣州土話沒有適當的名詞代表，衹叫做番鬼佬。（番禺，南海等附近市邊的鄉下人均如此稱呼。）上海人衹叫做外國赤佬，但其含義的不能適合是顯然的。在窮鄉僻壞，「帝國主義」這新名詞也許不懂，但這種新術語非得懂不可，非得介紹進去不可。用固有的土話，是很難達出原義的。

三

中國言文不能統一，語言分別甚繁，似不能如耳耶先生所舉的蘇聯提倡各民族底話來作例。大抵各省的「話，」有許多都是衹有話，而沒有「文」的。若果要用土話文，非

創造出許多新字不可，非各省先要編好各省新字典，甚至各縣各鄉的新字典不可。因爲就已有的「字」去拼合各種土話的音是不夠的，我國向不是用拼音字而是用方塊字——六書體。這種方塊字的音，各省各處唸起來也是不同的。卽如司馬璇先生所舉的「寒棚冷放晒」一語，其實和廣州音就差得很遠，祇要是道地的廣州人，一定知道這幾個字與原音不甚相符。各省的土話有許多就不能用已有的字音把它（土話）的音傳達出來。我們除非用英文拼音，或注音字母，或羅馬字拼音才能準確。否則（一）已有的字彙的音不能全包括土語那種「黎佶」的聲調；（二）各省各縣用土音來唸原有的字，每字的音調不能統一。（如、北平人把寒棚冷放晒唸起來，固然與原語相差很遠，但廣州唸起來也覺得并不相合——大概是用話語寫音給外省人看的廣州土話。現在司馬璇先生說他以一個外省人而覺得很容易懂，我眞有點不相信。假如沒有先廢除方塊字，有了統一的拼音法以後，用一大串「寒棚冷放晒」這一類不三不四勉強凑音的字去演成土話文章，還說是「很容易懂」，那是說不過去的。）

四

大衆語在現在雖不能認爲是一種「眉目皆有四肢齊全」的固定的東西，而說它存在或不存在。但大衆語現在正從大衆的新生活中開展起來；乃是毫無可疑的事。因爲自古迄今逐漸發展下來的言語的長成，乃是跟着社會的改革變遷而形成的。歷史既不是偶然的發生變動，言語文字的隨着社會改革變遷，自然也不是「突然」或者「偶然」現在勞苦大衆的生活已經開展到一個新階段；有着這一種新的基礎，那末展開他們自己的文化將是隨着他們的新生活而展開新的範圍的。所以大衆語已經生長在他們的生活中，這種大衆語的進展，并不是祇在廣州的「丟那媽」，上海的「戳你娘」，北平的「媽的屄」一這些土話問題上面，是有着一種從新生活中開放出來的活潑充實的辭句。各處的土話，大概最流行在大衆中的祇是一些「罵人語」，如上海的「豬玀」，四川的「狗子」，這些在大衆語中并不重要。所以要促進大衆語文，提倡土話是一個小的問題；

而是要在大衆生活中去認識和學習現在的智識；不能寫出恰如大衆所需的大衆文（有些祇毫不費力的多寫了一些「奶奶雄」「媽媽的」便以爲肯妙！）是和大衆的實生活隔遠之故。

五

五四時代的國語統一運動我以爲和當時的白話文學運動一樣，是不能一概抹煞其價值的，白話文學運動和注音字母運動，在文化運動的意義上是統一全國語文，打破封建勢力的先鋒，我們要打破這種封建的留存，是要統一起各地的言語消除這種各自爲政的「同鄉」觀念。所以統一語文還是現在一個當前的亟待完成的工作，建設大衆語，應該從這方面去促進，不宜於退一步再走回「提倡土語方言」的路上來。不過「大衆語文」和「土語方言文字」也不是對立的東西，猶之「大衆語文」不是和「白話文」對立起來一樣。我也承認有許多土話是已經逐漸成爲大衆語，（大衆的普遍語自

然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但已成爲大衆語的土話，已經就是大衆語，不是「土話方言」了，其他各鄉各處的土話，實無「提倡」之必要。語文的發展，是跟着社會生活的變遷進展的，我更懷疑「提倡」這兩個字，把土語方言演成文字，就可以成爲大衆語文了嗎？問題顯然不是這樣簡單。

六

文化的進展，是向更高的階段踏上去的，我們不是把文化的水準降低到大衆去，而是要在大衆中把大衆的水準提高起來。各鄉各處的土話方言，大半是含有地方觀念和封建意味的，大衆正要用新的生活去洗鍊這種落後的辭意，大衆正要將新的術語成爲和自己生活有關的意義自由使用起來，大衆語，不是白話文的一個相反的東西，而正是白話文的一個更進一步的階段。大衆文不是「上海花」一類的小說，不是「啼笑姻緣」那一類所謂「大衆化」的文辭。

（中華日報「動向」七月八至九日）

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

王鋼

二十六日在申報本埠增刊「談言」裏讀到垢佛先生的「文言和白話論戰宣言」以後，今天二十八日又在「談言」裏讀到家爲先生的「歷史將會重現的嗎？」這兩篇文章所表現的立場雖是不同，然而我總疑心家爲先生有替垢佛先生做了應聲蟲的嫌疑，如果這疑心更進一步，從家爲先生這篇文章仔細看來，很可以疑心到家爲先生在塗着前進似的彩色在那兒幹着和垢佛先生同一樣的勾當。如果這懷疑都是錯的，家爲先生確是前進的反復古運動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家爲先生這種乾乾脆脆的主張，不免

於劝釋，在客觀上不免於替封建妖孽做了幫手的任務。這種有害的理論，我們不能不提出嚴厲的批判。

垢佛先生那篇文章不是明明在文學上掉鎗花企圖從反復古運動的反「文言文」的戰鬬中挑撥出另一個「白話文」與「大衆語」的戰局麼？他把「白話文」劃成「中間的」「或者」叫「文言文」贊成牠，「或者」叫「大衆語」反對牠；使「文言文」對「白話文」讓步，互相妥協，聯合着來攻擊「大衆語」；要不然就是叫「大衆語」向「白話文」進攻，使「白話文」趕快向「文言文」投降，反過來來攻擊「大衆語」，這種陰謀不是很巧妙而又很明顯的麼？凡是每個眞正反復古運動的進步作者，不應該機械地在幾個排列着的名詞之前發昏，幹着文章遊戲；而應該實際地看見國亡家破的嚴重，看見每個凡是不願當亡國奴的對於亡國的封建妖孽的憤恨，同時對於復古運動裏的復興「文言文」所起的憤恨和反抗。從表面看，問題雖着趣在反對「文言文」，然而這根源是起於反亡國的封建妖孽，因爲反復古運動反「文言文」的問題深入了，必然

地會感到五四式的「白話文」在「運用上」已經不夠，須得更進一步的建設「大衆語」才能完成這個使命。「白話文」和「大衆語」是不能像申報「讀書問答」的「再談建設大衆語文學」那麼機械地對立的。如果不從實際的反復古運動這個問題出發，而只是在那兒咬文嚼字，只是在「白話文」「大衆語」幾個字面上去變花樣，從表面說是文章遊戲，從骨子裏說是在替復古運動製造機會。

家爲先生這篇文章恰巧就是這樣。不管他怎樣說得漂亮，「時代是不斷的向前進，而社會意識也就得不息地在變動，演進」呀，「要社會得前進，變善，就必需要來對這種勢力作強有力的暴露與攻擊」呀，於是他就提出「我們須得來建設與提倡『大衆語』向死了的『文言文』作戰，同時，也得向『洋八股』的『白話文』進攻」呀了！

垢佛先生剛在那裏弄着圈套贓道：「來呀，來呀。」家爲先生就馬上應聲「來了，來了，」一唱一和，眞是前後呼應的兩篇巧妙文章！這兩篇文章是很容易使人疑心是一個人做的。

我認爲在這裏應該特別提出，在這個反復古運動反「文言文」的戰鬥中，決沒有反對「白話文」的理由，（大家不但要建設「大衆語」而且也要「白話文」）而是反對那些利用「白話文」「大衆語」去散佈毒素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妖孽。

（中華日報「動向」七月一日）

內容與形式

司馬[illegible]

文言文——白話文——大衆語——方言土話——羅馬字

這次關於從反對復古運動而引起的反對「文言文」的論戰，大家都承認這是和五四時代完全不同的。五四時代的封建方面，對於「文言文」是頑固的保守；而反對者方面則是一種破壞舊的建設新的——白話文。現在這一個階段所不同的，「文言文」不過是早已經被制死了的殭尸，亡國的封建為要掙扎牠最後崩潰的命運，又想把牠復

活起來去麻醉大衆，很顯然地是有着牠的背景和作用；而反對者方面則大多認為那東西並不值得一駁，主要應該反對的是它的作用——卻是反對那種復古運動，要真正能夠澈底完成這種任務，大家所認清的就是現在不是五四時代的性質，唯一的方法只有建設「大衆語」，並且還要糾正五四式的「白話文」之不夠的地方。

關於這個為了守護「白話文」反對復古運動反對「文言文」同時提出建設「大衆語」的這個問題，還有一個和五四時代所不同的特點，就是大家所注意到的已經不是單純的形式方面「文言文」和「白話文」「大衆語」的戰鬥，而是已經看清了光明的將來，看見了主要的前進的大衆，實際地注意到戰鬥的內容。這為大衆所迫切要求的問題，已經有着廣大開展的趨勢。這種趨勢，就是共同站在反對亡國的復古運動出發，從「白話文」發展到「大衆語」——「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胡愈之。）這就是牠的真實的內容。

不過在這個論爭中，對於「大衆語」應該要怎樣的建設，還沒有確定地得着豐富

的答案的時候，所以有些問題不免發生一種不完全切合實際的缺點，比如申報的「讀書問答」輕率地把「白話文」和「大衆語」對立起來，胡愈之先生和傅東華先生認爲「大衆語」在「目前要話文合一是辦不到的」，而傅東華先生則更認爲「只好把大衆的範圍縮小起來。」至於魏猛克先生和佛朗先生甚至對「方言土話」懷疑起來了。這問題的嚴重，是迫待討論的，現在我就想大膽地來簡單的嘗試一下。

1、爲甚麼我們要反對「文言文」？主要的就是因爲牠是封建的產物，是束縛而且麻痺大衆思想的東西。牠的形式，始終爲封建的內容所決定，成爲封建特有的東西。牠是爲大衆所不懂，尤其是現代的大衆所不懂的。這在五四時代早已經被痛快淋漓的批判過而且死了好久了。在現在這樣亡國殺身的大禍臨頭的時候，牠要復古要復活「文言文，」要麻痺大衆救國的情緒，所以我們只有徹底的攻擊，揭破牠的欺騙，掃除牠這毒物，這些工作，根本就是爲了大衆，爲了自己。如果有條件地用「文言文」這形式還可以爲一部份被壓迫的大衆所了解的話，想我說句要不得的話，爲了喚醒這一部份人，也未嘗

不可以把牠利用一下。可是不行，大衆並不懂。難道我們把「倭寇將悉亡我國矣」或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些話去向着封建的老爺少爺們「對牛彈琴」麼？何況這些句子麼根兒就飽含着十足的封建性。所以我們不但要反對牠這亡國的復古的內容，同時也要澈底地反對這種麻痺大衆的形式——「文言文」。

2、至於「白話文」應該要怎樣的批判和糾正的問題，是應該和當前大衆的要求的內容不能分開的。像申報「談言」上家爲先生那樣乾脆地提出反對，我們是要反對的，至於申報「讀書問答」上那麼機械地把「白話文」和「大衆語」對立。雖然牠後來又修正過說是「對立的統一」，我們還是要提出批判。在「不要上當」那一篇文章裏我已經舉出了些關於「白話文」的實際例子，爲甚麼封建都可以利用，我們自己却要拋棄或者對立？這不是向敵人繳械麼，何況現在五四時代提出的內容是民主主義和科學，「白話文」的發展就是在這樣的零碎中造成出來的。雖然當時並沒有完成牠的任務就妥協了，但是「白話文」本身多少還有點是現代的。雖然牠這種形式歐化氣太重，

而且還夾雜一些「文言」，以致脫離了大部份的大衆，可是還有一部份大衆，比如學生，小市民，還能懂，還在牠的影響下。並且牠這種形式還比較的精密，在文法上還比較科學的，並不如「讀書問答」上所說「大衆語愈漸成長，則豪紳買辦的白話愈顯出衰弱，愈暴露出它的反動性。」我們要知道牠的反動性是在牠的內容而不在牠的形式。何況「大衆語」是依據當前的大衆的要求，從「白話文」這個基礎發展出來的。所以「大衆語」決不能而且也不應該機械地和「白話文」對立。只在看我們用甚麽內容來用這種形式。還有甚麽比束着手等帝國主義的刺刀和皮鞭打到我們的身上更痛苦更切身而且更迫切的麽？只要可以把這種亡國殺身的大禍可以告訴大衆，可以喚醒大衆起來救國自救的，無論甚麽形式都可以用，所以「白話文」我們絕對不能攻擊或放棄，牠的難懂或不夠的地方，我們只有竭力批判地去糾正，應用。

3、說到「大衆語，」這是大家熱烈地提出而是大衆迫切地所要求的問題。從前在「文學月報」上朱陽先生和止敬先生曾經提起熱烈的討論。這次魏猛克先生又重新

把牠引出來作爲參攷，而且把這問題引到注意的中心點，我認爲是很對的。這問題還在討論，當然我們還不能肯定的說甚麼才是「大衆語」，甚麼不是「大衆語。」大衆既是當前主要的大衆，那麼宋陽先生和止敬先生所指出的範圍——現代的工廠，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舖，遊藝場等等，想來大家都會覺得這是可以作爲討論這問題的根據的。當然在中國這樣經濟的破產，文化的落後，地域的限制，使各地方各種生活不能順利的交通，大多數的地方還依然各保持各的「土話方言」。不過除廣東，福建，浙江這些地方有着極特殊的「土話方言」以外，凡是交通便利，工廠商業比較多的地方，在某種程度上，大衆的語言是正在銷磨自己的難懂處，接受別人的比較普通的字眼，大衆的語言，確是正在變化，形成，發展着的。這問題要達到具體實際，就只有靠我們自己在大衆中的實踐。像申報「談言」上垢佛先生動不動就叫人拿貨色來看，這都不過是恐駭人的話。記得好像從前是梁實秋先生吧，（恕我記不清楚了）好像對「大衆文學」也說過這樣的話，「拿貨色來看吧。」當時當然還沒有甚麼，現在可已經大量出現了，而且據說還

出了眞正工農作家，而梁先生（！）也不再響了。從大衆文學發展的鐵的事實證明，我們可以預測到「大衆語」這貨色，不久一定會眞正的出現。不但是「不久」而且已經正在出現。不過現在學習而且在實驗的期間，暫時的話文不能一致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我對於胡適之先生和傅東華先生的意見，稍稍有一點不同。自然在目前話文合一還沒有辦到，可是我們如果「要」去辦到也未嘗不可以辦到。五四時代那時所提出的「白話文」不是當時已經辦到了麼？我以爲問題不是在目前辦得到或辦不到，而是在看大衆眞正地去怎麼辦。當然胡先生和傅先生是知道將來一定會辦到，一定會實現的，可是這種用語上，我覺得會使人引起「等待」的心理，胡先生和傅先生以爲這話對麼？問題要提出，我們只有堅決地提出，實行起來才快而且有力。我相信這樣的做，決不致「把大衆的範圍縮小起來，」而且只有更加擴大，更加豐富。況且在目前救國自救的問題上，要告訴大衆，同時要知道大衆的意見，決不能因爲難而把範圍縮小，只有去擴大，只有趕快去到大衆中想辦法弄到「文言合一」的地步。

4、這裏就要談到「方言土話」的問題了。關於這一問題，從前宋陽先生也具體地提到過，從前並沒有甚麼人反對，而且已經有人實行，試驗到有相當的効果。我在「不要上當」裏所舉的一些實例，封建不是已經在大量地運用麼？現在魏猛克先生和佛朗先生提出懷疑的意見，我覺得有在這裏加重地提出討論的必要的。問題還是前面說到過的，爲了當前大衆的需要，我們決不能把牠看成「原始的，沒有進步性的」而把牠拋棄。主要的還是在我們所提出的內容的問題。自然「方言土話」在表現現代的某種意思的時候，難免會感着許多缺憾。可是亡國的大禍迫切，要大家起來救，難道等牠發展到「大衆語」的時候，才和他們講話麼？可是到那時候，帝國主義的刀子已經架在頸項上了，或者是如東四省一樣強迫着叫學日本話或者英國話，那時就會只能說得幾句「天皇聖明，」懂不得別的甚麼了！爲了目前救急的辦法，也只有在各地方用各地方的「方言土話。」我們不能因爲像張天翼先生用「奶奶雄」使一些地方的人不懂而怪「方言土話」的不行。況且「奶奶雄」也是表現大衆的意思和情緒的一個詞頭，用得得法不見

得就不懂，這又屬於表現的問題了。卽使別的地方人不懂，但是有「奶奶雄」這話的那地方的人一定懂。總之主要是爲那地方的人寫的。卽使那地方的人覺得「奶奶雄」並不完全表現出要表現的意思或者不妥當，又未嘗不可以用別一個「方言土話」的詞頭來代替。我以爲魏先生和佛朗先生是太看重一般「文化的」的問題了。文化應該是和前進的大衆的要求一致的。當前嚴重的形勢要求着文化應該和大衆聯繫在一起，不然的話，「文化」跑得太遠，大衆連飛跑都趕不上，那就會弄得他們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了。所以「方言土話」這形式在目前是特別需要的。記得去年廣州曾出過幾個完全廣州土話的刊物，有一個叫着「大家新聞，」還有兩三個的刊名現在記不起來了。並且還出過廣州土話的叢書。我看見過一本叫着「單眼虎出世」的。我不過僅僅懂得幾句並不完全的廣州話的。開頭看自然很喫力，可是多看幾下看慣了，有些地方就容易懂，因此我還被這本書增加了幾句廣州話。至於有幾個廣州朋友一看居然並不喫力地看下去，而且很有味。比如「寨棚冷放晒，」他們看得非常之懂，我也懂。自然我們是知識份子，

比較有點敏感，容易學會，可是據我所聽見的，這幾個刊物和叢書曾經受過不少大衆的歡迎。例子不再舉了。總之，我認爲「方言土話」是極應採用的。

5、最後說到「羅馬字」拼音的問題。五四時代錢玄同先生曾經提到過廢除中國這可惡的方塊字，用羅馬字來代替的主張。照我在「不要上當」舉的例，如果我的朋友說的話是千眞萬眞的話，那麼帝國主義早已經在運用了。從前也曾經有許多學者作家們提到過，而且在作品裏面運用起來。這方法現在我們就應該熱烈地來討論，而且勇敢地來試驗一下。許多人在從前早已經相信「羅馬字」拼音可以代替方塊字，就看我們這次的討論和試驗的結果怎樣。

限於篇幅，不再寫下去了。希望大家來討論，使問題達到更具體的地步。總之，我們這次討論到的這些問題，不單單是形式的問題，而是從反復古運動這一個大衆的內容出發而來的。我們不要只從形式上去看，在腦子中劃分成幾種屬性，把「文言文」認爲是封建的，把「大衆語」認爲是勞苦大衆的，是可以的，但要把「白話文」分爲完全是豪

辦買辦的，把「方言土話」分爲是原始的，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勞苦大衆有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化遺產的權利。一切形式都應該以勞苦大衆的內容來決定。我們要反對在這個問題（內容）面前猶豫，離開勞苦大衆，我們更要反對混亂陣營的胡亂攻擊。

（中華日報「動向」七月二日）

為「大衆語問題批評」

致司馬疵王剛及其他白話改良主義者們

覺璐

在烈日燻蒸的酷暑中，讀到了司馬疵王剛先生的「為大衆語問題批評答讀書問答暨覺璐先生」和「再論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兩篇大文，更使我的內心裏引起了火般的燃燒，因為這洋洋不斷的大文，陡然增加了我眼花和頭痛的煩燥而已。然而在運動的意義上，卻不能坐視司馬；王剛兩先生底錯誤理論的發展而不加以抨擊，否

則，對於大衆語建設的新途，將要被先生們引入幽闇的深谷。

㈠司馬，王剛先生一貫地「建設大衆語并不反對白話文」的理論根據，是出發於把建設大衆語看做單純地文字上的「反復古運動」這是先生們理論混亂的根源。先生們不能理解大衆語運動底社會的意義與價值，而祇是停留在「反復古運動」的目標下，反復地辯論罷了。先生們沒有能理解在這次大衆語的運動中，蘊藏着社會機構的變革及其意識形態的反映作用。在前我已經反復地說明過，這不是語言或文字上單純地變形，而是社會意識的變革，反射在語言和文字上底「文化革命」的行爲。所以大衆語運動決不是如司馬，王剛先生所主張的單純地「反復古運動」而是大衆爲了自己階級的解放，要求着代表自己意識的語言和文字的解放鬭爭。

㈡司馬，王剛先生把大衆語問題當做一種自然發生的運動，而輕視了牠的目的意識性，因此，司馬先生便引出了似是而非的「修正」白話文的意見，如果照司馬先生的意見把來列成公式的話：

文言文——白話文——修正白話文——即大衆語。

這樣，司馬先生把大衆語解釋做由白話文的「修正」而自然發生的語言文字了。

那麼，大衆語缺乏牠的階級性，大衆語缺乏牠的戰鬭性，大衆語缺乏牠的自意識性，而僅僅完成了「改良白話文」的任務。

㊂司馬先生以爲白話文雖然「脫離了大部分的大衆，可是還有一部分的大衆，比如學生，小市民還能懂，還在牠的影響下，」所以還要支持牠。但是，司馬先生卻遺忘了文言文也何嘗沒有牠一部分的羣衆呢？我們不能因爲牠們還有一部分的羣衆受牠們的影響而去支持牠們，而放棄了對文言文和白話文的階級意識的鬭爭。猶如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也不免殘留着部分的封建遺老和部分的資本主義的人羣；然而我們難道爲了憐惜他們而去支持他們，并且取消了反封建和反資本主義的鬭爭嗎？

㊃至於司馬先生以爲「白話文的反動性是在牠的內容而不在牠的形式，」「只在我們用什麽內容來用這種形式」，如果照司馬先生的意見，白話文裝上了新內容，就

滿足了大衆語的話，那麼把司馬先生的話羅輯起來：文言文裝上了新內容；不也同樣地滿足了進步的語言乃至大衆語的建設嗎？司馬先生只知道形式的利用，但沒有想到有着「反動性」內容的白話文，足以影響牠形式的「反動性」而向正在萌芽的大衆語以迎頭的痛擊。同樣我們也不能同意司馬，王剛先生解釋「揚棄」的字意「揚是發揚，棄是拋棄」的高見，因爲這樣一來更使人們的腦筋混亂了，人們將不能明瞭究竟是發揚白話文呢；還是拋棄白話文？還是「糾正」白話文？人們或許把司馬先生的高見當做形而上學的囈語了。

㈤司馬先生反對我們既主張大衆語，就不應當用白話文來寫文章，這眞是可笑的三歲小兒的意見。司馬先生！現在我們是爲着建立大衆語問題而爭，如果我們已經能用大衆語來寫文章的話，大衆語不已經建立起來，又何需嘮嘮不休地爭論呢？這裏我將不客氣地請問司馬先生：難道提倡婦女解放運動的人，非婦女自己不可嗎？這更證明，司馬先生理論的無知。

㈥現在，白話文的改良主義者們，把關於大衆語問題底實踐的理論弄得非常混亂了。司馬，王瀏先生自以爲「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的理論，對於大衆語運動有着不少的利益，恰恰相反，反釀成了大衆語發展中的障礙與毒害。如果白話文的改良主義者們，再這樣不斷地支持下去，會成爲大衆語建設的前途一個不小的罪惡，將永久地殘留在中國的文化史上。

（大晚報「火炬」七月十八日）

大衆語・土話・拉丁化

葉籟士

大衆語問題最初是作爲一個文學上的用語問題而提出的，這樣把問題局限於文學以內的結果，不單妨礙了這個討論的發展，而且有「一場無結果」的危險的。我們在討論建設大衆語文學時，不能無視大衆教育的問題，否則我們的討論永遠是與實踐分離的空論；祇是說「接近大衆，向大衆學取，理解大衆」是不夠的，必須使大衆來直接參加大衆語的集體創造，才能完成大衆語創造這一任務，只有在大衆教育之中，才能建立大衆語文學（吳午先生曾講到這點，是很對的。）

大衆語應該就是「現代中國普通話」這個見解是對的。但是這種普通話現在還只是種胚胎，它的具體的面貌尚未形成。中國最大多數文盲大衆，至今還用着各別的土話。所以我們當前的急務，就是首先要給與最大多數的各地文盲大衆一種簡明容易的各別的「土話文字」（以土話爲標準的書寫文字）「土話文字」的發展，不但決不阻礙大衆語（普通話）的形成，而是提高了各地大衆的文化水準，給與他們直接參加創造大衆語的可能，促進了統一全國的大衆語的完成：所以「土話文字」是消滅文盲的利器，非但和大衆語並行不悖，而且是大衆語創造中必要的步驟。（請參看七月二日耳耶先生的「開快車時候的備忘錄」一文中的第九節。）

白話文游離大衆的原因，是在於五四發動者這一社會層本身的無力，正和他們在政治上的成就一樣，白話文在中國語言的民權革命上，也未能徹底完成它的使命。白話文在形式上繼承了封建文言文的象形方塊字，這是對封建文言文的一大妥協；一方面種下了今日「復興文言」的根源，使文言文可以喬裝了混進白話文中去，（如語錄體

之類）一方面使白話文對於大衆依然是種煩難的文字。白話文語彙的貧弱，以及話文的不能一致（夏丏尊先生）也因爲象形的漢字阻止了它的發展。（今日我們口頭語中有着無數的擬聲字，但能有多少可以用漢字來表現的呢？）所以我們要創造「土話文字」和大衆語，就應該堅決地打倒象形漢字，採用拼音文字。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大衆聽得懂，說得出，看得明白，寫得來」的地步。

關於中國語言的拼音化，過去已經有了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注音符號」（原名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它們的最大的缺點，就是都以北平話強迫作爲標準，而要學像這種「京腔」，卽在知識份子也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只要看自政府發表以來直到現在，可曾得到幾分效力？注音符號因爲不能忘情於方塊字，結果成了非驢非馬的怪物而且不便書寫。至於國語羅馬字，因爲要嚴格區別四聲，拼法就變得非常煩雜難學據說知識份子也須二三年才能學會，所以對於文盲大衆不用說是根本要不得的。在簡單易學上，在蘇聯華僑創製的「拉丁化中文」（創案者是旅俄華僑文化突擊隊領導下的

「遼東邊疆拉丁化委員會」)就要強得多。「拉丁化」不但廢去四聲，而且聲母(子音)單獨也能發音，像漢字中「文字」兩字，國語羅馬字要拼作Wentzyh，而拉丁只作Wenz。又如「世界」兩字，前者作Shyhjieh，後者作Shgie，自要簡易得多。蘇聯的華僑以山東人佔多數，所以「拉丁化」是以山東，河北，東北一帶北方土話作標準的。它的目的在於給該處大衆以一種筆頭語，並不是用來強迫全國用作普通話的。根據拉丁化委員會的意見，中國可分全國爲五——七個方言區，而把各區方言都拉丁化，以消滅各地的文盲。因此「拉丁化」是非常值得我們的研究和參考的，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它不是學者書桌上的方案，而是在伯力海參威一帶華僑中的一個極廣泛的文盲大衆掃除運動了。

我上面提出的「土話文字」，預料一定會遇到許多反對和非難的。一定有人說：提倡拼音的「土話文字」會使中國分裂，「分散各地居民的文物的聯繫」，反不及文言文白話文的能統一全國。我的答覆是：漢字(不論文言文或白話文)所聯繫的是「執

武器」和「搖鵝毛扇」的人，而不是大衆！漢字始終與大衆無關的！而且我在上文已說過，全國統一的大衆語和「土話文字」是平行不悖的，只有提倡「土話文字」才能促進大衆語的成長。企圖用某地土話（不論其爲北平話或是南京話）作爲標準來統一全國，終歸是徒勞的。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的失敗已告訴了我們。

國語羅馬字，我曾看過一點，但是至今尚未學會。關於拉丁化的書，我見過三種，其中一本是字典，一本可以算是文法（排字的方法和檢字）都是蘇聯世界語同志寄來的，也只隨便看了一下，最近又看到一本Sin wenz（「新文字」）是拉丁化中文的課本，其中一個漢字也沒有的，但我已全部讀完了。我覺得「拉丁化」也許尚有若干小缺點，然而它既成爲一種大衆運動，一定能在實踐中得到解決的。

我贊同耳耶司馬疵等先生對於「方言土話」的意見，因此在匆忙中寫了這篇文章，一方面更介紹了一點「拉丁化」。至於「拉丁化」的詳細內容，這里無法多談，只好以後再寫了。關於討論「拉丁化」的文字，目下買得到的，恐怕只有中外書店「每日文

選」第十二號「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自世界語中譯出的）一文，雖然那篇文章似乎不無獨斷之處，但為理解「拉丁化」的理論起見應該拿來一讀的。

（中華日報「動向」七月十日）

蘇聯各民族文字的拉丁化與漢字書法拉丁化

Usojev 原作
岡林譯自世界語

沙皇俄國，在戰前的世界中，是一個最落後的國家。也無論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都是落後的。已開化的全體住民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夠寫讀。而這個國度裏的更沒有敎化的部分便是住着帝國的殖民地土耳其斯坦，外高加索等地方。專制的沙皇帝國，對於這些地方，是殘酷的榨取着，他腦子裏所思索的，不是他們的進步，只是如何掠奪他們；掠奪一個沒有敎化的民族，比掠奪有文化的民族，是比較容易的。因此俄國帝國

主義，甚至妨害「INOKODCI」（革命以前，對非俄羅斯人的稱呼）創造自己的文化，例如沙皇帝國的最忠實的僕人，牧師VOSTORGOR在一九〇七年舉行的「眞正俄羅斯人」大會上，（帝俄時代最反動的組織）曾這樣說過「住在高加索的許多民族中，最好的便是土耳其系民族。他是最忠實於沙皇帝國的。因爲他不進步，他沒有自己固有的報紙，也沒有識者階級。」故在這樣的許多民族中，讀書知識是比較俄羅斯人更低的。八％便是他們中最高的比率，許多且只有二——四％。而土耳其曼人甚至只〇・七％。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給蘇聯的整個勞苦民衆在文化上開拓了一條大道。僅是蘇俄有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人民能夠寫讀，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這種比率還要高。（九七——九八％）

讀書的知識，在從前所謂 Inorodci 中是正在生長着。例如在一九三一年，土耳其曼已經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知道讀書的人民，更早一點，土耳其曼不會有過甚麼出版物，但一九三一年，出版的教科書有七五〇・〇〇〇册，報紙有一六種，雜誌七種，以及其他出

版物。爲着文化的需要，在一九三一年，對於每一住民支出了三十六盧布。在革命以前這種支出僅僅〇・五盧布。一般義務學校加入全聯盟之後，不待言讀書知識在文化落後的民族中，便馬上要增高起來。

爲着要達到所述的成功，便不能不做非常困難的工作——改造甚至創造許多民族的文字的書法。因爲多數的新的書法，在他自已的基礎上是拉丁化的。這種工作便得到了「拉丁化」這名稱。

拉丁化是需要的。因爲蘇聯治下若是一些沒有教化的人民，蘇聯不獨不能進步，也甚至不能存在。蘇聯的許多民族——例如蘭塞，哥爾德，緯克爾，在革命以前甚至沒有自已的字母。他們只有知道讀書以後，他們才能變成文化的人。而只有他們纔接受了拉丁化字母。拉丁字母之所以被人選用者，因爲牠是最國際化的字母；牠對於拼音的書法，是便利的；並且這種拼音的書法，是最容易學習的，因此牠對於廣大的勞動社會層，是最能接受的。

其他民族，雖然有字母，但是非常煩難的。當當對於現實的言語沒有用處，爲着要學成那種字母，學習者便得費極長的時間，例如在回回教中，尤其在俄國的土耳其民族中普及了的阿剌伯字母，與他們的言語的聲音，就全然不一致。並且人們還得在這種字母的上面或下面，加上許多的線條符號。此外一個文字（Litero）的寫法在單字（Vorto）的開首，中間，和結尾更有種種不同的樣式。總之，代替着三十三個字母（新的拉丁化的土耳其字母的數目）人們便得學習一百個字母。（[illegible]的）拼綴字法又是那末困難，要學習十年至十五年之後纔能變成一個能讀能寫的人。如我所說過，這種情形，對於沙皇政治以及對於這些民族中底反革命的榨取者的成分，是有益處的。奴役一些文盲的勞動民衆，是比較奴役已受教化的人們來得特別容易的。那末這種拉丁化之遭受了反動者和反革命者底猛烈的反對，是必然的事。例如在亞塞爾拜然，許多反革命的有產的村民，在奧索里蘭的教派的人底領導之下，把幾十個採用拉丁字母到自己學校裏來的鄉村教師都燒死了。然而不管有這樣猛烈的反抗事實，但這一拉丁化運動，因係特別組

織的委員會NTA（Nova türka alfabeto 新土耳其字母）所領導，結局還是獲得了勝利，因爲拉丁化對於這些某時期被奴役着的民族的勞動大衆底需要，是一致的。首先在雅克托於一九二一年拉丁化字母由政府公布了。在一九二四年，同樣的情形，也發生於亞塞爾拜然。一九二六年在巴枯地方舉行了第一次全聯盟的土耳其學大會。這裏的拉丁化的擁護者，也終於獲得勝利。現在蘇聯境內每個土耳其系民族（一八個）都接受了拉丁化的字母。賴牠本身的簡易，牠是很快地在這些民族底勤勞大衆中普及起來，而文盲逐漸消失，文化也隨着生長了。

列寧對一個 NTA 的發起者Agamali Gli說過一句極正確的話：——拉丁字母是你用以在土耳其民族中開始文化革命的第一步。

除土耳其系以外，還有許多非土耳其民族，也接受了拉丁字母。在一九三一年，蘇聯境內已有五十九個民族都把自己的書法拉丁化了。此等民族中之一，便是住在蘇聯的中國人——約十萬人——。實在，要有百千單字，纔能應用的「文言」和至少要有一千

單字纔能應用的「白話」，都不能滿足在蘇聯的中國人。因為他們希望活躍地參加這個國家的社會生活。為了這，變成一個能夠讀書的人是必要的。漢字書法的繁難，在蘇聯華僑中，便惹起了這樣的事實：許多中國人，只好學習俄文來清算自己的文盲，而對於本國文字，却是一個文盲的人。

這種變態的情形，並不是「注音字母」的採用而能解決的。第一，因為注音字母到現在止，儘管在一九三〇年有過普及大會的決定，但在中國本土，沒有演着主要的或重大的角色。第二，牠比較拉丁字母，並不是更簡單的。因此有人決定創造一種易於學習和應用的新的中國拉丁化字母。對於這一決定的許多反對論者主張說：中國文字是單綴音的，所以有極多同音異義的字，那末拼音書法，恐將使原文變成不能了解。除此以外，他們又證明拉丁化字母不能描出中國言語的語調來。但拉丁化運動的擁護者，對於反對者底這種主要的論證，用下面這樣的理由反駁了：一，單綴音的僅只是書寫的中國言語。口說的中國言語是多綴音的。二，除了在現在的中國文字中的幾個容易能區別的單字

以外，人們是不需要語調的。——這種語調在其他言語中大部分不過擔任着重音的任務。

由二十八個文字成來的字母——（有五個字母用兩個文字組成）在拉丁化專門委員會的兩年以上的研究之後，纔得完成。一九三一年九月，在留俄華僑底政治文化最大的中心地的海參威——這裏的華僑佔留俄華僑總數的一五％——舉行第一次中國文字拉丁化大會。參加這個大會的有遠東與東亞細亞一帶的華僑及新字母聯盟中央委員會特派委員。中國勞働大衆對於拉丁化問題和文化建設的興趣，是那樣的濃厚；使一間在海參威的中國戲院——在這裏擧行會議，並報告住在蘇聯境內的中國人的文化革命的問題——好容易纔能容納了那許多的出席者。（二千人以上）大會說明了並一致接受了中國拉丁化字母及寫字拼音的規則等，而關於在一九三二年中用新拉丁化字母來澈底消滅遠東一帶中國勞動者的文盲的決定也接受了。這種決定，不是一個死的東西，可以由蘇聯中央報紙伊士威斯吉亞報（三三年八月十廿海參威通

信）上的一電報證明出來：

「在海參威，中國勞動者用新拉丁化字母寫讀的建設，是廣大地展開了。新字母市委員會，頒布了肅清文字的三十個要點。現已有一千五百人被教育了。在三個月內，依這要點，來教育中國工人寫讀。但爲着要學習中國舊日的，卽被限制過數量的方塊字，他們却要消耗好幾年工夫。

在海參威爲了已完短期講習班課程的人們開設了許多學校，新字母地方委員會已出版「拉丁化字母入門」，「拉丁化中俄字典」及其他許多材料。新字母已宣布了在蘇聯境內中國人的文化進步的偉大的前程」

（中華日報「動向」八月二日）

一個拉丁化論者對於漢字拜物主義者的駁斥

葉籟士

一

自從這次論戰中提出了書法拉丁化以後，已有好幾位論客吐露了懷疑甚至公然反對的意見。郁郁文先生認為「把土話用羅馬字拼音」並不「全是對的」（見「論大衆語」，丁乙先生把「創造音符文字」斥為「確有取消這運動的危險」（七月二

二月申報業餘週刊「建設大衆語的實際任務」）丹楓先生更死抱住漢字不放，捧爲「和大衆生活習慣相融洽而且成爲爭鬭之武器的漢字」（八月四日申報電影專刊「再論方言土語電影」）

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國土內，拉丁化了的語文爲數已在六十種以上。中國語書法拉丁化運動，在「拉丁化是東方偉大的革命」的口號之下，正用了巨人的步伐在展開。據本年三月出版的報紙所載，這種新文字「只要二百八十點鐘到四百點鐘就可學會看書寫信。」最近莫斯科已出版完全用拉丁化印刷的旬報，而中國却有不少迷戀骸骨，把漢字看作萬世不變的文人，可見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但是任何拼音化拉丁化的反對者，是無法否認眼前鐵一般的事實的。我們爲開展書法拉丁化運動起見，首先要掃除這些漢字拜物主義者的謬論，並且要明白地指出：「確有取消這運動的危險」的究竟是誰？

大衆語的建立，如果不和拉丁化問題聯繫着提出，是永遠得不到結果的。譬如八月三日「自由談」上伍實先生的那篇「大衆語與大衆意識」，在具體指出陳教授的「特

殊者華的意識一一點上原是篇好文章。但是伍先生結尾說：「故除開意識上的差別，大衆語跟白話本來沒有分別。」這樣，是把大衆語規定爲「代表大衆意識的白話文」，是非常不妥的。就舉伍先生的這篇文章爲例吧，在意識上我認爲確是大衆的，但是這就是大衆語了嗎？我想伍先生自己就未必承認。這樣說，拉丁化論者絲毫沒有取消大衆語的內容，而把漢字譯成拉丁化就算大衆語的意思，拉丁化論者要强調漢字的變革，因爲它是數千年來把大衆和文化隔離的萬里長城，只有堅決地廢棄漢字，大衆語的建立才成爲可能。這正是中國現階段語文革命的特徵。

現在的論客中也有人把大衆語運動歪曲爲方塊字的識字運動，要大衆一方塊一方塊地去念漢字：「你們不要吵，不要鬧，你們要討論大衆語，趕快地去學字。」（七月一七日「動向」高而先生的「大衆討論大衆語的紀錄」）「第一，先要普及教育，先使大衆們識得斗方字數百個，或千個，方有入手辦法。」（八月四日申報本埠增刊「談言」阿龍先生的文章。）這是大衆語的自殺，而不是解決？在客觀上是「確有取消這運動的

危險的。」

二

郁文先生在「論大衆語」第一節中引用了高荒先生的「大衆語多元說，」而且認爲這種估計「是很正確的。」然而對於拼音化一點上，郁文先生屢次表示他的懷疑，據說拼音文字（郁先生只指出了世界語和羅馬字，前者其實尙未有人這樣提出過）中國當前的大衆「會不會接受，這便成問題。如果在他本身生活上並不需要，勉強要用世界語羅馬字拼音，便須教小學生一樣從頭去教，即使有人這樣耐煩去教，他是不是去聽，聽了，又是否馬上用起來，這些都很值得研究的。」郁先生並未斷定拼音之萬不可用，只是很婉轉地表示了極度的懷疑。現在，我就來和郁先生「研究」一下。

一方面肯定了「大衆語多元說，」一方面對於方言土話却只主張「採用」（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各區大衆日常使用的口語的基礎上各別地建立起來的拼音文字，所

以決不是「採用」的問題，但拉丁化亦不是拉來任何土話無批判地譯一下就了事。拉丁化亦吸收土話中所無的新詞，拉丁化論者對於方言的處理非本文的範圍，但好像已引起不少人的曲解與反對，只好容後再作專文）在這里郁先生的理論已陷入混亂。第二，郁先生懷疑拼音化，從此郁先生的前面已是黑漆漆的一團，無法解決的了。我們要知道，方言土話是無法納入我們四方的漢字里頭的。北方人說 Zem 漢字只能寫做「怎麼」這麼兩方塊，而這已是頂大的成功了。郁先生如果把「像煞有介事」這五塊字去念給蘇州的大衆聽，他們說不定要笑落牙齒。白話文語彙的貧乏及其與大衆口語的隔離的重大原因之一，未嘗不是方塊漢字阻礙了它的發展——吸取各地大衆使用的口語之故。凡執筆寫過方塊字文章的人，都能有這樣的體驗：他一定要把他的土話經過頭腦的翻譯，才能寫成白話文（文言文更不必說）企圖用方塊漢字來容納方言土話，有如用篩汲水，永遠是落空的！這是一。

其次，是接受不接受的問題。首先，我們要問：當前的中國大衆是否有文化的要求？如

果說沒有，那麽卽使郁先生認爲最有可能爲他們接受的大衆語，也只會遭他們的白眼，「不去聽」或是聽了也不用。而我們的論爭也全屬浪費，該被人駡爲：「根本錯誤。」（中報電影專刊米同先生。）但是事實上全然不這樣，大衆正在宣卷說書傳說歌謠連環畫中無需文字的媒介地來滿足他們的文化慾，並且同時吞下了爲權貴們所備下的毒藥。「文盲是站在一切的政治之外的，他首先要學習讀書。這以外，對於他任何政治都不存在的。這以外，他所有的只不過是風聞，雜談，傳說和偏見，政治是不存在的。」拉丁化運動的目標，正在用這新文字的利器，來掃除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當一個都市勞動者用拉丁化新文字來寫他的日記（生活體驗）的時候，當他的老婆從農村里用拉丁化寫情書給他丈夫的時候，這才是「大衆念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寫得來的「大衆語文學」的最初的萌芽。所以，只有實現拉丁化，大衆語文學的建立才成爲可能。對於文盲拉丁化工作者不但要「教小學生一樣從頭去教」（難道倒像教大學生一樣去教嗎！）而且要不怕「麻煩。」拉丁化運動的前途還有着許多困難（例如現在還有人懷疑及反對）

要克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的，我們要不怕「麻煩」來開始工作。郁先生說，那種拼音文字是否為大衆本身生活上所需要呢？我的答覆是對於知識份子因其偏見及傳統之故，也許並非其本身生活上所必需的，他們有了「明快的白話」已足。但是對於只有口語而無文字的文盲大衆，正是他們所必需的。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來一塊一塊地認字，他們需要的是他們口語的拉丁化！拉丁化中文在蘇聯的進展，也能證明這一事實。自然，郁先生對於拼音化的懷疑（即對於方塊漢字的支持）顯然在於對於漢字認識之不足，這一點在下文還要提及的。

三

丹楓先生在申報電影專刊中，提出了以「明快的白話」作為大衆語的意見，被舉為標準的「明快」的一句是「天不下雨，怎樣辦？」據丹楓先生的意見，大衆語是解放了的白話，亦即明快的白話。然而我認為這是白話文內部的改良問題，與所謂大衆語

是沒有直接關係的。「天不下雨，怎麼辦？」一句，我懂，丹楓先生也懂，但是文盲大衆決不能懂。要推行丹楓先生的大衆語——明快的白話文，又得來一個方塊字識字運動。就算這個運動成功，全國大衆全都認得這七塊字，也還是不行，在念字幕或寫信時還得各各在腦中與各地方言互譯，例如丹楓先生家鄉的大衆，就須譯成「易個天總不落雨，衙大家哂何是好？」要經過這番手續，才能理解或書寫。自然，這是後話，丹楓先生這之前首先還得來方塊字識字運動。但是要是我們把這句土話，用拉丁化來寫，雖然我不懂，丹楓先生家鄉的大衆是可以懂的，這不是已經夠了嗎？

丹楓先生說：「將來語言文化的發展，是否有這前途（按指「用拉丁化拼音，或者實用世界語」）我們還不敢預言，可是在現階段中，我們如將成爲和大衆生活習慣相融洽而且成爲爭鬬之武器的漢文廢除，那就是離開客觀現實的無理的武斷，假使我們相信自己不是脫離現實的空想家的話。」「至於廢除方塊字，廢除中國固有的文化，這無論如何是脫離民衆的非爭鬬的高調，」（均見八月四日申報電影專刊「再論方言

土語電影」）這是拉丁化提出以後的第一聲的公然反對，不料竟出諸前進的影評家丹楓先生，因此我們對於這種謬論有給以最嚴厲的最無情的駁斥的必要。

我們要指出丹楓先生的論調，是完全脫離大衆的丹楓先生所看見的「客觀現實」正是知識份子的主觀偏見，丹楓先生的理論，正是「脫離民衆的非爭鬬的高調！」

在目前的中國的語文革命戰線上，非常明顯地呈現了兩大陣營的對立：一方是把文字（即筆頭語）佔爲私有的少數權貴以及知識份子；另一方是只有口語並無文字（即筆頭語）的大衆。前者爲鞏固他的特權起見，就利用封建漢字來厲行愚民政策，一方面把殭死了的漢字捧爲「國粹」，另一方面也做點改良主義的欺騙——方塊漢字識字運動「平民千字課」之類。大衆要求獲得文字，但是無法像知識份子那樣「十年窗下」來一塊又一塊地攻鑽這難記難識難寫的方塊字，於是永遠只好被禁錮在「愚昧，黑暗，野蠻」的深淵里。這是使大衆永遠「站在政治之外」的最巧妙的毒計，而不幸丹楓先生的論調，在客觀上是和這些權貴及其幫閒者完全一致的。

權貴要獨占文字，所以要竭力延長漢字的生命；大衆要爭取文字，所以要用拉丁化而廢止漢字。權貴要的是文字的煩雜典雅；大衆要的是文字的簡易適用。

漢字革命只是兩大陣營的對立在語文問題上的反映而已。

四

反對拼音化的人老愛提出，中國漢字是象形字，是「中國固有的文化，」是「和大衆生活習慣相融洽」的，所以漢字是不可能而且不應該拼音化的。這全然是不理解語文進化的胡說，不值我們一駁的。在「說文」九千餘字中，象形字只有三九三個，佔二十三分之一。其後所增加的字中，形聲字佔最大多數。「康熙字典」中四萬多字，象形字只佔了百分之一。（自然這些所謂象形字，事實上已不再「象形」的了）可見在人們提倡拼音化之前，漢字也在自然發生地向拼音化方面進化。漢字中的同音假借，例如「伏羲，」就有「虙戲，」「伏戲，」「宓戲，」「宓羲，」「庖犧，」「包犧、」「炮犧」等等的

各種寫法，可見古人也只把這些字作爲音符，只要同音，自可通用。

中國漢字中「象形」和「拼音」的對立，由來已久，不過「於今爲烈」罷了。我們如果把目前各社會層所使用的漢字來加以分析，就可知道越到上層越講究「古字」也就越來得「象形」越來得高貴典雅，也越不和「大衆生活習慣相融洽」而越到下層，也就越來得拼音化，如「生薑」之作「生姜」「百葉」之作「百叶」，「銅圓」之作「同元」，「幾」作「几」。可見小民不怕你加以破壞「中國固有的文化」的罪狀，還是要求拼音化的。所以拉丁化是大衆的要求，是漢字進化的必然的方向。

當權貴們起來反抗封建的時候，他們原是當時進步的社會層，他們也曾做過漢字革命的工作，但是中途終於與封建攜手，繼承了漢字繼續施行一貫的愚民政策。戊戌政變(1898)的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是被稱爲「思想界之彗星」的，在他的「仁學」中就有這樣的話：

「……又其不易合一之故，語言文字，萬有不齊；越國卽不相通，愚賤尤難遍曉。

更苦中國之象形字，尤爲之梗也。故若改象形字爲諧聲，各用土語，互譯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則地球之學可合而爲一。」

這還是四十多年的話，他指出的（1）象形字是大衆獲得文字的障礙，（2）只有廢棄漢字改用土語拼音——這兩點，至今仍不失它的進步性；還能使半世紀後的漢字拜物主義者臉紅。與他差不多同時的，尙有沈學，盧戇章，蔡錫勇，勞乃宣，王照……諸人，在中國語書法拼音化上都盡過相當力量的。自然，在現在，只有大衆自己才能負擔起這一個歷史的使命——中國語書法拉丁化來。

五

丹楓先生舉出日本文部省的廢除漢字，來作他拼音化不可能說及擁護漢字的護符。這就是一個笑話，只有丹楓先生會相信。據我所知，文部省只是改良主義地限止漢字的數目，而並未要「廢除漢字」雖然這已是日本大衆的一致要求，但爲執行「思想善

導」計，文部省要中學生讀經之不暇，決不會做這種傻事的」至於說文部省試驗的結果：中學二年級學生不會讀懂一篇很短的「卡拉」（葉按即「假名」）的信。我不知道丹楓先生這個試驗的消息從那裏得來的，而這試驗是在怎樣的情形下舉行的，所以不敢斷定有無此事。但憑我們的常識來想，此事一定別有原因，或者全是無稽之談。丹楓先生應該知道：日本人打電報就全用「假名」的。他如一切日英，日德，日法，日俄……字典。都按ABC的次序用羅馬字（共有Heibon式，日本式，世界語式三種）拼的，一向倒也沒有聽見他們說不便，或是不懂，這是一。第二，「假名」不能和拉丁化並論，因為「假名」不便詞類連書，所以遠不及拉丁化的清楚易懂。第三，雖然文部省決不會完成日本語拉丁化的任務，但是這遲早必然為日本大衆所完成的。最後附帶地要指出的是，丹楓先生用「卡拉」兩字來音譯日本的「假名」兩字，「假名」原音讀作Kana，但是「卡那」兩字通常在普通話中是讀作Chala的，這原是土音關係，沒有什麼奇怪。但是由此亦可看出：丹楓先生所主張的全國統一大衆語，即在知識份子如丹楓先生自己，也有難

於統一之勢，口頭及手頭時常流出他所反對的土音來；因此對於文盲大衆，更是非常渺茫，非常渺茫的事了。

作爲拼音化之可能的又一事實，我們可以舉出外國敎士所編印的各地土白羅馬字讀本以及聖經。據我們所知道的已有官話的，廣州話的，潮州話的，客話的，蘇州話的，溫州話的，廈門話的，南海話的，苗語的，而馬堅繡（牧師）所編的羅馬字的客話辭典，還是和「辭源」差不多大小的鉅著！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中國話的拼音是完全可能的。

六

權貴知識份子爲保持其旣得權益——漢字起見，起來反對拉丁化，這是拉丁化運動開展時必然的現象。他們懼怕大衆去廢除他們的「爭鬪之武器的漢字」，是很恐慌的吧？知識份子在白話文中只看見了上層階級的全國統一性（而且發音上也還是沒

有統一的，）於是就「以己度人」把自己的知識份子的主觀偏見揑成「客觀現實」來強奸，取消大衆語運動，把這個運動歪曲做方塊漢字識字運動或是白話改良運動。

漢字拜物主義者爲要支持白話文在上層階級中的全國統一性，不惜用他們的偏見來阻擋中國語的拉丁化，來剝奪大衆爭取文字的權利。這是因爲他們並未站在大衆方面來認識「客觀現實」之故，結果必然要死抱住漢字不放的。在大衆看起來，這個問題幷不這樣複雜的：大衆現在說什麽話就把這話用最簡易適用的方式表示出來，所以他們所要求的就是口語的拉丁化。

拉丁化論者還繼續不斷地和這些反對者論爭，一方面還須把拉丁化的理論方案內容運動現狀設法具體介紹出來，一方面就應該用必勝的決心踏上實踐的第一步！

Latinxuadi zhungwen wansui!—1934 nian 8ye 5xao.

附記：此稿寄出之時又讀到文博先生的文章，中間說到「那些一定要搬演舶來的拉丁化漢字的人們，」「因爲他們一定要把漢字拉丁化與羅馬字拼音嚴格對立起

來，」所以「絕不容許」有條件的應用「四聲的麻煩規則。」這話是因果顛倒的：拉丁化論者因為反對國語羅馬字的「麻煩，」這纔要和它「嚴格對立起來。」拉丁化雖然反對國語羅馬字的「對於四聲的麻煩規則，」但在必要的場合，如「買」和「賣，」「哪裏」和「那裏，」也加以區別的。總之，國語羅馬字要的是「麻煩，」因此是非大衆的；拉丁化要的是簡易，所以它必然是要和前者「嚴格對立起來。」國語羅馬字論者對於這次大衆語問題討論，始終是漠視，無關心的；我們至今沒有看見一篇站在國語羅馬字立場來討論大衆語的文章，從他們這種超然物外的態度上，也不難看出他們的立場了。當今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也曾是個國語羅馬字派（不過那時還叫林玉堂，）然而曾幾何時，現在用盡心機在那裏嘲笑大衆語，提倡他的「脚布氣」的語錄體了。

國語羅馬字論者稱拉丁化為「蘇聯代我們造的拉丁化，」「船來的拉丁化漢字，」「從西伯利亞搬來的拉丁化漢字，」這種用意是非常明顯，是種卑劣的惡意誣蔑。

不幸博文先生也照樣抄了一遍。拉丁化論者並不否認拉丁化是在蘇聯創製的，但這決不是俄國人「代我們造的，」而是旅蘇華僑文化突擊隊領導下的遠東邊疆中文拉丁化委員會創製的。蘇聯建設的進展促進了旅蘇十萬華工（他們多半是文盲）對於文化的要求，這纔產生了拉丁化的運動。所以這個運動是有着充份的社會根據的。國語羅馬字論者並不堂皇地以理論來作戰，却用中傷做武器，反而暴露他們的幫閒者的「偏見。」

（中華日報「動向增刊」八月十一日）

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衆語

——關於這一次論戰底內容的速寫——

高荒

文言文復活運動是封建復古潮流中當然有的現象，對於這一運動的鬬爭，當然而且必然是反封建復古運動底一翼。那麽，被整個反封建的陣容所規定，這個鬬爭底基本力量是勞苦大衆底力量。此刻表現得最明顯的，是站在勞苦大衆底立場上的知識份子思想家底力量。換句話說，這個運動是勞苦大衆底文化鬬爭日程上的一項，目前最緊急

的一項。

所以，『「大衆語」問題底提出，表示了這個問題得到了正確的發展。這意思並不是說由一個問題發展到了另外一個問題，而是指出這是一個運動底兩面。認清了封建復古運動中的文言文復活運動底本質，就一定會達到建設『大衆語』的結論，祇有『大衆語』問題得到了具體的解決和實踐的效果以後，反文言文鬪爭才能夠爭取實質上的勝利。』

首先要觸到的，是這個論戰到現在爲止所提了出來的幾個重要的具體問題，對於文言文底勢力的估計，對於「白話」底性質的估計，對於「大衆語」底內容的規定

文言文固然已經成了僵屍，但僵屍而居然復活了，這就說明了還有使這個僵屍能夠復活的堅實的基礎。反對文言文運動是這個鬪爭底一面，一切過小的估計都是有害的。文言文底勢力一方面表現在它還沒有失掉的廣大的地盤（公文，信札，各種應酬文，報紙，……最重要的是學校國文作文等）上，而另一方面，普通所謂白話文在內容上形

式上都是和文言文相通的白話文。是文言文最有力的友軍或後備勢力。

其次，爭執得最利害的是關於「白話文」底性質。說白話文是買辦資產階級底東西，這顯然是一個不正確的估計。白話文固然有和買辦資產階級相通的一面，但也有和大衆相通的一面。在形勢上，白話文底基本的詞彙，語法也是勞苦大衆口語底基礎的部份；在內容上，白話文現在創造了不少的進步的作品，是理論翻譯文底唯一工具。我們不能把和大衆底生活需要結合着的白話文拋掉。大衆裏面的作家會把白話文裏面合乎大衆需要的部份提高，不合乎大衆需要的部份消滅，在實踐中將白話文「揚棄」。

然而，什麼是「大衆語」呢？在許多解答裏面，表現了一個最强的傾向，「國語統一運動」的傾向。先在腦子裏面放下了抽象的原則，想創造出一個合乎這個原則的全國通用的「大衆語」來。有的人只是抱住這個原則，左邊反對白話，右邊反對土話方言，使「大衆語」成了一個烏有的東西。有的人甚至發表了以北京話爲標準的奇怪議論。

但是，『建設「大衆語」』必然地是大衆底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問題。從大衆底生活

需要出發的文化鬭爭、一方面要反對一切封建的文化麻醉，一方面要滿足他們底文化欲求，使他們底向前的志願和切膚的情緒得到表現。所以眞正的大衆語作品，必然地要帶有大衆底土底氣息，汗底氣息，能夠充分地傳達大衆底生活需要，表現大衆底生活色彩。

那麼，一方面被以大衆底生活需要爲基礎的文化鬭爭任務所規定，一方面被中國語言底分歧條件所規定，所謂「大衆語」註定不是一元的「國語」式的東西，而是各各以當地的大衆爲對象的多元的發展。在實踐裏面的作家或大衆自己的作家，對於他所選作主要對象的特定領域裏的大衆所熟悉的白話（普通話）裏面的部份，他一定會儘量地運用，一方面採用必要的方言土話，使他底作品能夠充分表現他所要表現的大衆底生活。所以，實際的文化鬭爭工作，會產生以上海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以廣東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以長江中部底大衆爲主要對象的大衆語作品。……這樣的大衆語作品，一方面各各地適應了大衆底需要，一方面包含了向更高

的大衆語發展的最好的成分。

所以，大衆語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言語學上的問題，而是一個以大衆底生活需要爲基礎的文化運動的問題。

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兩年前的對於白話的批判和建設大衆語運動，近代口語底變遷及分佈系統，漢字拉丁化問題，大衆語與大衆文藝問題，國際的國內的復古運動與大衆語建設運動……等，都要展開具體的討論，要展開具體的描寫和分析。防範這一運動底流產，反對一切退陣或過於樂觀的現象。然而，一切鬬爭都要沿着在這裏簡單地提出了的主線前進。

（中華日報「星期專論」七月十五日）

大衆語運動的幾個問題

——大衆語的特質和任務——

聞心

大衆語的建設，在現在已經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怎樣進行建設的問題了。這決不能和某些人所想像的一樣，只是看做對「文言復興運動」所起的一種「反動」，實在應該認做爲滿足大衆的文化需要一個長時期的鬬爭；把這鬬爭解釋爲白話文言的論戰固然不妥當，就是單從語文本身去認識這鬬爭的意義也是不夠的。因爲大

衆語運動，一方面是要破壞陳腐的語文形式與所寄托的社會意識，另一方面更要利用新的語文工具傳播進步的文化意識於大衆中間，所以這運動必然包含兩種主要任務：一是爲大衆的教育而鬪爭，提高大衆的文化水平，卽是使語文轉變爲大衆吸收智識發表意見的便利工具，再則是要改造中國的文化，掃除矇蔽羣衆的奴隸意識，帝國主義文化影響，以及各種寄生的意識形態。跟着這兩個問題的澈底解決，也就聯帶解決了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問題。

大衆語不但和僵屍式的文言不相容，同時也不能和現下的所謂白話與國語妥協，關於大衆語和白話文的不同點雖然有人略略指出過，我們覺得還欠充分，所謂白話文不光是和大衆的需要距離太遠，只能通行於少數的讀書人與官僚紳商中間，而且因爲它繼承了許多文言遺毒（如用語上，意識上，寫法上等）極易變成爲跟時代背反的陳死文（如新鴛鴦蝴蝶派，語錄派等的文字）；同時所謂白話文不一定是現代的，像提倡白話文的老將們就常從舊書堆裏去尋找歷代的白話文學作爲文章模範，拚命抱住龔

部水滸紅樓夢西遊記，表示自己所提倡的白話文是有來歷的。這在大衆語就不然了，大衆語雖然不能憑空產生出來，自有它的社會歷史意義：但它用不到從死去的或病態的白話文裏去找什麼模範。它的主要源流，就是現代活的大衆日常所通行的話語，唯有最能代表大衆的需要吶喊，情緒，最能表現進步羣衆的意識的語文，才是眞正的大衆語文，這種語文，如果有組織地用來描寫各色各樣的大衆生活與現實社會，報知歷史的進展路線，就成爲大衆文藝！所以大衆語必然是現代的，富有流動性的而且必然是在形式和內容上一致，卽在用語，寫法，思想上全都拋棄陳腐的屍骸的。因此宋代的評話等並不能和現代的大衆語沒有差別地看待，在另一方面，街頭巷尾供給大衆以低級趣味的說書，唱本舊的小說（如薛仁貴征東羅通掃北等）以及各地教會印行的土話聖經，也不是大衆語文。

大衆語和所謂國語也不相干，我們暫不論國語在理論上的不妥，在事實上國語這東西不過是官話的變相，它並不是大衆自己通行的話語，用官僚的紳士買辦的官話與

文話來征服大衆的意識，替少數人造成一些文縐縐的交際語，這就是國語所要做到的；至於國語所用的話語，乃是凝固化了的，和自然的繼續向前發展的大衆語也不可比擬，隨着大衆的交通發展和文化水平提高，大衆語的材料與內容也必逐漸豐富起來，大衆語一方面不能不依據大衆的需要而帶有可以伸縮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不完全拒絕地方的習慣語，我們在事實上可以看見各地大衆在共同談話會議時，就有一種自然的通用的語言，這種語言是和所謂國語不同的，倘使他們生活的關係複雜起來，生活利害愈趨趨向於統一化，各地的方言自然就更會逐漸互相消融，互相吸收，更加擴大已有的通行語的語彙了，自然，這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在現在並且有許多阻礙，將大衆隔開起來，但是大衆語運動必然向着這個方面發展，是沒有疑問的。

我們常聽人說，中國方言的複雜是造成中國混亂分裂的原因，幸虧有了統一的文字，（指秦代以來的象形文字而說）各地的人才能彼此通往，不致完全隔膜，其實中國方言所以會這樣複雜，根本固然是由於各地封建的閉鎖的經濟於封建的政治割據造

成，而文字爲少數人所獨占，使歷代的大衆沒有緣分和「統一的」文字接近，使文與話相差一天一天遠起來，這樣就更加阻礙了大衆交換他們的意識言語，只有在將來文話合一而採用拼音書法的時候，才能更加溝通各地大衆的精神交換關係，由方言的相吸相消，而漸漸消滅各地方言的過大差異。當然所謂「文話合一」是指寫出的文字與一般大衆的口語合一，因爲少數知識份子說出口的話語仍舊不是大衆所能完全理解的，（例如有好些人說話時就慣咬文嚼字。）所以「文話合一」也是有條件的。

自然，中國文字要達到完全大衆化，只有在象形文字轉變爲拼音文字以後，因爲象形文字在大衆的學習上，使用上，無論如何是有許多困難的，但這却不是說在拼音書法沒有成功以前，就不能使語文大衆化，而且只有經過語文的大衆化運動，才容易使拼音文字成功，因此今後爲大衆語努力的人，應該要進一步將漢文拼音化問題和大衆語問題聯帶的提出來討論。

努力大衆語運動的人必須很堅決的爲大衆着想，而親自做到語文的大衆化，像作

者在前次「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體」那篇文字中就不知不覺夾進了幾句文話，這究竟是由於自己太疏忽了，和對大衆語認識不夠，我們要經常檢查自己的文字看有沒有舊的渣滓夾進去。

——關於大衆語的寫作綱領和幾個疑問的解答——

大衆語運動不能認爲五四式的白話文的延長或改良，因爲這不是一個枝枝節節的形式修正問題，而是形式與內容向着更高階段變更發展的問題，五四時代的所謂白話文學運動是和當時市民層反對封建文化意識的運動相調合的，跟着市民層向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投降，所謂白話文也就逐漸暴露出它的向後轉危機，它不能抵抗封建式的文言復辟運動，甚至在許多地方和文言及其所依附的社會意識妥協合流，大衆語運動正是配合着更高級的社會發展浪潮，針對着白話文的危機而勃起的，它一方面要使語文和大衆的社會鬪爭文化需要密切聯繫起來，別方面更要在建設新的語文形態

的過程中加緊反文言餘孽及其所依附的封建意識的鬪爭，自然同時亦不放鬆寄生性的白話文的破敗，完成白話文運動所沒有完成的任務。

要是說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只是給中國的死文學屍身剝了一層皮，大衆語運動就是要更進一步設法火化這屍身，防止殭屍式的新舊文言的活動，因此我們在目前就有提出大衆語寫作的具體綱領的必要。下面的幾條綱領就是依據最近各家提出的一些比較正確的主張再加上作者的一些意見作成的，希望大家補充修正：

一 關於寫作的意識的

（1）不寫反科學的文字（不抹煞事實，不鼓吹迷信，不曲解眞理，不掩飾錯誤，不帶着科學的假面具向科學眞理進攻。）

（2）不寫反革命的文字（不替帝國主義及一切榨取制度宣傳辯護，不妨礙社會的進展。）

二　關於寫作的方法的

（3）不夾用死的文言句子和古文成語。

（4）不用死去的白話土語。

（5）不用死去的洋典。

（6）不故意堆砌，不用艱深古怪的字眼。

（7）不寫死的落後的公式化文字。

三　關於寫作的態度的

（8）不寫迎合低級趣味的油腔滑調的文字；不寫一切舊形式的詩文（如做律詩填詞等。）

（9）不寫含糊的投機式的滑頭文字。

(10)不寫虛僞的浮誇不實處處以個人爲中心的肉麻文字；不用無聊的客套。

現在讓我們解答幾個關於大衆語建設的疑問。

因爲大衆語反對采用文言語句，有人就擔心這樣一來語彙一定不夠用，其實這是不成問題的：第一，大衆語是在大衆的生活需要中生長發展的，只要我們肯多接近大衆，就可從他們的實際生活中學習發見許多很自然很實貴的語彙，這種語彙是比死的成語典故活潑眞實多了。譬如今天申報上有一則關於居禮夫人死的消息，路透社的譯電居然搬用「躬操井臼」一個死成語，使居禮夫人立刻變成爲中國古代一位「賢內助」，一這和用「荆釵布裙」來描寫西方的儉樸女子有什麼分別？而大衆語中所採用的成語，主要的是貼合事實教人容易懂得的現代話語，就不用化裝爲古屍嚇人了；第二大衆語雖然反對用死的不合理的成語，但易懂的合理的成語有時亦可酌量採用，如「狼吞虎嚥」「咬文嚼字」「隨機應變」「歌功頌德」之類，假使沒有適當字眼代替，似乎可以用；第三大衆語的文法極其靈活，富於可變性，很易創造新的語彙，如陳望道說過「寶

字虛用」（名詞變爲動詞等），「虛字實用」（動詞變爲名詞等）大衆語就勝過死的語文，我們可以利用這種文法優點添加新語彙，將來大衆語文普及，大衆們自己也會創造自己夠用的語彙；第四大衆語既然是現代的，當然同時亦就不能脫離國際文化影響，因此國際通用的新術語並不妨按照大衆的需要與理解程度適當地採用，將來拉丁書法如成功，吸收外來語就更便當了。

又有人慰大衆語很難確定一定的標準，究竟還是用土話呢？普通話呢？或國語呢？對這問題好些人發生了不少誤解。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略略說過，這裏要補充的是：大衆語並不是可以拿出一個呆板的標準來依據少數智識份子的主觀想像一下子完成的，它乃是在大衆的生活關係的發展過程中繼續擴展的，大衆在不斷的流動交通中自然而然會形成一種普通性的話語，一面淘汰方言土音，一面使某些特殊的方言土語（如「醬油」「搗蛋」「豬仔」等）逐漸失去它的地方性而變成爲各地通用語。大衆語就是反映這種語言的自然發展過程而加以文法的論理的組織的，它一方面

採取容納大衆的通用話語；溶解地方土語，一方面又推廣前進的流動的羣衆的通用語於落後的羣衆中間。至於國語的不合理，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還有人以爲在目前中國國民教育極端落後，要想推廣大衆語簡直是不可能的，而且大衆語有降低文化水平去遷就落後的大衆的趨勢。我們不否認在大多數人連字都不識的文盲狀態之下，要想普及大衆語文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們第一應針對着中國大衆文化發展的不平衡而供給各種大衆以不同的語文教育，一步一步去使得他們按照自己的需要達到能讀能聽能寫的地步；第二我們應認識大衆語只是一種傳達思想普及知識的便利工具，它僅僅是要拋棄那些浪費時間精力及寄藏腐舊意識的不合理的文字尸骸，而決不是要降低文化知識水平；第三我們應認識，大衆語是把最進步的羣衆的意識作爲中心領導去克服落後的羣衆的迷信俗見與封建奴隸意識，而斷不是遷就後者。所以不能機械地以爲大多數民衆是落後的，大衆語一得勢，落後的意識就會流行起來

——建設及推廣大衆語的具體辦法——

大衆語在現在應該由原則的討論轉化爲具體辦法的研究，由理論的鬪爭發展成爲實際的運動。光是在文字上口頭上做論辯提倡的功夫，不下勁去設法建設推廣大衆語，這個運動必然要給淸談主義磨去它的鋒銳，大家隨便談談就拉倒了。

在原則上，我們得承認大衆語祇有在進步的智識份子和大衆接近以後才能取得成功的保證，但是光是說着「和大衆接近」或「到大衆中間去」，沒有具體的切實的辦法而照此實行，就能建設大衆語麽？事情沒有這樣簡單。

怎樣去建設大衆語？我想在這大題目之下至少包含着下面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誰來擔當建設及傳播大衆語的任務？大衆語運動的主動力不消說天然是有着最進步的意識的大衆自己，他們要肩起領導落後的羣衆的責任，在他們領導下的大衆語運動必然是和整個的社會文化戰鬭聯結的。但是大多數的進步大衆數

育文化水平很低，他們同樣需要別人來教育自己，所以在開初須有接受前進的大衆意識的智識份子（著作家，教育家，藝術家，記者，學生等）來幫助，來促進。這件事看去似乎是很矛盾的，在表面上顯得好像是智識份子領導大衆。但是事情是越想越清楚的。進步的大衆自已領導大衆語運動，它的眞實意義是他們自已的意識和鬭爭作爲領導的要素，智識份子不過是幫助他們的文化鬭爭，供給他們以武器罷了。好像我們替一個不識字的人寫信，我們只能代他表達心裏的意見，而寫信的主人實際還是那個不識字的人自己一樣。不過智識份子除了供給武器與大衆而外，還得多多參加大衆語的戰鬭，要很耐心地去從大衆學習，體察，同時用他們自己的話語來教育他們，克服他們一些落後的意識，爲大衆所需要的民衆學校，識字班，補習班，讀書團，圖書館，報社，劇社，俱樂部等必須由前進的文化團體多多建立起來，利用這些機關去傳播語文智識於大衆中間。前進的文化團體在事實上有成立一個大衆語運動同盟之必要，這同盟吸收大衆的幹部份子及進步的智識份子，參加推動大衆語文化，造成一條大衆語的聯合戰線。最後在所有的

大衆教育文化機關中都要有眞正的勤勞者來參加，形成一批大衆替大衆自己服務的幹部。

第二個問題是用什麼工具去建設推廣大衆語？在目前良好的拼音文字在國內既沒有出現，我們勢不得不利用現有的漢文去教育大衆。當然採用的漢文要淺近易懂，要合乎他們的需要，不能和他們的口語與生活距離很遠。對於文盲的大衆教他們識字自然是很要緊的，但是單單識字是沒有用的，必須要供給他們以最愛讀最易懂的讀物，用通俗的圖畫，幻燈等幫助他們理解，試驗推行拼音書法可以和讀漢字同時並行，因爲拼音字可以幫助漢字的讀音，而且他們運用起來比較便利，我們常常看見各地教會將羅馬字母拼音法教授不識字的教徒，他們居然在很短期間可以學會寫信，不過所拼成的音全是土話罷了。我們可以根據大衆的通用話語讀音教給他們合理的拼音書法，這是需要大家研究實驗的。既然大衆的文化水平不同，所以就要對準大衆的文化不平衡供給他們以不同的教育，各種爲大衆寫的小說，詩歌，論文，劇本，連環圖畫等，要按照各種不

同的大衆的需要編印出來，要顧到他們的興趣，這樣用來代替那些落後的小說，唱本，連環圖畫等以及教會的傳道宣傳品。對於勤勞的兒童大衆，婦女大衆都要使他們有緣分讀到他們自己所需要的讀物。此外還要爲他們編印淺近的雜誌，報章，字典，辭典，所有這些都要文化團體有計劃地主持。除文字的教育外，電影，話劇，音樂，圖畫等也須一致向着大衆語化動員，和文字的教育工作配合起來。

第三個問題是用什麽材料去建設發展大衆語？大衆語的材料不能單靠從書本裏找出來，而必須主要的向大衆的日常話語和生活中去採取。因此我們要多多學習大衆的話語吸收到文字裏來，考察他們的生活需要與情感，同時要將大衆的話語加以提錬組織，淘汰去那些落後的意識和詞語。對於大衆語的文法要儘量研究採用，代替那些不便當不合理的老文法。此外，流行於民間的歌謠，諺語，傳說，俗字，略語等都是大衆語的原料，但是必須經過更細密的選擇工夫才可以應用。

第四個問題是怎樣去加快大衆語發展的速度？這除了要靠大家親自到大衆當中

去從事語文與新智識的教育藝術等活動外更需要所有的前進智識份子有決心造成一種普徧的大衆語寫作風氣，在消極方面是絕對不留戀一切舊的文字殭屍，不再用舊的語文寫作，在積極方面更要研究大衆語的寫法，文法，字句，用來寫作小說，詩歌，劇本，論文等等；將高深的中外書籍譯成大衆語，從事實上去證明大衆語是比一切舊的語文優良合理，同時要從社會科學，語言學，民俗學，文學，藝術各方面去發展充實大衆語的理論，擴大大衆語的宣傳，繼續不斷地和腐舊的文字殭屍鬭爭，在理論上去打擊克服它們。

末了，我們要記牢，大衆語要發展，要轉變爲大衆自己的武器，必須和大衆的一切社會文化鬭爭緊密地聯繫起來；例如在發動大衆反宗教帝國主義等等的鬭爭中，都必須用他們自己的話語去傳播正確的思想主張，使大衆語在他們迫切的實際需要中發展起來。用他們所不懂得所不需要的文字來作爲推動他們的工具，這是絕對要不得的。

（新生週刊第一卷廿三——廿五期）

大衆語萬歲

——答曹聚仁討論大衆語問題的一封信——

吳稚暉

曹先生：好久沒有領教了。但是在許多刊物上常常拜讀大作，獲益亦不少。

為了文白大衆的問題，我也本想和和大家的興，插說幾句。止因近年來對於現在的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呢？倪雲林所謂「開口便俗」，他是恐怕俗了自己，不願開口。我是明知口裏落不出象牙，無往而不俗，不敢開口。因此遇到這樣熱鬧的問題，也還到底不敢

作聲。承您爲了這問題，還提到我的科工問題，到底還不曾引申先生的盛意聲說幾句。就爲從前得了先生的教訓，說我盼望別人從事科工，自己却不科不工，這眞是一針見血；從此我也就覺得剌剌不休的討厭，更加沒有可開之口。現在又要先生將這文白大衆的問題下問，那我就把我心中要說的寫出來，博先生一笑罷。

我總括的先說一句：文言一時難得死光，也是實在的。說他會什麼復興，再來代用白話，那是笑話。並且是鐵樹不能開花，同樣的可以肯定。汪柳諸先生他們忽然主張中學以後要側重文言，教人之意七分，衞道之意或亦有三分。因爲他們看見考試的卷子，及畢業的小世兄，實在文言太蹩脚，不適於有司之程式，那就於個人出路，完全艱難了。他們要救渡這班「出路先生」，所以望學校大開方便之門，給他們以出路的利器。這七分，是惻然悲憫，我想汪柳諸先生是胸無成見，是殉人的，並非爲己的。所謂衞道之三分，則見仁見智，設想不同。他們偶然感覺文言這東西，可以連帶保持得他們希望之道，比較多一點；亦如白話家或大衆語家也相信能夠連帶迷信到文體有關，況且止有三分，也可以對汪柳諸

先生很原諒的。

然而文體與衞道有關，我是不大相信。說文言中有道，何以總理的三民主義，竟能把白話寫成的呢？說白話完全是道，何以白話家又常聽見擯斥某某派某某小說呢？可見得文言白話大衆語，止是工具。有容易普遍，或不容易普遍之分罷了。我們現在的局面，如合理的分配，卽以學校而言，止能五成叫他進官場，十五成叫他在學校教書，八十成望他爲農工商。在中學時代，通通一百成，就要注重他的理化算數，而且要習科工，非兼習外國文不可。那末將容易的白話文，叫他能讀總理的三民主義，也就夠了。到了高中，分出那二十成來，讓他兼習點合於有司程式的文言，到了大專，再讓他性之所近，去習法政文哲。其數目，也足夠考試院取中機關登庸了罷。還恐怕路是少，而要出的人太多。何必定在初中，卽着眼有司程式，暗示以出路之所在，實則此路不通，社會上賸下多量的中等流氓？故汪柳諸先生存心救人，實乃害人。汪先生是不曾進過畜生道，柳先生是同我一樣，進過畜生道的。回想那一個畜生，不是四書五經，强迫了讀的？文言當然是沒有人敢對他發生問題的。

然而每縣要取一二十個秀才，有幾個通順的呢？莊思緘先生常說：「考試的文章，是見得官，見不得朋友的。」比較起來，現在的中學學生，少數的也不讓當年的童生罷。其出類拔萃如柳先生者，當時亦止最少少數。今日學生中也僅有柳先生，所以不是文言才能出秀才的呀！終之，文言會成文學，白話也會成文學，大衆語當然也會成文學。但是文言白話大衆語，有容易普遍與不容易普遍之分；當然白話比文言容易普遍，大衆語一定更比白話容易普遍。若一說到文學，恐怕文言白話大衆語，一樣的止是少數罷。其實即有司程式，及奉此等因，就算文言，也止要文言，並不要文言文學。就是白話寫得好的，也未嘗不能寫那奉此等因的文言。可惜一做文言，便馬上肉麻地要希望他懂得文學。於是文言的不通，因此而起。

這一回文白戰爭，名作如林，多數皆可佩服。弟所尤注意者有兩篇。一篇是尤墨君先生的從「中學生寫作說到大衆語。」他引浙江會考，題爲我所最敬佩的朋友，其中一則是文言，自來英雄豪傑之士云云，確有點古文氣息。然尤先生要爲於日常生活有什

應用我對曰：只叫做文學，恐怕請這位先生去辦奉此等因，未必條理很能清楚罷。因此不要獨斧文言。尤先生於這會考，又引一段白話，有古之君子之交淡如水云云；尤先生又批評爲食新不化的白話，然而化不化的原故，亦就在那里做文學。大家現在又要建設大衆語，打倒白話，恐怕就是白話文學鬧下來的禍罷。所以胡適之先生一方抵禦文言，叫人逕要在白話文學努力。不曉得又一方面不爭氣的白話文學做得好的，止有少數，正同文言文學，終是少數的一樣。不知不覺，人也白話文學，鬼也白話文學，也同古文觀止常拼文言的台一樣。而一衆語不客氣的又來聲罪致討了。因爲在工具方面說，白話自然優於文言，因其容易普遍。然而一到文學，便烏煙瘴氣，文言的好文學，如袁中郎的小品文，止供象牙塔裏人消閒，而白話文學的好的，亦不過供亭子閒裏朋友排悶而已。其多數的怪物，簡直在大衆都莫名其妙，與古文觀止一樣。所以到了這裏，兄弟願意貢獻的：不要建設了大衆語，跟着便是大衆語文學建得起大衆語文學，當然亦像胡適之先生把白話文學建成了白話。可是後頭還來一個打倒，是一定不免的。

我這回尤注意的兩篇，其又一篇便是陶知行先生的「大衆語文運動之路。」他說：

大衆語與大衆文（文是文不是文學，文言文言文言文學；白話白話文白話文學；大衆語，大衆語文，大衆語文學，就是大衆語將來需要文學，讓大衆自己創造起來，不要好像白話，不過是幾個文言文學家改頭換面的代辦。）必須合一，在程度上合一，在需要上合一，在意識上合一。他主張符號是三管齊下：漢字要教，注音字母要教，用注音字母拼成大衆語更要教。我看他的意思，並要提倡俗寫及簡筆漢字，就是有時措手不及，夾點同音的別字，又是他先生所容許的。我還容許他漢字，注音，符號，別字不夠使用字，可以合璧成字。到大衆教育普及時，由大衆中的能者來理出一個頭緒來；等衖堂裏的癟三又需要有衖堂消閒品，再讓他們來創出大衆文學；不要又繼今日的文人學士，鐵青了面孔，立文例，創語彙，好像大衆應當來受我們的欽定。看見夾了別字注音，嚴飭不許。倘若如此，也是受了傳統思想，與文言先生們的於古有之，於傳有之，也有什麼兩樣呢？文言於古有之的固屬可笑。白話先生於洋有之，必定要將「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子曰」介紹給大衆，這就是白

話要受大衆語的革命爲不可教藥的汚點。文學的天才，是很少數的，而東施效顰，就有一劃板格式，加上了桎梏。所以大衆語要鼓吹文學是很要當心的。最好遵從陶先生的意思，讓大衆自己來創造，不要代辦。

且據兄弟猜想：陳望道先生等拿出這個大衆語的標旗來，大衆是縱的，指向多數階級說話。雖然也有意思慢慢進到橫的方面，一人說話，可以使四百兆大衆一齊明白，然而依我聽說，恐怕陳先生起意，是不曾想一躍就到的四百兆大衆一齊懂得的，是叫統一語，不是現在第一步急需的大衆語。傜佬也有大衆，阿拉也有大衆，傜佬的大衆把傜佬的語文合一起來，阿拉的大衆把阿拉的語文合一起來。傜佬的大衆與阿拉的大衆，有了合一的語文，又互相合一起來。一種的統一語，還讓大衆來造成，是第二步。這恐也不是烏托邦，傜佬與阿拉，現在就常常通話，傜佬亦不傜佬，阿拉亦不阿拉，自有其不正確的藍青官話。藍青官話必是將來的統一語，多帶點北平話，或亦相當，而眞要應了陶先生「最好聽，願意學」才行。然而英美的英國話，都不能恭照約克省一道同風喲。一道同風，就是欽定的

反面。我國一道同風的觀念，不但入了政界，咬牢了雞巴，雞腿都挽不動，就在文學界，也是移動一毫，就要若喪考妣的傷感的。破壞統一之罪，在政界是頂大的罪名，在學界何嘗不是呢？好了，我是崇拜文學的，文言白話的文學，都崇拜的。可惜看人沒有力量止末裝小脚，是實可臭惡的。而且因而害於爾國，凶於爾家，所以敢下斷語，以答先生明問曰：

文學不死，大禍不止。

好了，大衆語萬歲！若大衆語文合一了，寫點粗淺的科學工藝文出來，惠及大衆的飯碗；尤其圓滿。否則知識値幾文一斤，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灌輸大家抱頭痛哭之知識哭得大衆骨瘦如柴，什麼革命禦敵，都不好辦罷！回想前日，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做，你來我來，還是那末一回事。根本弱點在那里呢？就是自己不科不工，對先生不勝其忸怩而已耳。好了，

祝您健康！

弟敬恆頓首　二十九日

又：閻王不曾賦我以文學天才，我是一個「放屁放屁，眞正豈有此理」的大衆，有些脫字譌句，都望原諒。現在社會眞是聾瞽，好好一個劉半農先生，是聲音學大家，

偏要拉他算文學家，算尊重他不曉得正是罵他，正是埋沒他，顛倒錯亂到如此，先生亦必大笑。

（申報「自由談」八月一日）

不同於吳稚暉先生的兩點意見

徐懋庸

吳稚暉先生也來參加大衆語的討論，這是很可欣幸的一件事。吳先生好久不發表關於學術的問題的意見了，然而從這回的給曹聚仁先生的信中看來，可知他對於「大衆語」這個問題，實在從頭就注想着所發表的意見，雖在好些處所留着朦朧，但的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並非隨便的敷衍。因爲如此，這意見很值得注意，也很值得討論。

吳先生也贊成大衆語的建立，這將打破許多人的迷惘。雖然是極少的少數，但是現在確還有人對大衆語表示懷疑，或說：「大衆語究竟是什麼東西？」或說：「大衆語根本

是錯誤的。」對於這些人，吳先生的有幾句話就夠對付：「文言，白話，大衆語，有容易普遍與不容易普遍之分，當然白話比文言容易普遍，大衆語一定更比白話容易普遍。」更簡單地說：大衆語就是最普遍的一種語言，這就答覆了「大衆語究竟是什麼東西」一問。白話欠普遍，大衆語要做到更普遍，這還有什麼錯誤？不過，倘是頭腦有點毛病的人，也許對於「普遍」還要懷疑：「爲什麼定要普遍呢？」但到了這地步，我們可以不管了，讓他們懷疑到死罷！大衆語可是從此將被强力地要求了，由於牠的「普遍」，書店要求大衆語編書，因爲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讀者，影片公司要求大衆語作說明作對白，因爲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觀衆，一切宣傳和廣告機關，也要求大衆語供他們利用，……所有的學者的主張和提倡，還不及實際的需要之有力，何況患腦病者的懷疑和反對。

假如大衆語是建立起來了，而且普遍地被大衆所使用了，但是用了這語言所編的書，所說明的電影，仍舊講的是窮人被老爺打了屁股，還要叩謝，一個小生和一個花旦在後花園「打克司」……這些事情，那末大衆仍舊不要看，結果書店老闆和電影公司老

閣仍舊不能賺錢，那時「大衆語」總茲仍舊要被否定了。

這就可以看出大衆語問題中的意識問題之重要。所謂意識問題，也就是吳稚暉先生所說的「衞道」問題。

然而，吳先生雖否認文體與衞道有關，而我却以爲有關。舉例說罷，「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兩句是衞道的文言，然而決不可翻成白話，並不可翻成大衆語，關鍵完全在乎「刑」和「禮」兩字的矇矓，或者可以說是漂亮。老百姓是愚蠢的，但也有個程度。當他們不懂人們所說的話的意義時，他們會愚蠢地信服，但一被他們懂得，那就要開始懷疑，甚而至於「性起」的。因此，古人立教，條字面總是力求含糊，籠統，抽象，玄妙，使人不懂，這總能夠使人信服，此之所謂「愚民。」文言文就合「愚民」之用，故「愚民」之道，只有文言文能衞，衞來總沒有破綻。用白話文固然也可以做「禮不下庶人論」但必至說得太露骨，終究是不妙的。倘是向百姓宣傳一種道理，一種主義，目的是在使他們懂呢，譬如三民主義，那就非用白話不可了。文言固然也可以

寫三民主義，但決不能像白話三民主義似的風行。要一種主義被普遍地理解和接受，一定要利用普遍的文體。由此可知文體與衛道實在大有關係，這一點吳先生似乎未曾想到。

對於吳先生的「文學不死，大禍不止」論，我也有點不同的意見。吳先生的本意原是很好，他主張用科學工藝救濟大衆，但是他以爲文學和別的智識，是「害於爾國，凶於爾家」的，所以主張拉倒，這用意完全是爲國家爲大衆，然而吳先生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他說：「若大衆語文合一了，寫點粗淺的科學工藝文出來，」就能「惠及大衆的飯碗。」科學工藝本身固有救國家救大衆的可能，但在現在的情形之下，是不能的，只看美國好了，語文是合一的，科學工藝是發達的，然而羅斯福總統所努力的是經濟復興，可知它的國民經濟是弊了的，它的退伍兵和工人常要鬧暴動和能工，可知它的大衆並不是都有好飯盌的，這些情形，科學工藝不能救，難道完全是受了文學的害麼？這總說不大通。

吳先生的意思，以爲文學完全是智識分子弄出來的把戲，大衆現在是不需要的，所

以他說：「一等街堂裏的癟三又需要有街堂消遣品再讓他們來創出大衆文學。」這也是不對的。街堂裏的癟三，田販裏的村夫，他們向來一切都有，也有文學，也有哲學，也有他們的工藝科學，根本是因爲他們有這些一切的需要。然而他們現在所有的一切，從質一方面說：是低級的，從量一方面說：是貧乏的，而且倷伲的大衆與阿拉的大衆，彼此各異，不相溝通融合，因而也不會變化進步。大衆語的建立，正是要借普遍的語文之力，溝通融合一切倷伲和阿拉的大衆的意識，使之豐富，使之變化，使之進步，將普遍的高級的文學哲學……等等，去代替原來的局部的低級的一切。這裏面重要的還是大衆的意識的淨化。大衆的心理與智識分子的心理是一樣的，他們決不是除了「飯碗」以外就無他種需要，文學也是他們所需要的。大衆語建立了之後，當然要有大衆語文學，（而且，在事實上，大衆語的建立，先得經過大衆語文學的嘗試。）吳先生把「大禍」的責任推在「文學」身上，已是不公，根本否定文學，尤其說不通。贊成大衆語而否定大衆語文學便成了買櫝還珠了。

自從建立大衆語的問題成立以來，我就完全贊同，但我所研究的是建立大衆語和大衆語文學的技術問題，預備在這方面寫一篇文章。現在看到吳先生的論文，覺得上述兩點有辨明之必要，所以先寫了這一篇。

（申報「自由談」八月五日）

吳稚暉先生第二信

曹先生：

很對不起，把先生問題，擱了多日，還未回答。現在把荒山雜述完了七成，但一星期時間已過去了，所以先答覆了先生種種問題，再完成那三成。

（一）　大衆語問題

大衆語問題，先生以爲說得夠了我們所重，不在語文，只問用語文說的話，應該說什

麼，弟之意見亦同。只盼望大家有話說，多說點科工。至於文言，白話，大衆語，只有容易普遍與不容易普遍之分。如果那個人不想太普遍，就用文言來說科工，也相對容納的，能用白話更好，能用大衆語尤好。

四十年前，大家感覺文言的普遍困難，力求通俗。當時通俗書報，通俗演講等的名目很普遍。通俗者，本意欲通到一般粗俗的大衆。後來白話兩個字，就代表了一切。不料白話之缺陷，却無意中今日在晨報上被胡懷琛先生判決。他的宣判書說：「大衆語是甚麼東西，當五四前後白話運動時，主張白話的人，所寫的都是白話，（之乎者也都換成的嗎呢了，）界限很清楚。今日主張大衆語的人，所寫的大作，是不是便算大衆語。如不是大衆語，何以不用大衆語？如是大衆語，我們試拿給大衆讀讀看，有幾個大衆讀得懂？」胡先生責備討論大衆語的人不用大衆語，是不應該的。誠然，這要望主張大衆語的人，努力來接受胡先生的忠告。因爲他發見現在討論大衆語，仍不過用五四前後與文言界限很清楚的白話文。（就是之乎者也都換成的嗎呢了。）胡先生板起了面孔，判斷這種白話文，「拿

給大衆讀讀看，有幾個大衆能讀得懂？」只不是胡先生一人感覺，乃今日多數人一同感覺。足見拿白話文來對付大衆，那是破產了。如宛轉對白話文求其通俗，與昔日求文言相同，白話還不能通俗，豈非失了他的體面。不如另揭一大衆語名目，分道揚鑣的好。所以大衆語的要求，不是無病而呻，或無理取鬧。不料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白話對大衆語，用昔日文言對白話的一般面孔，好像妖言惑衆，當立即正法；輕則集合白話同志羣起非難，要問大衆語是甚麼東西。幸而胡先生替他隱隱立了一個界說，便是給大衆讀讀看大衆都讀得懂，便叫大衆語。胡先生又說：「何不把胡適文存或魯迅的吶喊從白話譯成大衆語」這有何難處呢！倘使文存吶喊裏的話給大衆讀讀看，大衆讀得懂，只一部分，就是難在白話裏的大衆語，用不着再譯。有的讀不懂的，就請胡周兩先生自己換一個說法，告訴大衆，大衆於是才懂，只換一個說法的話，就是白話以外的大衆語。如果胡周兩先生大笑，說只不是大衆語，是我們另一種的白話法寶。我就也大笑，說道先生們爲什麼藏了大衆懂的法寶，拿大衆不懂的法寶，來棄絕大衆。這我又要問白話是什麼東西，難道靠了白話的頭

衛，要上滅文言，下禁大衆語，獨裁一世？這不過說說頑笑，白話先生們不要見氣。我們且來講用文言，用白話，用大衆語，止有普遍與不普遍之分，望他普遍，到底說的是什麽東西，乃是最要緊。

說是拿文言，白話，或大衆語的工具，來衛道吧，如徐先生所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靠了文言，可以欺騙民衆。然而白話說：「一般民衆，不必苛求他們的禮節，大官是要他自動制裁，刑訊是可以相對的避免罷。」大衆語就說：「老百姓是嘸沒工夫講規矩，勿要搭殯去嚕蘇，做子大官，是自家面皮郎穩弗落格，難道要上子電刑勒肯招認麽。」（所以電刑對小癟三戳骨頭常用，大家勿悶信，等到用到體面人身上，就反對的聲浪高起來了，也是那個刑不上大夫之原理。刑不上大夫，並不是不判罪，因爲大夫身上鶴頂忠孝帶現成的，用不着夾棍竹片，只個是非，我們不必再譯雜討論。）但看上面的文言，白話，大衆語，都說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何文言欺騙，獨能優勝呢？講到普遍，文言欺騙的是少衆，白話是次多衆，大衆語是欺盡大衆。然反過來做大衆語好夢的，又想利用大衆語，來達到

普遍宣傳的目的。如說殺人放火，可以算得眞好漢。馬上一張大衆語告示貼出來，說道，殺人放火是豬玀，喪盡良心格賣國賊，那沒禁止也普遍了。所以語文止是工具，普遍不普遍是能力，本身說的是什麽，或欺騙，或宣傳，或禁止，其效果正反相同。不應重重責備了文言的小欺騙，反忘了大衆語的廣欺騙。也不應以爲有普遍宣傳的奢望，就忘了有普遍禁阻的大力。所以從衞道方面來防文言，防白話，防大衆語，或爭文言，爭白話，爭大衆語都是癡愚的。

書上的話，就是古人口中的話，說他是死語，我是絕不相信。文言乃是器具不良時候，特別製造的。語的小變遷是有的，我相信吳泰伯時代的無錫話與現代十七八相同，至多名詞形容詞等變動，話搭頭是三千年如一日的。文字的變遷，典謨訓誥，到史傳，到白話，止是字數多寡。字數多寡，止是書寫或印刷的器具便利與不便利。從刻畫，漆簡，隸帛，抄寫，印刷，到機器打字器具愈便利，可以用不着縮頭截脚，省什麽篇幅。白話字數，必多過於文言，大衆語字數，又多於白話。口裏講話，必又多過於筆頭。所以一場演講，儘管忠實用縮寫記

載，除錯誤不計外，遺漏的至少一半。多兩個字，換得可以普遍的功效，是一定值得的。

（二） 科工問題

連日寫字太多，此科工問題，又太複雜，寫到此處，正要寫下，忽頭暈，稍睡似稍好。然有醫生朋友來，謂恐釀腦充血，囑稍休息旬日，如此只好抱歉之至了。敬叩

道安！

弟 敬恆 九晚

（社會日報一卷三期）

吳研因先生復信

曹先生：

承你把關於大衆語的問題分給我一份，叫我做答案，我一面很高興，一面又覺得很慚愧。因爲「文白之爭，」居然引起了大衆語的提倡，好像是更進了一步，白話軍方面的馬前小卒」自然覺得加入了「生力軍，」真是「八面威風，」但是我對於大衆語的問題，實在沒有深切的研究，有人把這問題問我，我也自然會暗暗地慚愧。

一個月以來，左臂因傷痠痛，真覺得筋疲力盡，百不遂心，所以今回第一個和所謂一

文言」軍交戰的我，反閃在一旁，不聲不響，「坐觀」別人出馬「廝殺。」現在左臂殘痛「如故，」實在連寫信也沒有精神，所以承你「下問，」我只能很草率地把我意見約述如下：

一、現在雖然是一切權利，由少數人獨佔，於大衆無分的時代；但是誰也知道，大衆是應當擡頭的，在教育或文學的一方面看來，提挈大衆使大衆早些擡頭，這實在是教育或文學的唯一的任務。文字是一種工具，我們尤當使牠爲大衆所應用。所以我認爲無論在何時，如認清教育或文學的任務的話，大衆語總是應當提倡的。以大衆化的白話文稱爲大衆語，雖然似乎是「巧立名目，」但是爲促起大家的注意起見，就從現在起劃爲一新的提倡大衆語的階段，實在也未嘗不可。

二、白話文運動停滯，正和革命運動的停滯一樣。革命運動，到了現在，有許多人以爲無需再革命，有許多人並且在幹反革命的工作。白話文運動也是這樣，新文人以爲白話文已不成問題，不必再提倡；舊文人則乘隙而入，在幹反白話文工作，所以白話文運動便

停滯下來。況且白話文的進展和停滯，確也跟著革命的勢力而消長的——因爲這原是一種文學（？）革命；現在一切革命都停滯了，白話文運動還能不停滯嗎？至於新文人有復古的傾向，這正和鼓吹革命的記者，變成了誦經念佛——的要人一樣，一半因爲他們功成名遂，一半因爲他們避重就輕所謂「逃禪」，正是「時勢使然」罷！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白話文仍在「發榮滋長」，爲小學兒童和中學以上青年所普遍應用；新文人也沒有個個有復古傾向。否則「豪傑之士」的陳（濟棠）何（鍵）既提倡「讀經」於上，捧「豪傑之士」的汪懋祖先生又「文言運動」於下，白話文還能存在於中小學嗎？還有人居然大張旗鼓，對這些人大加撻伐嗎？

三、白話文的程式，在消極方面應當避免歐化，減少特殊階級用語（文言化，）在積極方面應當加入農工大衆常用的語詞語調內容，一方以大衆的意識爲意識，一方面宣達大衆的情感；這樣白話文才能成爲大衆的工具。在教育方面說，我國的農工大衆，如能施以相當的教育，先使他們識字，能使用白話文，再使他們的語言程度提高，（？借用）

大衆和語文那才能兩相結合。否則描寫貴族少爺和小姐的石頭記，固然於大衆不能發生許多關係，水滸以至於小唱本——雖然在大衆的意識中，但是不識字的大衆仍然和他們無緣的哪。

四、我也主張以北平之普通語言，做大衆語的標準的全國通用語文。但是我以為方言是消滅不了的，所以一方面還得有一地方私用的大衆語文，國家的大衆語文和方言的大衆語文，兩者並行不悖，對於什麼人說什麼話。

五、寫大衆語跟寫兒童語一樣，要設身處地用客觀的態度表達民衆所慣用的方式，不知何指？指連環圖畫，唱本，鼓詞，彈詞等的格式而言，我們正可因勢利導，無庸棄去。這一問，我實在不很明瞭，所以不能解答。

最後，我以為大衆語文的建設，應當由提倡的人，尤其是文壇健將十分努力做去，一方面盡量創作些關於大衆的讀物；一方面盡力於掃除文盲運動。否則注音符號，國音羅馬字母……雖然鬧得「震天價」響，結果也只有鬧鬧而已。先生以為怎樣？

復頌

撰安！

弟吳研因敬覆八，七。

（社會日報一卷三期）

關於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的意見

黃　賓

這一次的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決不是重複着「五四」時代的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這個論爭是作爲反對一般的「復古運動」的一翼而被提起來的。「因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薄弱，」「五四」時代所提倡的白話文，早就包含着妥協的病根；（陳望道先生所謂「包括着『敎士語』和『大衆語』……留一個退入『語錄體』的可能」）及後白話文便日趨於「八股式」的文言化和「高跟鞋式」的歐化，（尤墨君先生語）變成了少數人所專有的文字；所以，這次論爭一開始，便提出大衆語及「大衆

語文學」來，形成了一種完全和「五四」時代不同的新運動。這一運動的大體的動向是很對的，值得每個有正義感的人的擁護的。可是，在論爭的過程中，却表現出若干不正確的傾向——放鬆了正面的敵人，濫用着辯證法的術語，亂給人加上大帽子，以及輕視土語方言，等等，——這都由於把文言文的勢力估計得太低，尤其是離開了客觀的現實而作空論。要是這樣下去，不但不能使問題展開，甚且可以使運動夭折，讓提倡「復古運動」的人們站在旁邊竊笑！

為了要使這一運動能夠順利地進展和擴大，我們覺得有提出一點意見的必要，所以寫了這篇東西。因為這次論爭問題牽涉得非常廣泛，所以分開來說：

第一、這次論爭中，對於文言文的努力估價得太低，有的人以為即使讓他們把古書裝進青年腦裏，到了青年和現實生活接觸的時候，他必定會把牠吐棄出來（如葉聖陶先生；）有的人以為迨至今日，白話文已在我國文壇樹了牠成功的旗幟（如雅非先生；）有的人以為直接提倡讀經的時代的不會再來，可以使我們無須多抱悲觀，間接的辨

法能收多少效果，實在是疑問（如秦瘦鷗先生；）——這些都是輕視了文言文的勢力。其實，文言文的勢力，確實不小；（一）全國有數的兩大書局現在正在競賽著重印古書；如二十四史，圖書集成，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國學基本叢書……等等。（二）較小的如新文化書局等正在大量翻印許多舊小說；據說北平一家書店單替新文化書局一家每月就做幾千塊錢生意（這裏要注意的是這種小說是被定價打一折八扣即定價一元只算八分出賣的。）（三）各種連環圖畫大都是用文言寫的（現在不但上海並銷入內地。）（四）各大學歷屆考試的國文題目，據統計有百分之八十七是八股式的題目（大琨先生「八股試題；」）這次上海會考所取的所謂優等文章，都是八股的變相，並且大多數是文言文，內地各省只有加甚這將迫使全國各級學校把文言文裝入青年的腦裏去。（五）其他如公文，信札，報紙，廣告，通電等等，都是用文言文的；甚至無線電播音還在那裏說「家訓」講「幼學」。（六）最後，我們要注意到佛經的大量重印和推銷，遍佈於全國各大都市；這也是文言文的。——這樣，白話文的勢力和文言文的比起來，真是渺小

得可憐了；何况白話文本身又是那麼不健全的，何况封建勢力還在利用白話文呢？佛教的通俗叢書就有用白話文寫的。

第二、在這次論爭當中爭得最劇烈而且花費篇幅最多的是白話文該不該反對的問題。目前，書籍，雜誌，報紙等所登載的白話文，是有種種要不得的毛病，如漸次文言化和無批判地歐化等等。但是白話文中儘有一部分是反映着現行的普通話的，（陳望道，夏丏尊，高荒諸先生關於這一點的意見是對的。）有許多革命的文獻是反映和指導着大衆的鬬爭的。把這部分擴大起來，使牠儘量反映現行的普通話——即夏丏尊先生所謂「先使白話文成話」——是可能的，並且在「大衆語文」未建設成功之前，事實上也祇能一面使白話文成話，一面從事大衆語的建設。就是說，事實上祇能使用一種矯正了文言化而且批判地接受歐化的白話文來寫文章，尤其是寫論辯解釋以及翻譯理論文章。所以，籠統地主張反對白話文和籠統地擁護白話文，都是離開了客觀現實的空話。我們對於白話文的態度不是無條件地反對或擁護，而是努力建設大衆語文來揚棄它。

第三、大衆語的提出，是很正確的。這是這次論爭所以和「五四」運動時代的不同的標幟之一。但是，這裏必須明白：（一）先有大衆語，然後有大衆語文。（二）現在還沒有一種全國通用的完全的大衆語存在，它僅僅是在若干交通方便的大都市和新的區域萌芽着；所以建設大衆語以及大衆語文是目前重要的任務之一。（三）建設大衆語文是把口頭的大衆語變成筆頭的大衆語；這種轉變，大大地能夠使口頭的大衆語充實，普及和提高；同時必須有一種新的符號（見下面）才能夠完全使它轉變，——即使大衆語和大衆語文一致。（四）眞正的大衆語以及大衆語文完全勝利，必然要在大衆的爭鬪獲得完全勝利以後經過若干年的艱苦的努力，才有可能。但是，這不是說現在無須努力從事大衆語以及大衆語文的建設，須知多努力一分便是增加一分它的成功的條件。在目前，努力使白話文成語。儘量去吸收大衆的日常用語（包含方言土語中的精華，）努力使白話文通俗化，儘量去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努力教育大衆，儘量去幫助大衆的鬪爭，……等等，都是建設大衆語以及大衆語文的工作中的主要部分。或許有人要說到

民間去！如果說參加建設大衆語工作的智識份子，必須接近大衆，向大衆學取，理解大衆，這樣地來說到民間去，這是對的。如果是說一些智識份子到民間去之後，就能夠建設起大衆語來，那是錯的。因爲大衆語的建設，是在大衆生活中間建設起來的，無論如何，必須使大衆來直接參加大衆語的集體創造，才能完成大衆語建設這一任務（葉籟士先生）是再明顯沒有的。所以成話的白話文和大衆語以及大衆語文不是對立的東西；比方說，前者是後者的一種構成的要素，後者是前者的終極的目標。

第四將來成功的大衆語是怎樣的一種東西？現在是沒法具體地來規定的，然而有幾點原則的抽象的規定，現在也可以指得出來。這些規定同時也成爲目前努力的指南針：（一）大衆語應該是代表大衆的前進意識的（陶知行先生），所以凡是帶有落後的封建迷信的意識的言語，都應該儘量淘汰（在用來刻畫和暴露封建殘餘的人物的，自當別論）——在筆頭語中尤不應該採用。（二）它應該是傳達世界前進意識的一種工具，所以凡是表現世界進步的事物的語彙，以至語法，（中國語法所沒有的）都應

該吸收進去；卽是說，可以灌輸新的外國語彙和批判地接受歐化的語法。（三）它應該是全國通用的而且是匯合全國語言的精華的一種語言（文字），所以它可以而且必須吸收全國各地的土語方言的精華來充實自己（但是土語方言和「切口」有區別，「切口」因爲它本來的性質是很少能夠變成普通用語的；）一部分文言的語彙也同樣可以吸收進去。

第五、關於土語方言的問題，在這次論爭中，也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我們認爲大衆語是（目前所用的普通語也是）由各種方言溶合或匯合而成的（但不是說由它們平等地溶合，無妨一種方言佔主要的地位，）並不從天上掉下來的。所以應該儘量使各地的土語方言發展，使它們更能夠成爲將來統一的大衆語的構成要素。反對提倡土語方言的人，最大的擔心是恐怕引起鄉土觀念，助長落後意識，妨礙吸收外來文化，阻礙「國語」乃至大衆語的發展，甚至它會使中國變成幾國……等等，——這些理由都是不正確的。這種思想，充分表現作者不從客觀的現實去思維，主要的由於沒有把「語」和「文」

區別清楚，沒有明白使土語方言發展是需要採用新的符號使口頭的方言變成筆頭的方言（魏猛克沸朗先生等。）其實，各地的土語方言，不管你去提倡與否，牠是千萬遍地每天在大衆中間交換着（說着，聽着）的。我們要使牠們發展，只是採用一種新符號使牠們由口頭語變成筆頭語吧了。如果把它們由口頭語變成筆頭語：（一）就可以使那些使用同一方言的人們，更容易交換智識；（二）可以使相接近的方言更易溶合；（三）同時更容易輸入各種進步的新智識，到可以逐漸提高各地大衆的文化水準，因而減少他們的落後性。有人以爲中國的文字團結了中國的民衆，如果用一種符號把各地方言發展起來，無異把中國分成好幾國。其實，中國要是單靠仗文言來團結，那早就不成其爲國了。因爲文字所能團結的，至多不過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八，其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衆，是完全和文字不相干的。事實告訴我們，那些把中國多弄得四分五裂，還是讀書識字的上層階級。輕視土語方言的人和那些企圖把所謂「國語」來統一中國語言的人，在客觀上是有着共通的思想的；然而所謂「國語」運動事實上是失敗的了。

第六、建設大衆語文和提倡土語方言，既然都是把口頭語變成筆頭語的問題，那麼應該用什麼符號來寫呢？我們認爲最澈底的是廢止方塊字，採用拉丁化的中國字母（葉籟士先生關於這點的主張是對的。）但是這不是短時日所能實現的，所以，必須從提倡土語方言做起。按照全國幾個方言中心區域，製定拉丁化字母；這時所謂普通語用的字母無妨看做一種方言字母，讓牠自由（意思只是不像國語似的帶有强制的性質）發展下去。並且在這過渡時期，我們認爲凡足以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的，例如千字課簡字，注音字母等（「國語羅馬字」因爲麻煩並且在實際上沒有注音字母那樣的基礎，所以不主張採用。關於這一點葉籟士先生的主張是對的）都無妨儘量分別利用（陶知行先生。）緊要的還是儘量推廣識字運動（如工農讀書班，各種夜校以及獎勵「小先生」教人認字辦法之類。）等待固然要不得，但死抱住一種方法也和過去的國語運動有着同樣的幻想，同樣地是要不得的。

第七、建設大衆語文，應該把眼光放大一點，不要僅僅注意於文藝的領域，須知提高

大衆的文化水準，其他的文章如論辯文說明文以及所謂應用文等一樣有牠們的重要性。目前籠統地反對白話文的人，根本就沒有把這類文章放在思維範圍之中，在目前，一些進步的科學，例如資本論，那是無法用現行的不完全的普通語來翻譯的，因爲許多地方不採用歐化語法就無法把牠完全表達出來（文言文之所以沒落，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爲無法表達這樣的理論；）就是論爭的文字也是這樣的。又如日常的應用文如果沒有一種新的寫法可以代替牠，那麼人們還是仍舊地應用從前的舊貨「五四」以來除了和文學有密切的書信文外，其他的應用文就沒有人去注意了。

第八、這次論爭已經發表過不少的文字，目前大家似乎已經有點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的樣子（大晚報火炬和申報自由談已宣佈結束了），所以要使這一論爭不至單在名詞或概念上兜圈子，不至變成漂亮的空談，必須立即提起實踐的工作，很科學地來分工；並且，只有在實踐的工作的過程中，才能夠使討論有新的開展。關於建設大衆語的實踐的問題，我們認爲下面幾點，是必須注意的：（一）建設大衆語，首先要和大衆爭取生

存和自由的鬭爭取着密切的聯繫。因爲這種鬭爭是團結大衆，充實大衆的生活——即是創造將來成功的大衆語的前提和條件的。所謂大衆語應該是適合於大衆生活的需要，這句話必須在和大衆目前的鬭爭聯繫着這一意義上去理解，才不會變成漂亮的空談。（二）因爲這個緣故，我們必須廣泛地創設和擴大大衆教育的工作（如工農識字班，讀書班，演講，演劇，電影，播音——對於都市大衆是有相當意義的——小冊子，連環圖畫等）多方面來提高大衆的文化水準。這是直接間接團結大衆，幫助大衆鬭爭的工作，同時也是促進大衆語運動的工作。（三）提倡土語方言文字的寫作。土語方言固然是當地大衆的日常用語，但是如果不經過一番文學的鍛鍊是不能夠成爲當地的大衆語文的健全的要素的。並且經過文學上的採用，也能夠增加好的語彙的保存和普及的力量（如「像煞有介事」之類）。（四）必須着手按照幾個方言中心區域創造出幾種拉丁化字母來。現在已有的可以採用或改造，沒有的要從新創造。（五）必須着手從活的語言研究出牠們的語法。這一工作是很必要的。自「五四」白話文運動以來，也出過

好幾種所謂國語文法，然而那些文法，多半是以過去的白話小說（如水滸紅樓夢等）和既成的白話文爲材料而歸納出來的，很少是由研究活的語言而得出來的。白話文之所以脫離口頭語（即不成話），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所以，將來的語法研究，必須以現行的語言爲主要的材料。過去的白話小說和既成的白話文以及外國語法，只能夠作爲補助的材料。這樣，才能促使「文」和「語」的接近以至於一致。（六）提倡土語方言的研究和吸收。這種工作對於上述「三」和「五」有很好的幫助。（七）對於文言文本身以及一切維持或助長文言文勢力的制度和企圖，必須儘量加以打擊和暴露，使青年們不再受牠的麻醉和束縛。這種掃除障礙的工作，在這次論爭中爲許多作者所忽視，然而障礙不除，大衆語是不能夠順利地發展的。同時，我們要明白這是一種必要而且艱苦的工作，要有耐心地去做。關於八股式的和高跟鞋式的白話文的排斥，也同樣地不能放鬆。（八）最後，在實踐中必須有種種具體的組織，而靠仗個人單獨去作戰，不但不能持久，而且也沒有力量。所以，羅子揚先生提議組織「拉丁化研究會」和「反對文言

復興同盟」（「復活」似乎比「復興」好一點）是一種適合時宜的提議。我們認爲除此以外，還有許多的團體必須組織起來，例如「語法研究會」「大衆識字促進會」各種「方言研究會」等等；並且這些組織應該取得很好的聯絡。

第九、在這次論爭中，有的文章，堆滿着一些辯證法上的用語，而實際却忘記了辯證法的精神——離開了客觀的現實而作漂亮的空談。有的文章，把一些「機會」「取消」「改良主義」……等等的大帽子硬向對方的頭上套。有的文章，把「疑心」的態度去推測人家。有的文章，只是在一些名詞或概念上兜圈子，不肯去切實分析客觀的事物。——我們認爲這些態度都是有害的。因爲這種態度和說法，只會使議論離開實際，只作空談；會放鬆正面的敵人而自家混殺一陣；會使熱心而偶爾說話不細心的參加者灰心而退出我們的戰線；會使讀者討厭而忽視了問題的重要及其中心；所以，我們認爲這些缺點必須努力矯正的。我們認爲建設大衆語這個問題，並不是能夠單靠論爭來解決，必須經過長時期的艱苦耐心的奮鬪；所以，我們必須誠懇虛心，歡迎廣大的讀者和大衆

來參加建設；如果有論爭的必要，除了正面的敵人必須給以無情的打擊之外，對於其他論者，都須以討論或說服的態度來寫文章和做口頭的辯論。

工作雖然剛剛開始，然而它是有光明而且偉大的前途的，大家努力罷！

（中華日報「星期專論」八月十三日）